

馬克思主义还是 伯恩斯坦主义？

布拉戈耶夫著

魏城、馮維靜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Д.Благоев
МАРКСИЗМ ИЛИ
БЕРНШТЕЙНИАНСТВО?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译出，原书名
«ЧТО ТАКОЕ СОЦИАЛИЗМ И ИМЕЕТ ЛИ ОН
ПОЧВУ У НАС?»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
有基础?»)。² 中译本在文章的编排顺序上有变动。

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

[保] 布拉戈耶夫著
魏 斌、冯维静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8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2}$ ·插页1·字数155,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2·112 定价(六)0.71元

印数0,001—6,700

出版者說明

第米特尔·布拉戈耶夫(一八五六——一九二四年)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紧密派——的創始人，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最早的传播者。他不仅对保加利亚的革命有很大影响，也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整个巴尔干半島的著名革命家。

布拉戈耶夫于一八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生在馬其頓南部一个貧穷的手工业者家庭中。在他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保加利亚人民爭取从土耳其的羈梏下解放出来的斗争日趋高涨的时候，这使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并且参加了实际斗争。一八七八年，他到俄国求学，并积极参加大学生的革命活动，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他走上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的开始。一八八三年他在俄国组织了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組之一，即“布拉戈耶夫小組”。这个小組曾经在俄国出版过两期《工人报》，列宁对这个报纸有很高的评价，說它“几乎是一八八三——一八九五年这十二年中在俄国创办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报刊的唯一的一次尝试”^①。到了一八八五年，由于《工人报》在彼得堡工人中間受到欢迎，布拉戈耶夫小組的活动为沙皇的警察所偵悉，布拉戈耶夫于是遭到逮捕并被逐返国。以后就开始了他在保加利亚国内的革命活动。

布拉戈耶夫在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通俗化方面，也是有很大贡献的。收在本书里的五篇論著，都是他在保加利亚从事革命活动时期的著作。

《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和《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卷，第242—243頁。

义?》两文,反映了当时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两个派别——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和以楊·薩克佐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派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一文中,布拉戈耶夫从批判伯恩斯坦主义下手给了保加利亚的机会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布拉戈耶夫对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的“論据”作了分析和批判,指出伯恩斯坦所发挥的“理論”无非是“集所有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說的肤浅而无耻的‘批判’的大成”,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家所有‘批判’马克思学說的較有系統的叙述”(本书第2頁)。布拉戈耶夫說,伯恩斯坦的主要目的是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說的科学性的信心,伯恩斯坦虽然能影响“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动摇分子,但是他不可能动摇整个社会民主党。布拉戈耶夫揭穿以楊·薩克佐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只是简单地把伯恩斯坦主义移植到保加利亚土壤上来,他們偷运伯恩斯坦的“理論”和“策略”,企图使社会民主党成为社会改良的党,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布拉戈耶夫在这里还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可是他沒有彻底坚持这个論点。在布拉戈耶夫以及整个紧密派后来的言論和活动中,像季米特洛夫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沒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問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問題提出来”^①。

在《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布拉戈耶夫由于受到当时出版不久的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的影响(虽然他当时錯誤地把列宁当做普列汉諾夫的笔名),对保加利亚机会主义者的批判更加尖銳有力了。他对机会主义者贊美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力量、蔑視马克思主义理論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加以駁斥,并揭露他們企图使党脱离马克思主义原則、把党引向机会主义道路的阴谋。他

^①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見《季米特洛夫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579頁。

看到机会主义者企图从内部来瓦解党和工人运动的巨大危害，认识到必須与机会主义者断然决裂。由于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积极斗争，终于在一九〇三年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把机会主义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布拉戈耶夫热情支持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且积极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誣蔑。他在《专政还是民主》这篇文章中根据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论点，駁斥了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純粹民主”的濫調。不过，他說考茨基之流的第二国际领导人所以对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抱敌視态度只是由于“对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任务的理論的革命涵义理解得不够深刻”（本书第187頁），則是錯誤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有基础？》一文結合保加利亚的实际情况闡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說的正确性。当时在保加利亚有一些民粹主义者在积极活动，他們无视資本主义在保加利亚实际上已经发展起来的情况，硬說保加利亚是一个小私有者国家，沒有发展資本主义的条件，也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因而也就不会有传播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布拉戈耶夫在这篇文章中給这种论点以迎头痛击，說明社会主义制度千百倍优越于資本主义制度和小生产，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則是历史发展規律的必然結果。他特別针对民粹主义者抹煞阶级斗争的情况着重指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資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进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工人阶级必須积极进行不可調和的阶级斗争，力求掌握政权。布拉戈耶夫用保加利亚人民生活中的具体材料确凿地证明保加利亚已经走上資本主义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因而在保加利亚是絕對存在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的。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还包含有一些錯誤观点。最主要的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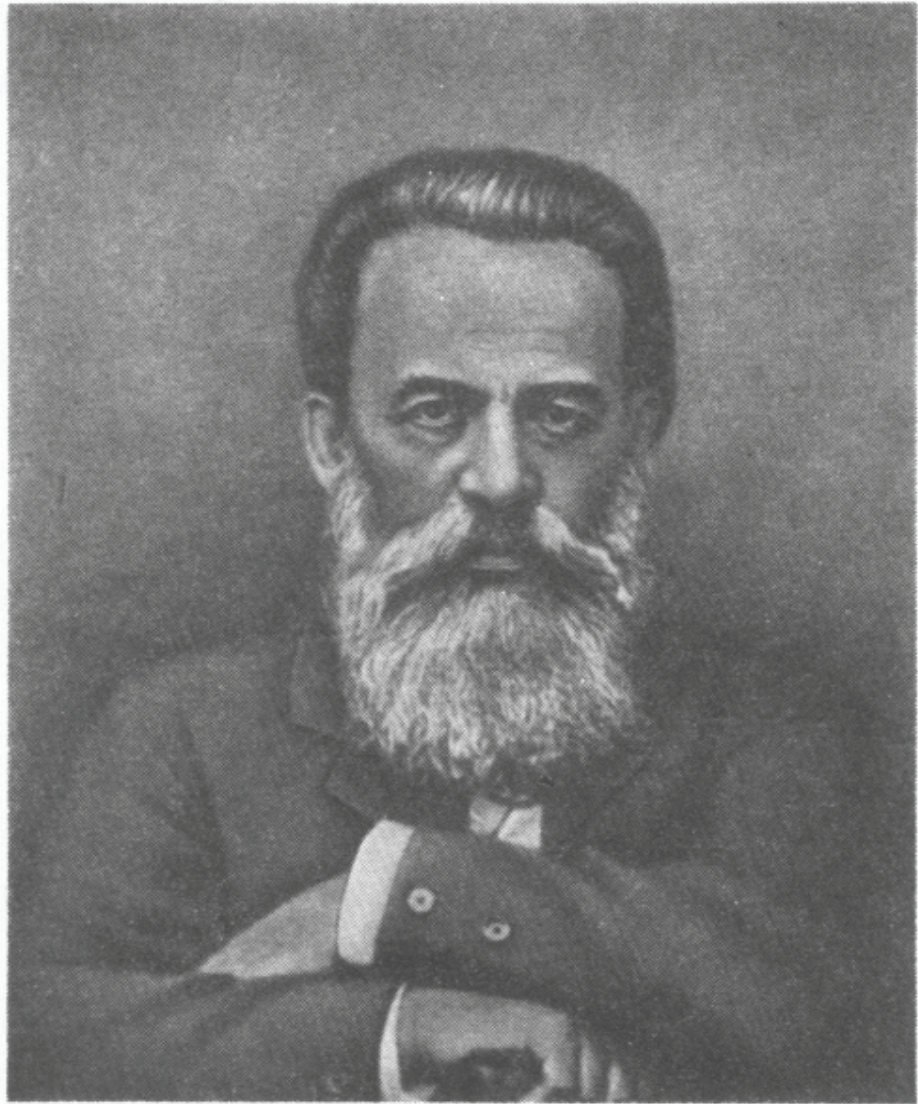
布拉戈耶夫自己后来也提到过的，其中还留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布拉戈耶夫一方面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取得政权，但是他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经济发展进程本身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使生产资料由私有变为公有”，从而引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方法是普选权、自由选择和自由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等合法手段，而没有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统治阶级不可能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不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①而“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上日程来’”^②，所以，只强调合法手段而不同时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好充分的准备，那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收在本书中的，还有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布拉戈耶夫为了加强党内理论修养在一九一三年写的。它通俗而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且指出三者之间的联系。布拉戈耶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强调它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以此来反对机会主义。但是，像上面说过的那样，紧密派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来，这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反映。此外，布拉戈耶夫对于历史上主观因素的作用也估计不足，从而夸大了经济规律的作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435页。

② 同上书，第9卷，第117页。



目 录

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	1
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23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沒基础?	48
作者前言	48
第一章	50
第二章	65
第三章	81
第四章 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沒基础?	94
第五章 結論	118
学习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主义学說学习指南	125
前言	125
初学馬克思主义学說的书目	127
第一部分 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	127
第二部分 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27
第三部分 通过实际运用来解释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辯证法	127
第四部分 通过运用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过程来解释馬克思主义	128
馬克思主义学說学习指南	128
导言	128
第一部分	130
第一章 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关于书目的第一部分)	130
第二章 进步或者社会发展是怎样发生的?	137
第三章 社会经济基础变化的原因	143

第四章 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认识論和辯证方法(关于书 目的第二部分)	148
第二部分	155
第一章 通过实际运用来解释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关 于书目的第三部分)	155
第二章 通过运用馬克思主义理論分析历史过程来解释这一 理論(关于书目的第四部分)	175
专政还是民主	186
注 释	196

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¹

評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施坦的“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論和黑格尔的辯证法。——我們的伯恩施坦派和社会民主工党。

作为写作本文的緣起的，是譯为保加利亚文的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爱·伯恩施坦的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²。早在此书保加利亚譯本問世之前，《新时代》杂志上就已经发表了关于此书的許多文章，有創作的，也有翻譯的。虽然如此，我們却又重新对它加以注意，則其原因不在于其内容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而在于某些对馬克思的学說知道得很少的党员，受到了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伯恩施坦式的“批判”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极力破坏党干部对馬克思主义原則的信任，企图使社会民主工党脱离这些原則，脱离以这些原則为根据的无产阶级的策略。但是說他們想要用伯恩施坦主义来代替馬克思主义，他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同时我們要指出，在这些少数党员之中，有一些人不久之前曾在报刊上批判过伯恩施坦的观点，可是近来却成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内伯恩施坦主义的拥护者。

实质上伯恩施坦主义在我国文献上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伯恩施坦主义在社会主义陣营中出現以前在敌对的陣营中就曾鼓吹过了。大家知道，閔采斯和派斯馬尼克³，特别是后者，早就向我們推荐过社会民主工党某些党员現在在伯恩施坦这本书的影响下

所鼓吹的貨色。事实上伯恩斯坦这本书不是集所有一切歪曲馬克思主义学說的肤浅且无耻的“批判”之大成又是什么呢？伯恩斯坦这本书不外是資產階級思想家和資產階級社会主义思想家所有“批判”馬克思学說的較有系統的叙述。也許这本书的唯一的功劳仅仅是把这种“批判”全部集在一起。唯一的新穎之处只在于这整个“批判”署上从前的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名字，而以对工人階級抱着善意的假面具出現。实质上在这种假面具后面隐藏着純粹个人心理的动机。在这方面有些德国同志认为伯恩斯坦的行为是对无产階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开背叛，这些同志是对的。可是我們党内也可以找到一些党员，他們希望不经长久思考就悄悄地并且非常匆忙地把这种背叛当做科学的最新发明推荐给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①。

考察伯恩斯坦这本书就是考察此书出現以前所有一切反对馬克思学說的“批判杰作”。在这里我們不能这样作。我們的目不同，并且也沒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在我們社会主义文献中反对諸如

① 保加利亚伯恩斯坦主义的鼓吹者之一，甚至是伯恩斯坦主义主要的鼓吹者：即伯恩斯坦的《前提》的譯者，除了收集在《工人党内的內訌》这一小册子中对我的各种謊言和誹謗之外，又增加了自己胡編的捏造，即說我在讀伯恩斯坦的书之前就写了关于該书的評論。到現在为止我沒有写过專門評述此书的东西。也許我順便在某个地方写过关于伯恩斯坦的回忆，那也只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和他以前的一些文章。至于他的《前提》一书，則我是在反对它的一些批判文章出現以后不久讀它的德文本的。并且我当时还是从翻譯者本人那里拿来讀的。是否他不記得了呢？不，他記得很清楚，并且正因此而急急忙忙地昭告于世，說我的德文很差。在这里德文好还是差沒有意义，重要的是我們的伯恩斯坦派认为这种“論战方式”比我的更体面。

《前提》的同一位譯者通过《工人通报》⁴ 急匆匆地通知說，对小册子的意見沒有使他信服，并提出請继续論战。这豈不是怪哉！有一些人有关各种原因（也許是在問題的实质之外的）的任何理由都不能使他信服，特别是当某种“科学的最新发明”（对他們來說伯恩斯坦主义就是这种“科学的最新发明”）的鼓吹者如此匆忙地产生的时候，不能使他信服，对于这些人有什么办法呢！

此类的“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出了许许多多，也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格·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等等的一连串的译本。我们在这里仅仅谈谈伯恩斯坦这本书的某些方面，即那些我们的伯恩斯坦派特别注意而又不指明出处的方面。

伯恩斯坦写《前提》一书所抱的目的是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有毛病的，应该用另一种策略来代替它。可是他同其保加利亚的毛手毛脚的学生不同，他知道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同马克思的学说有密切联系的，即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同辩证方法、同价值学说、同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密切联系的。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学说是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础；要证明不需要这种策略，这种策略是错误的，就应该先证明，其基础本身即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学说也是不需要的、错误的。伯恩斯坦在其《前提》一书中就是这样做了。伯恩斯坦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运动”、前进运动是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要说明运动，既不需要唯物主义历史观，也不需要辩证方法（伯恩斯坦把辩证方法说成是马克思学说的主要祸害），既不需要价值学说，也不需要阶级斗争。照他看来，所有这一切，即马克思学说，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前进“运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它使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吓坏了爱好和平的民主分子。伯恩斯坦的主要思想就是如此。可是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理解“运动”不需要，——就是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地步。保加利亚的伯恩斯坦信徒及他这本书的译者就处于这种可笑的地步。伯恩斯坦所耽心的是对他在出版《前提》一书之前所处的那种地位的讽刺性估计过低，所以力图借此提出哪怕是表面上的反对马克思学说的论据。现在我们来谈谈其中若干论据。

第一，伯恩斯坦这本书的特色是思想非常暧昧、模糊，堆满了生造的、读者不习惯的词汇和用语的拙劣的译文又加甚了这一点。这本书给人一种不自然的、矫揉造作的、没有经过消化的印象，甚

至使人感到最清楚的思想也故意歪曲了的。因此它具有最粗浅的矛盾。伯恩斯坦当然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其“批判”。可是一开始却是一个非常别开生面的绪论。照伯恩斯坦看来，任何学说都由两部分组成：基本的和应用的。前者是不变的，后者是可变的。哪一部分是基本学说，哪一部分是应用学说，从伯恩斯坦的书里不可能得到理解。他没有举一个例子。同时他硬说学说的不变部分可以始终不可动摇（当然如果它正确的話），而应用部分則是在改变着的，或者甚至完全錯誤而被抛弃。把学说分为这样两部分对于伯恩斯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想成为不要馬克思学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把馬克思主义学说分为上述两个部分就不可能这样做。于是馬克思主义学说中一切伯恩斯坦所不喜欢的东西，就将成为可以抛弃的“应用”部分。比如，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为伯恩斯坦所特别不欢喜，因为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论证了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因此对他說来辩证法不仅是馬克思主义的“应用”部分，而且簡直是异己的、因为热中于黑格尔哲学而粘附上去的部分。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是“应用部分”，因为它们侮辱了和吓坏了资产阶级和民主分子，所以为伯恩斯坦所不喜。因此，照伯恩斯坦看来也可以把它们抛弃而无损于社会主义学说。实质上对伯恩斯坦來說馬克思的全部学说整个都是“应用的”，只有社会主义他认为是“基本”部分，而关于社会主义却又不能談什么确定的东西。在伯恩斯坦那里一切都是社会主义：争取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扩大权利和民主制度（順便說說，这些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果实）——也是社会主义。一般地說，一切向前的运动，照伯恩斯坦的說法都是社会主义。因此他說，对他來說，有意义的是运动，而不是終极目的。对于伯恩斯坦有意思的是，社会是否在向前运动，而不是終极目的，因为照他看来，运动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同时他所謂的运动，是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制

度的运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消灭现存制度并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即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和共同分配产品的制度来代替它，无产阶级的这个意图既然为伯恩斯坦所不喜，对于他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马克思学说的“应用”部分。最后，这对于伯恩斯坦来说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这不是必然的，是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比较起来也不是决定论的。谁又知道社会是否正向这个目标运动呢？伯恩斯坦就用这种方法“修改了”、“根除了”、消灭了马克思主义！

照伯恩斯坦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或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必然是“有限制的”。照他看来，这种限制在于考茨基所说的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在于物质条件，而且也在于思想意识。伯恩斯坦说道：“现时正在应用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应当指它的修改过和改良过的形式；这就是说它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之外，还指每个时代的法律和道德概念、历史和宗教传统，地理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影响（人的本性本身及其精神能力也属于这些自然条件）”（第22页）。往下又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它的作者最初呈献出来的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这是从它本身演化出来的，在其绝对意义方面受到了限制。如我们所表明的，任何理论的命运都是这样的。”（第2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从来不忽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发展。马克思在自己著作的许多地方非常清楚地着重指出了这种影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说，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有否影响，——它并不否认有影响，——而在于意识形态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实质，而意识形态影响的主要程度是由“物质的运动”决定的。至于科学、艺术、法律、宗教和其他制度和概念会影响发展——这是没有怀疑、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们影响至何种程度？“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回答说：它们影响的程度是由“物质运动”决定的。无论

怎样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发展和影响都不能超过“物质运动”的限度，都不能脱离“物质运动”而发生。比如，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影响，在近代的初期是很微弱的，这显然是因为“物质运动”还很微弱。“物质运动”越发展，即资产阶级生产的物质条件越发展，资产阶级自由概念以及一般地新的社会关系的概念也就越发展（就在人的头脑中的认识和人们中间的传布来说），就越是发生影响。社会主义思想在比利时比在保加利亚发展得更快，所起的影响更强烈。为什么？显然是因为比利时是一个较强的“物质运动”的国家，而保加利亚则是较弱的“物质运动”的国家。说“科学、艺术及相当广范围的社会关系现在对经济和作为经济力量在起作用的自然界的依赖较少”，这是不正确的。在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度内，科学、艺术和“社会关系体系”也不发达。反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度内，科学、艺术和“社会关系体系”得到较为重大的发展。这是非常清楚的，甚至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承认。比如，泰纳在其《论艺术》一书中，用依赖于“物质运动”的“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说明各国艺术的发展⁵。要是这样的话，那末伯恩施坦说现在意识形态依赖“经济”较少，说“因此技术—经济的发展和其制度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成为越来越不直接的，越来越间接的；同时技术—经济的发展的自然必然性对于建立和形成制度成为越来越没有意义的”，——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样，伯恩施坦只是混淆了概念。他说，现代社会更富于独立于“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学说。可是，第一，这些学说哪里来的呢？凡是没有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物质运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意识形态。第二，要是“现代社会更富于意识形态的学说”，这只是说现在“物质运动”远比过去时代重要。其他的看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否则就应该假设意识形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们的天赋的品质。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不能假设的。可是在这种场合意识形态对“经济”的依赖

性是显然的。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說：意識形態的起源、發展和影響是由“經濟”和“物質運動”決定的，“技術—經濟發展的自然必然性”決不會“對於建立和形成制度”成為“越來越沒有意義的”，而是相反地，保持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指出的同樣的力量。可是在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中找出“局限”對於伯恩施坦是必要的，以便把它說成“同它的作者一開始所提出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唯物主義歷史觀在其制訂者那里是否確實“演化”了並發生了“局限”呢？照伯恩施坦看來是如此的。他是從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和一八九五年所寫的两封信得出這樣的結論來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的最初一批理論家之一的普列漢諾夫在《共產黨宣言》（保加利亞譯本以單行本出版，書名為《馬克思的歷史學說》）序言中解釋得很好，他說恩格斯的这两封信絲毫沒有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提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原理相矛盾。這就是說，恩格斯在这两封信里所發表的思想無論如何也沒有構成“局限”。因此沒有任何必要來詳談這個問題並證明伯恩施坦對这两封信的解說不正確。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最好仔細地讀一讀上述小冊子。

如果對伯恩施坦來說馬克思的歷史學說不是馬克思學說的“基本”部分，如果它是“應用的”、改變着的部分的話，則如上面已經指出的，辯證法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完全背道而馳的，不僅如此，而且它是馬克思學說的“背叛的”因素。伯恩施坦說道，“這種辯證法是馬克思學說的背叛的、背信棄義的因素（das Vereätnische），它對事物進行徹底的邏輯考察的障礙”（第47頁）。這裡所談的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大家知道，受過黑格爾哲學訓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拋棄了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方面，接受了辯證法，並把它應用到社會發展上去。照伯恩施坦看來，馬克思主義學說正因為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而失去了它的科學性。伯恩施坦特別

不滿意这个情况，因为辯证的社会发展观就是为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作論证的。

那末黑格尔辯证法的实质如何呢？

黑格尔辯证法的实质在于：任何現象都应在它們的发展过程中、在它們的相互联系中来加以考察，而不是像形而上学那样单独地、在停滞的形式中来加以考察。比如說，人是有生有死的。对于形而上学者來說，死是与生独立的一种現象，一种外部的現象，而对于辯证論者說来，生和死是同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环节。人同时既在生活，也在死亡，因为生本身带着死的萌芽，即其矛盾，其对立面。无论是自然界的发展或是社会中的发展都是辯证地进行的。任何現象本身都带有其否定，随着否定的发展这个現象就轉变为它的对立面。万物都在流轉，万物都在变化。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样說明辯证发展的主要特征的：“种种形式的永恒的改变，由某种内容或傾向所产生的一种形式由于同一个傾向的加强而永恒的消灭，同一种内容的更高的发展……”^①。

这种辯证的发展对于辯证論者說来是“到处都起着作用的伟大的永恒的規律”。可是形而上学者对于发展的理解完全不同。对于他們來說，一种現象的产生和消灭，在于它的大小的逐漸增加或逐漸减少，直到它化为烏有。这种发展观根本什么也沒有說明。它只是說种种現象所发生的数量的改变。在形而上学者看来，发展仅仅在于数量的轉化，因此照他們看来，无论在自然界或人类社

① 据尼·別尔托夫所著一书第67頁轉引。（按別尔托夫系普列汉諾夫的笔名，作者此处系指普列汉諾夫所著的《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問題》，參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一九六一年三联书店版第640頁。作者所引这段文字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文有出入。按原文此段文字应是：“种种形式的永恒的更替，由某种内容或傾向所产生的一种形式因为这同一傾向的加强、同一内容的更高发展而发生的形式的永恒的抛弃。”——譯者注）

会中都是沒有飞跃的。可是自然界或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在于一种量轉化为另一种量，而且在于量轉化为质。氧是两个原子的，可是再加一个原子，就得到臭氧，它有与氧不同的质。沼气由一个氢原子和四个碳原子組成；可是在氢原子上再加一个原子，碳原子上再加上两个原子，就得到乙烷(C_2H_6)，这是一种具有全新的质的物质。两个国家在其他条件相等时，要是一国大于另一国，就具有不同的质的特征。某种制度和法律随着国家領土和公民数目的增加，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①。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就这样由量轉化为质以及相反地由质轉化为量的。可是任何由量轉化为质都是发展中渐进性的中断，都是飞跃和革命。这样看来，自然界和社会中的飞跃和革命——也像逐渐的量变一样，都是发展的必要因素。黑格尔辯证法的实质就是如此。

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辯证法，使它用脚站起来。在馬克思看来概念的辯证法是现实中所发生的辯证运动在认识上的反映。黑格尔的辯证法就这样变成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被馬克思用来說明社会发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道：“就劳动过程仅仅是人和自然界之間的过程这个限度内來說，——它的简单的因素对于所有一切社会发展形态仍然是一样的。可是这种过程的每一种一定的历史形态往后发展为它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一定的历史形态在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之后就被抛弃了，并为較高的形态让路。当分配关系之間的，从而也是一方面为与分配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态，同另一方面为生产力、生产能力和其种种因素的发展之間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深化时，就表明这

① 布拉戈耶夫在这里对于地理环境(国家的大小)和人口密度(人数)影响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性质的看法不正确。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性质和发展首先取决于基础(即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社会的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状态。——俄文版編者注

种危机的时机到来了。那时生产的物质发展及其社会形态之间的冲突就爆发出来了”(《资本论》第三卷第733页)^①。这些话揭示了上面所提到的那同一个辩证发展的规律，即由某种内容所产生的形式由于同一内容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的抛弃这种形式的规律。一定的社会形式，由于其内容的发展，在这个形式中所发生的“生产的物质发展”而被抛弃。当“生产的物质发展”达到已经不能同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形式并存这样的成熟程度时，那时就出现了内容与形式之间冲突的时机。这种时机以这种形式的消灭和代之以新的较高的形式而完成。量转化为质，或质变作为物质的量变的结果而出现。这个时候社会的逐渐的进化发展中断了，就实行飞跃，被“生产的物质发展”提升到历史舞台上来的一个阶级实行政治革命形式的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如此，按其本质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可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以黑格尔的辩证的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可是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之处是：借助于辩证法的规律向我们说明了完整的社会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能这样做。

可是伯恩施坦也像所有一切资产阶级理论家一样，不欢喜的正好是这种辩证法。“辩证法在其神秘化的形态上，成了德国的流行品，因为看来仿佛它是歌颂现存事物状态的。在其合理的形态上，辩证法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思想家们的烦恼和恐怖，因为它在对于现存事物的肯定性的理解中，包含有对现存事物的否定性的理解，即关于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于每一现存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洪流中，因而也从其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对于任何事物都不表示崇拜，而是本质上批判的^②和革命的学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1157—1158页。

——译者注

^② 着重点是布拉戈耶夫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說”^①。如黑格爾說的，它是真正科學認識的靈魂；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的基础。可是這不是重要的！對於伯恩施坦來說，它不過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背叛因素”！那末伯恩施坦是怎樣駁斥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這個基础的呢？他以愚蠢荒唐為滿足。可是我們來听听他自己怎樣說吧！我們準備着耐心听。

他在第40頁上說道：“在現實中無論怎樣進行，可是只要我們離開通過經驗所獲得的事實的基础，並且我們的思想超出這些事實之上，我們就會落入演繹概念的王國中，那時如果遵循黑格爾所創造的辯證法的規律，我們自己就會不知不覺地處在‘概念的自我發展’的網中。黑格爾的矛盾的邏輯的最大的科學危險就在於此。在某些情況下辯證法的公式可以出色地用作某些現實對象的相互關係和發展的明白的觀念。它們對一些科學問題的表述也能起有力的作用，並且促成重大的發現。可是一旦在這些公式的基础上開始作一些演繹性的結論，就會發生任意構造的危險。那個對象（所談的是這種對象的發展）越複雜這種危險就越大。當事情涉及簡單的客體時，經驗和邏輯判斷的能力在大多數場合能使我們預先防止陷入用類推命題（例如“否定之否定”），得出客體的那些處於蓋然性界限之外的變易可能性這種結論上去的危險。對象越複雜，它的因素數目越多，它的本性越多種多樣，它內部的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越形形色色，這種公式就越是不能向我們解說它的發展，因為凡是根據這些公式作出結論的地方，就越是容易喪失任何評價的尺度和標準。”

伯恩施坦反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以及一般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的主要意見就是如此。這些誹謗詞句是毫無意義

^① 據齊列涅諾夫在《曙光》雜誌第一期第116頁上的文章轉引。（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435—436頁。——譯者注）

的議論，在這些詞句中可以理解的只有一點：即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的規律和“矛盾公式”的馬克思學說離開了“通過經驗所獲得的事實基礎”，並陷入了“演繹概念”的王國中。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重大科學危險”和“背叛因素”就在於此。可是所有這些說法是否正確？說接受了辯證法的馬克思離開了“通過經驗所獲得的”事實是否正確？說因此馬克思主義陷入了演繹概念的王國中是否正確？——絕對不正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以過去和現在的事實為根據，並且是以“通過經驗所獲得的”事實為根據的。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個人主義的過渡、從完全的奴隸制和奴隸式的社會生產形式到封建主義和農奴制的過渡，以及從封建主義和農奴制到資本主義和僱傭勞動制的過渡，確實是“生產的物質發展及其社會形式”之間衝突的結果。這就是說，這裡以“經驗”為基礎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且證明它並沒有陷入“演繹概念的王國”。現代的一些事實也同樣证明了這一點。確實，我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看到生產是社會性的，生產與“物質生產的發展”一起越來越成為社會性的。可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產品的占有卻是私人的，並且為那不直接參加生產的少數人所占有。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隨着物質生產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形式就會越來越被否定，到頭來它與其社會形式之間衝突的時機就來臨了。這個時機是必然要來臨的，因為物質發展在進行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說，在發生社會變革之前，存在着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和階級鬥爭。請問——在我們今天是否存在着這種衝突，這種階級鬥爭？——無疑地，是存在着的。既然存在着，那就是表明，存在着“物質生產的發展及其社會形式”之間的矛盾，隨着這種矛盾的發展階級鬥爭將不可避免地尖銳化起來。這種矛盾，從而這種階級鬥爭必然會在社會變革中和革命階級的專政中得到解決。現在在進行搏鬥的是資本家和工人

这两个阶级。这种斗争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及其社会形式”之间矛盾的结果。这种矛盾将由工人阶级来解决：工人阶级斗争的终极目标正是消除矛盾。工人阶级将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成长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只有在社会变革中和专政中才能得到出路。这就是说，现代也给我们提供了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的事实。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不是简单的概念演绎，也不是热衷于“类推公式”的结果，而是由观察现实和由“经验”得出来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的学说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丝毫无损其科学性，而且相反地辩证法赋予它以每种科学理论所固有的那种科学价值和逻辑的严整性。恰恰是没有辩证法马克思的学说就不再成为科学理论。

伯恩斯坦不再能引证任何更为重大的理由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关于辩证法的谈话更加暴露出了他的“批判”的站不住脚。伯恩斯坦所致力的是：简单地捉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片言只语，并以此给他们的学说以极尽歪曲的解释。首先我们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谈到各个历史时期，谈到历史形式及一般地谈到人类的社会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预言历史事变时确实有一些过错，然而这些预言中有一些是非常准确的。可是他们在作这些预言时并不是像伯恩斯坦所说那样的蠢人，甚至不注意他们的预言是否同社会发展理论矛盾。无论如何，要知道说什么，并注意所说的话同他们的理论符合到如何程度，在这方面他们的智力至少不比伯恩斯坦低。伯恩斯坦驳斥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弄到如此傲慢的地步，以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含义最明确的话看成是“历史的自我欺騙”。比如，他把《共产党宣言》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从上下文割裂开来，把它们看做是历史的自我欺騙，“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具有比十七

世紀的英国和十八世紀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① 在这个预言中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具有……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② “一定要”等等。这个预言的一部分不到两年就应验了；这就是一八四七年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这一点应验了。一般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所做的预言是有条件的，决不能容许硬说一八四七年他们对于德国及其无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任何幻想。无论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是政治家和党的领导人的预见，目的在于鼓舞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这些预言是组织和斗争的号召。可是它们丝毫没有降低社会发展学说的科学价值，即使是在过于夸大其词时亦然。有一次恩格斯曾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且“甚至是在帝国议会的党团内部”，而另一次他说的又不同，甚至捍卫了“党团的策略”，这种情况也丝毫没有动摇理论。同样，恩格斯给《阶级斗争》^③ 一书所写的序言也与理论一点没有矛盾。恩格斯在这个序言中说明现代德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条件。伯恩斯坦硬说恩格斯在这个序言中似乎“公开承认他和马克思在评价社会和政治发展条件时所犯过的错误”，这是根本不正确的。在序言中没有这一类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斯坦期望恩格斯去世，以便把各种各样的“自愿的承认”硬加给他，并表现自己是比恩格斯更为深思熟虑的。照伯恩斯坦看来，“根本不能期望恩格斯会接受与此有关的对理论的修正”（第47页）。要是恩格斯掌握了伯恩斯坦的精神，“他必然毫无疑问地会完全清算黑格尔的辩证法”。可是对伯恩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503—504页。——译者注

② 布拉戈耶夫译成“在无产阶级充分发展下”。——俄文版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著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译者注

坦不幸的是恩格斯沒有这样聪明，沒有抛弃辯证法，而是作为辯证論者而死，因为，他当然不願抛弃科学理論，落入形而上学的云雾中。这个情况也证明恩格斯沒有想到“公开承认錯誤”，恩格斯沒有作馬克思主义理論站不住脚的任何“善意”承认，它們是伯恩施坦轻举妄动的結果。

把辯证法說成是“背叛的、背信弃义的因素”，以此来“駁斥”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說如此狂妄，誣蔑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相类也是同样地狂妄。当然这也就是伯恩施坦轻率思想的简单結果。布朗基主义不願知道物质条件，以及把革命的无产階級組織成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单独的階級政党。布朗基主义鼓吹一小撮組織成秘密的“革命会社”的勇敢的革命家进行革命阴谋，“革命会社”在方便的时候进攻当局，解除它的武装，并頒布法令，宣布为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同諸如此类的“理論”毫无共同之处。要詳尽地证明这一点是完全多余的。

伯恩施坦用所有这些可笑的、侏儒似的努力来“駁倒”辯证法，为的是敗坏社会民主党对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說的信任。伯恩施坦想使我們轉向形而上学。如他所說的，社会发展不是辯证地进行的，而是依照形而上学者的观念进行的。照他看来，发展只在于現象的緩慢的、经常而不中断的量的增长。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在于陈旧的、反动制度的范围逐漸縮小，新的、民主制度的范围逐漸增加。照伯恩施坦的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最初民主制度是极其微小的，以自由主义制度的形式存在着，然后慢慢地、可是逐漸地不断增加起来了，并且現在正在增加着，将来还要增加，数量上增加到无限，达到巨大的規模。誰知道自由民主制度的这种緩慢的、逐漸的、不断的量的增长将达到怎样的結局。对于伯恩施坦來說，这种知识是不重要的。对于他來說，“运动”才有意义；終极目的在他看来是沒有什么意思的。

其他一些社会现象伯恩斯坦也是以同样的尺度加以发挥的。比如拿财富的分配来说。依照伯恩斯坦的“理论”，最初人们都是贫民，可是现在随着财富的增加，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及其股份公司的形式下，财富向广阔方向增长起来了，也就是说每个贫民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股份企业的股份在贫穷的公民中间分配了！他们的财富的这种量的增长，照伯恩斯坦的“理论”看来是缓慢的、逐渐的，可也是无限的，不知道这种“运动”的结局将是怎样的。可是，如这种理论所说，有一点是可以没有疑问的，就是财富在公民中间更为广泛分配的意义上的数量增长，将逐渐地、不断地、不经扰乱、不经飞跃、不经革命而缩小不平等，直到这种不平等达到极其微小的程度为止，也许有一天资本家就会确信财富平等的利益，并兄弟式地把它与贫穷的公民一起来分！这一点之可以相信，正如小商品生产者之不会破产，而是相反地，照伯恩斯坦看来，他们的数目会增加一样！社会发展就是如此，“运动”就是如此！这种畸形的发展观念是在黑格尔之前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旧观念。伯恩斯坦就是用这种旧的、畸形的发展观念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的！

谁有耐性仔细地念一念伯恩斯坦的《前提》，并熟悉其中的内容，谁就会同意，伯恩斯坦的主要目的是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的科学性的信心。他除了乞灵于形而上学者的旧的畸形的发展观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疑问，伯恩斯坦能够影响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动摇分子，可是他不能动摇整个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精神上的成长是如此之大，以至伯恩斯坦想把它编成形而上学的网，以及通过它来编成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个企图受到了厌恶的对待。可是伯恩斯坦完全有意识地接受畸形的形而上学发展理论。他的改变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愿望是建立在破坏对它的信仰之上的。从形而上学的发展理论的观点看来，社会民主

党的策略确实是遭到破产了。确实，要是发展是依照伯恩斯坦的“理論”进行的，那末渐进的中断和飞跃就不可能了；因此，社会革命是一种虚构，同时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也是一种虚构。唉，既然如此，那提出这个阶级夺取政权和这个阶级专政的问题便是无稽之谈了。要是注意到，无产阶级照伯恩斯坦看来没有能力管理，不仅如此，而且它不是清一色的阶级，而是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那这就更加成为无稽之谈了。综上所述，关于现代世界阶级斗争的话也是无稽之谈，这也是可以了然的了。如伯恩斯坦所说，阶级斗争现在已经不尖锐，而是相反地缓和了，迟钝了，消失了。可是从他的“理論”的观点来看，它也应当如此，因为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矛盾正在缓和、正在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斗争的终极目的也失去了任何意义。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转变为公有，这个斗争的终极目的原来是无稽之谈，因为伯恩斯坦的“运动理論”对此无可谈者。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无论是就其一般部分来说或是就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来说，也都是无稽之谈。一般地说，照伯恩斯坦的发展“理論”来说，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原则全都是无稽之谈，都是不中用的、过时的东西。

因此他提出了适合于发展的“新理論”的新策略。新策略在于使社会民主党变为社会改良党，这个党将同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并将同他们并肩向着……越来越民主前进。与此相应，伯恩斯坦也提出了民主改良的一般纲领。可是为了要实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这个联盟，这个“共同事业”，必须使放弃了自己称号的社会民主党放弃革命的词句，不谈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所有这一切会吓倒资产阶级中的自由部分和民主部分的。伯恩斯坦特意向工人推荐合作社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要求，他把合作社对于工人的救济的意义捧上了天。照他看来，合作社使工业民主化起来了。合作社即使工人成为资本主

义生产利潤的分与者，就逐渐地使不平等現象平等起来，当然，是不经震蕩的。这就是伯恩施坦的“新策略”給予工人的主要安慰。“新策略”认为工人为捍卫自己的階級利益所进行的斗争是多余的事。应该代替社会民主党的現行策略的伯恩施坦的策略就是如此！它倒是完全符合他的发展“理論”的。

由此可以明白，伯恩施坦对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修正”或“批判”是极其肤浅的、轻率的，并且是从关于发展的旧的、畸形的幼稚观念出发的。伯恩施坦的“修正”要是不是故意歪曲馬克思主义，那就是极端糟蹋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智能。伯恩施坦的“修正”目的在于排斥明确的、严格科学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說，而代之以早已被自然科学、历史及哲学思想所譴責并且既不能为現在、也不能为过去、更不能为預見未来提供任何积极知识的“理論”。伯恩施坦的“批判”是对人类思想的科学成就、无产階級所作出的成就和获得如此光輝結果的社会民主党斗争的褻瀆。在这种“批判”中，一切都与现实发生尖銳的矛盾。当伯恩施坦注意过去的危机时，德国一般工商业的危机正大为肆虐，整个产业界正籠罩着普遍的农业危机。伯恩施坦說階級斗争松弛和和緩的时候，正是被資產階級借助于宪兵的刺刀和士兵的步枪鎮压下去的工人們的大規模罢工爆发出来的时候。無論指导伯恩施坦“批判”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說的动机如何，可是他向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策略，对于无产階級的階級利益、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理想、对于它的斗争，确实是絕對背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次代表大会几乎一致譴責伯恩施坦的“理論”和策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留比克召开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特別猛烈地譴責了伯恩施坦的片面的批判。代表大会的決議間接地要伯恩施坦二中擇一，或者放弃自己的行动，或者退出党。伯恩施坦答应注意決議。我們看看他以后将怎样做。留比克代表大会的決議向伯恩施坦及一切伯恩施坦分子表明：社会

民主党决不会接受畸形的伯恩斯坦的社会发展“理論”及以此为根据的背叛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策略^①。

可是伯恩斯坦的这种“理論”和“新策略”在保加利亚工人的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也找到了信徒。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員楊·薩克佐夫以保加利亚“生产者阶层”“共同事业”的形式接受了伯恩斯坦的无产阶级和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共同事业”⁶。伯恩斯坦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对立起来，并把这种“共同事业”看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增加政治民主主义的“运动”。楊·薩克佐夫在保加利亚把“生产者阶层”的“共同事业”也看做生产者向政治民主主义的“运动”。这样看来楊科·薩克佐夫只是把伯恩斯坦主义简单地搬到保加利亚土壤上来，沒有勇气公开地宣称自己信奉伯恩斯坦的“运动”。我們看到，伯恩斯坦在公开“修正”，即把馬克思主义学說当作不中用的、陈旧过时的和不科学的东西加以否弃之后，得出了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共同事业”。楊科·薩克佐夫領会了伯恩斯坦的“共同事业”之后，要不沒有理解邏輯上必然得出“共同事业”的那些基本理論观点，要不沒有勇气像伯恩斯坦那样直截了当反对馬克思主义理論。很明白的，楊·薩克佐夫既接受了伯恩斯坦的“共同事业”，就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則。当我第一次提醒他这一点时，如所周知，他暴躁地回答說，不是他离开了馬克思主义学說，而是我們狹隘地理解馬克思主义学說，把它弄得貧乏了等等。有几次邀請他就“寬广理解馬克思主义”和“这不就是保加利亚土壤上的伯恩斯坦主义？”問題发表意見，楊·薩克佐夫却以对加上机智标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态度是調和的。考茨基只是同志式地批判伯恩斯坦的发言，迴避了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問題，并同伯恩斯坦妥协，說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沒有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才給了伯恩斯坦主义以真正馬克思主义的評价。列宁要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与机会主义者立即决裂。——俄文版編者注

題的报刊評論作个人吹毛求疵来回答。只有这一点我才能用来解释下列这种情况：对于某些党内同志來說，我們的論战是不可理解的，并且一般地說他們並沒有予以充分严重的注意。可是在伯恩施坦的《前提》譯本問世之后，凡是有耐性讀完它們的人都开始明白了：論战对于我党具有非常重要的原則性的意义。問題是这样摆着的：我們接受不接受伯恩施坦的“理論”和策略？換保加利亚的說法就是接受不接受楊·薩克佐夫的《共同事业》？楊·薩克佐夫的策略是以鼓吹伯恩施坦主义和自荐为“寬广的”馬克思主义者来掩盖自己同伯恩施坦的精神上的亲属关系。可是如讀者們現在确信的，楊·薩克佐夫的“共同事业”实质上就是保加利亚土壤上的伯恩施坦的“共同事业”。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狹隘的馬克思主义，什么寬广的馬克思主义。

楊·薩克佐夫在鼓吹伯恩施坦主义时，力图把自己描写成最正統的、即寬广的馬克思主义者。《前提》的譯者更加露骨。他公开宣称說：社会民主党員不一定要成为馬克思主义者，只要承认“綱領”就够了；說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可以从資产階級作家那里获得；說社会主义者应当为了資本主义的利益与資产階級一起行动，而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一起反对資产階級爭取民主，因此我們將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①。这是絕对的伯恩施坦主义，

① 某位叫彼·熱·⁷的在《共同事业》第四期上談到我給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⁸写的文章之后，訴說我們的伯恩施坦派被理解得不正确，他們的发言和說話被传达得不确切，順便地說，并且責备我仅限于关于伯恩施坦翻譯者所写的小册子几句一般的話。直率地承认吧，談到小册子的話，有两个原因使我过去和現在都不想談它。第一，在小册子的大部分中，作者在搜罗了各种可怜的人对我的各种各样誹謗捏造之后，把我的論战方法說成是最卑鄙的，并且加油加醬大事渲染。我认为这些謠言不值得駁斥。因为相信大多数党内同志不会去听它們的，因此我认为駁斥它們是多余的事。我过去和現在都认为把它們当做誹謗和捏造就够了——再沒有什么了。至于驅使小册子的作者乞灵于誹謗的动机，現在来談是沒有好处的。我对他的个人态度不容許我这样做，并且我

可就是譯者也沒有勇气公开宣称这一点。如我們看到的，照伯恩施坦看来，要做社会主义者，甚至做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党员，都不需要馬克思主义；从资产阶级的理論，甚至是最为畸形的理論汲取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通过民主制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等等。《前提》的譯者在两点上表明其为彻底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伯恩施坦既抛弃了社会民主党的最高綱領，也抛弃了最低綱領，而我們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把承认綱領作为是党员的条件。可是这里有一个不彻底的外观。既然可以做党员而不是馬克思主义者，那末也可以不承认最高綱領，因为最高綱領是从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論得出来的直接結論。不承认馬克思主义就不能承认最高綱領。誰反对馬克思主义，誰也就反对綱領的最本质的部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綱領。伯恩施坦的翻譯者在談到承认“綱領”为做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唯一足够的条件时，他所指的只是最低綱領。可是仅仅承认党綱的这一部分，不能把党员說成是社会主义者。这种党员将不能对社会主义政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作出基本的区别。要是在某个社会主义政党中这种党员占多数，这个党可以随便自命为什么党，可就只是不能叫社会主义政党。这不过是最沒有觉悟的一群烏合之众，这种只是名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归根到底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才如此轻易地同意把“綱領”仍然作为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的唯一条件。这种党员沒有什么义务。

翻譯者的另一个不彻底性在于他的这个意見：社会主义者为

誠懇地希望将永远不会被迫揭破这些动机。第二，小册子的另一部分闡述了从伯恩施坦那里抄袭来的思想。实质上这些思想是如此站不住脚和如此貧乏，因此我认为沒有必要把讀者弄得疲憊不堪。我确信认识这些思想所由来的来源，它們的站不住脚就会暴露得更清楚。只有同伯恩施坦的市联系起来，翻譯者的小册子的这一部分的价值才能加以衡量。我在这篇文章中也就是这样做。

了資本主义的利益应当与資產階級一起行动，而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一起反对資產階級爭取民主制。可就是这也与伯恩施坦主义的精神一致的：全部問題在于向民主制的“运动”。要是資本主义資產階級反对“运动”，那末“民主制”当然就反对資產階級，因为那时資產階級就不再是“自由的”和“民主的”了。

我們既确信《前提》一书譯者的不彻底性只是一种外觀，我們就可以說小册子的整个概念乃是絕对的伯恩施坦主义。可是如已经指出的，翻譯者沒有勇气公开信仰它，而把讀者引入了歧途：据他說只要想一想，他由于其如此伟大的“洞察力”以致用“自己的智慧”发现了美洲！他的发现价值与伯恩施坦主义的价值相当。而伯恩施坦主义的价值是我已经表明了。

保加利亚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企图在“寬广的馬克思主义”和“寬广的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把伯恩施坦主义、伯恩施坦的“理論”和“策略”偷运到我們的党内来。可是沒有成功！我們看看他們将来能否成功。我在写这几行文章时相信社会民主党大多数工人的健全的理智，因此确信無論如何不能允許党跟着伯恩施坦主义走，抛弃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及根据它作出来的策略，接受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向我們推荐的那种畸形的“理論”及以它为根据的那种“灵活的”策略。

原載《新时代》杂志一九〇一年第
十一—十一册

譯自保加利亚文，据《第米特尔·布
拉戈耶夫选集》（两卷集）第二卷，一
九五一年索非亚版，第15—38頁

俄譯者沃洛比約夫

中譯者馮維靜

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⁹

这篇文章我很早就已想写了，然而由于等待今年夏天在特尔諾夫举行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的公布，給耽擱下来了。但是现在已经明确，这些材料在最近的将来未必能够刊印。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公布发言的決議，然而沒有預先考虑到做这件事所需要的款項，这就給党中央委员会造成为难，沒法实现出版的任务。然而发言的公布对我们來說本来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考虑到发言的公布虽是耽誤了，而代表大会上討論的問題却对党有重大的迫切意义，所以就不能对这些問題再擱置不談。

讀者已经知道，本文是論述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活动的。但是应当預先声明，我并不打算对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作詳尽的报告。这样的报告已由党的机关刊物《工人通报》在前些时候发表过，《新时代》杂志也登了一部分。我想同讀者們談談对代表大会上就党内的原則性分歧意見所作的历时四天的討論的想法和印象，这些分歧是在两年半以前产生的，一直保持到今天。大家知道，在特尔諾夫党代表大会上問題提得很明确，这就是：在党内存在着原則性的分歧，有一些党员以至一些著名的党员好几年来連續不断地、奸詐阴險地叛变党，力图使党在理論和策略問題上离开原則性的道路，而把党推上小資产階級庸人行徑的道路；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极其奸詐阴險地企图削弱党的力量和使党丧失斗志。在特尔諾夫党代表大会上，人們第一次向这一些党员，即所謂“寬广派”提出要求，希望他們說明在党内的作为。关于这

个問題的討論占去了很大一部分時間。假如保加利亚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楊·薩克佐夫,早在代表大会的工作刚开始时就起来发言和作解释,時間无疑可以節約一些。但是,他們遵循一种适应听众水平低下的情况的蠱惑性策略,利用听众的不坚定的心情,希望在其他代表讲完話后再发言,以便把結論留給他們来作。他們不顾代表大会一再催促发言(尤其是催促楊·薩克佐夫),一直等到所有其他代表讲完以后才发言,結果就把討論給拖长了。正因为这个原因,代表大会浪費了時間,不能研究列入議程的其他問題。我請大家注意这一情况,因为我国“寬广派”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說明了他們对党的策略。我們看到,这种策略是奸詐阴險的,类似敌人的策略,这些敌人力图从內部夺取堡垒,也就是在“寬广的社会主义”的掩护下把无产階級推到卑鄙的机会主义的道路上。

我坚决要求大家注意“寬广派”在特尔諾夫代表大会时期的所作所为,这是为了在以后的党代表大会上好留意这一点。我不想談他們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的其他方面,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說是极为卑劣的。^①重要的是向大家介紹一下机会主义者对党的策

^① 例如,热德洛夫在吃午飯的間歇時間,在举行代表大会的大厅的舞台幕后,召集了几次只有部分代表参加的秘密會議,这些會議显然具有宣传的目的。在部分代表参加的秘密會議上所作的这种宣传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我們可以根据热德洛夫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之后所讲的話来判断,他这話是在格·格奥尔吉耶夫¹⁰同志提出关于拨出一千列沃給党报的第二編輯的問題时讲的。当时热德洛夫公然宣称,他們的目的,也就是“寬广派”的目的,是使《工人通报》的两位編輯同志格·基尔科夫¹¹和格·格奥尔吉耶夫互相对立。薩克佐夫也是这么說,这是在我们坐着照相的时候說的。当时有一位塞尔維亚来的女代表德拉格涅娃同志坐在我們两人中間,有人(記不起是誰了)指出,她好像是联結“緊密派”和“寬广派”的桥梁。于是楊·薩·冷笑了一下說:“这就好像我們在基尔科夫同加符里伊尔之間架起一座金桥。”通过这就可以設想出来,“寬广派”在躲在舞台幕后举行的秘密會議上所作的宣传究竟是些什么了!无论如何,这种宣传“絕不”是为了使格·基·和格·格·两位編輯同志造成对立!真是对純洁的願望进行的純洁的宣传!要是能知道要求我国的机会主义者的这一願望得以實現的“党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倒是很有意思的。要是能听到促使他們

略的一般形式，所以我在這篇文章里就力求揭露他們的策略。

关于党内原则分歧、关于“宽广派”的行为的问题，在特尔诺夫党代表大会上不能不暴露出来。它不能不提到日程上来。基尔科夫同志在发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党内的分歧、某些活动家之背离党的原则和方法，已经妨碍了党的实际活动。原则分歧、某些党的活动家的背离党的方法而同时他们又都还留在党的队伍之内，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党的行动一致受到破坏。而如果党内没有行动一致，党就在实际上终止存在，它就已经不是战斗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一当我们党内出现了这样一些党员，他们在什么“宽广的社会主义”的掩护下背弃党的基础和方法，并且背叛地希望把党推上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道路，从这时候起，无论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中、党的领导机关中、党的监察机构中、议会党团中，我们党内的行动一致就开始解体了。要是最近几次党代表大会不觉察到这一点，不是严重注意党的队伍内形成的状况；要是未来的党代表大

值得化诸大力气来使格·基·和格·格·同志造成对立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倒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在这种场合还去问他们什么党的利益，不徒过于天真了。在代表们的幕后会议上所作的宣传显然必定是最高级的！楊·薩·在《共同事业》上对《新时代》上 Senex¹² 写的特尔诺夫党代表大会纪事所作的评述也属于这一类活动。楊·薩·在这些评述中说，Senex 对基尔科夫作了过分的赞扬，对党内有一些同志则加以攻讦，而这些同志天知道已经给党带来了多少好处！但是 Senex 从来也没有抬高过谁，也没有打击过谁，他仅仅是对比事实。基尔科夫同志也并不需要抬高。但是全世界机会主义的策略却是这样的：对那些有才干的党员、同志（他们的才具、对党的事业的忠心耿耿和学识都应当使我们高兴）的作用和威信总是横加贬损，而另一方面却又通过阿谀奉承、煽惑手段，使用鼓励卑鄙的食欲的手法，来使那些还不能够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堕落；楊·薩·硬说基尔科夫同志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编辑，虽然他已经替换巴卡洛夫¹³ 而担任这个工作了，并且以编辑身分在代表大会上作过关于报纸工作的报告，楊·薩·所以这么说，其目的也在于此。基尔科夫同志不是《人民报》的编辑，这倒是正确的，不过他是该报的撰稿人之一，这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楊·薩·为了尽力贬低基尔科夫同志在党内的作用——这一点对他是很重要的——就对事实横加歪曲。

会、要是党的本身不采取及时和必要的措施，使自己的队伍摆脱那种以“宽广的社会主义”为名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不结束机会主义者拿党的未来进行冒险的活动，那末社会民主工党就将徒具虚名了。

党没有明确而坚决地谴责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没有对有机会主义思想的人作适当的处置，这种情况对党、对党的实际活动所产生的有害影响，这里就不必多说了。两者必居其一：不是社会民主工党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是它蜕化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并且与此相应地进行组织、管理和活动。从雅姆波尔代表大会¹⁴起，历次党代表大会无不强调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强调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是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政党。而在雅姆波尔代表大会前夕，当某些党员曾经企图在“党内言论自由”的幌子下把党引上机会主义的道路时，雅姆波尔代表大会就坚决谴责了他们。在雅姆波尔代表大会之前及以后的其他各次代表大会，也都努力维护无产阶级性质和作为党的基础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¹⁵但是我们的党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只强调党的性质显得不够了。我们且不分析党的发展条件，只想指出在现在的状况下蛊惑手法和机会主义对党的影响可能是十分强烈的。党越是广开大门不审慎地吸收党员，越是不注意党员在理论上和原则性上的成长，在我们中间的机会主义的麻烦事就会越多，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道路的转变也就越是容易。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机会主义在我们党内继续不断地滋生蔓延，这是毫不足奇的。但是，我们看到，再要在我们党内容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那就是一件危险事情了。假如说在普利温代表大会上机会主义只是受到间接的谴责，那末在特尔诺夫代表大会上就不得不把这问题直接地提出来。在最近的这一次代表大会上，对我国机会主义者的行为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讨论完全是自发的、自然而然

地引起的。但是这次代表大会虽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問題，却没有要求結束党内的机会主义勾当；不仅如此，代表大会还允許机会主义在党内继续存在，这就犯了一个大錯誤。代表大会的这一錯誤的原因在于：并不是所有代表都能够了解我国的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性策略，而且其中的某些人由于脱离生活和党的利益，并没有认识清楚論爭的巨大意义。

代表大会上关于“寬广派”的行为的爭論，是在負責财务工作的書記同志作了关于党的状况和活动的报告之后就立即开始的。我国的机会主义者花了許多力气，來說服代表大会不去討論这一原則問題。首先他們想把实际情况說成这个样子：似乎分歧是两个党员^①的私事，这些分歧同全党无关，因而代表大会无须加以討論。然而，当机会主义觉得没法用这一点來說服代表大会以后，他們就举出这么一个論据：代表大会不是学院，无须乎在会上討論什么理論問題。但是机会主义的这个論据也不能說服代表大会不来討論“理論”；代表大会馬上就轉入了这一問題，于是爭論就开始了。本文作者根本没有参加这些爭論。他的出发点是：一年以来，他已经屡次十分詳細地談到“寬广派”的背弃信念行为和他們的所作所为，現在他觉得重要的是听听代表們对論爭的看法。并且机会主义者最后总应当相信，論爭并不具有在他和楊·薩·之間的个人斗爭的性质，而是全党的工作，同党的利益息息相关。他知道得很清楚，“寬广派”的最不可告人的願望无非是要他和楊·薩·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一場个人的唇枪舌战，这样就可以多一个借口，来把事情說成“个人爭端”。其实，前面已经說过，無論在代表大会上还是代表大会以外，他們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全体党员应当充分了解，这是我国的“寬广派”对党耍的花招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即布拉戈耶夫和薩克佐夫。——俄文版編者注

之一，他們的策略就是把討論說成是“個人爭端”性質的論戰，黨不應當關心這種爭論，而不是把它說成爲一場有關原則分歧和有關背棄黨的基礎和方法的行為的爭論。保加利亞“寬廣派”的策略其實同全世界所有的“寬廣派”一樣，就是在黨內散播一種言論，說什麼不存在原則分歧和背棄信仰的問題，只不過是斯托揚和德拉貢之間、“一些黨老爺”之間的“個人爭端”，諸如此類。要是下面這種言論在黨內生根立足，就是說認爲不存在原則分歧問題，也不存在背棄信仰的行為，有的無非是“個人爭端”、個人不和的問題，那就等於說，黨對卑鄙的蠱惑行為、黨的隊伍中的陰謀詭計和誹謗詆毀現象敞開了大門，組織渙散現象和其他鄙陋的機會主義伎倆從此都會抬頭。要是這樣，就不可能提什麼“寬廣派”和機會主義者的背棄信仰行為，也無從談什麼原則和理論論爭——沒有誰要聽這一套。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國的“寬廣派”在兩年半的時間里認爲無須乎參加原則爭論，反而利用《共同事業》、一些小冊子並通過代表大會竭力把事情歸結爲對個人性格的吹毛求疵，把論爭說成是某一個黨的活動家的私事，使之染上“個人爭端”的色彩。我國的機會主義者對黨採取的陰險的策略便是這樣的。可惜的是，應當承認，這種陰險的策略對某些黨內的同志發生了作用。特爾諾夫代表大會的某些代表作了相當努力來掩飾機會主義者對黨耍的花招，雖然這些機會主義者早就不能允許留在社會民主工黨之內了；這一情況加重了上面說的那種現象。

不過請允許我再向所有掉在我國機會主義者的迷魂陣里的黨員奉告一句：假如把在兩年半時間里進行的那場論戰看成爲論戰雙方的私事，看成爲“個人爭端”的結果，而不是把它看成爲原則問題和某些著名的黨員公然背棄信仰的問題，那就意味着自己立足於社會民主黨的死敵的行列之中。

“寬廣派”的目的就是力圖在黨內散布一種言論，認爲不存在

原則分歧、不存在背弃信仰和叛党行为，假如有党员这样看问题，那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私愤，出于对被指责者的嫉妒心。从论争一开始他们就把事情说成是这个样子，这两年半来他们一直这样说。你们不妨读一下《共同事业》第二、三号（创刊以来第三年的），看看杨·萨·是怎样要自己的轻信的阅读者相信，本文作者说他背弃党的原则，是出于个人的动机，是因为和杨·萨·的私交不睦，而杨·萨·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这些！那时我可以不计较这些卑劣的政治手段。然而现在已经到了撕破这些叛徒——“宽广派”，首先是杨·萨·——的假面具的时候了。杨·萨克佐夫及其朋友（真是党的运气好，这些人已经早就离开党的队伍了）的类似的（如果不是比现在的更粗暴的）诬蔑诽谤，笔者已经不是第一次领受到了。主要是在十年前发生的党与同盟之间的原则分歧¹⁶，以及当时杨·萨克佐夫的追随者对我所干的行为（这些行为同现在的并无二致），还都历历在目。但是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追悔以后，我总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忘却这些委屈，不计较自尊心。现在还谈得上什么对杨·萨·的私怨呢？这种私怨过去不曾有过，现在仍然没有。对杨·萨·同志有什么可以嫉妒的呢？是他的在我们看来高不可攀的特殊地位还是他的超群出众的才能呢？请问，有什么值得嫉妒的事以致对他怀有私恨呢？我们对杨·萨·同志十分了解，十分熟悉，所以知道像他这样一个政治家和作家究竟有多少能耐，因而对他根本不会有什么个人的嫉妒和仇恨。不是，不是什么个人动机，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迫使我们坚决反对他，而是由于他的品质，他作为一个党员的活动，他的机会主义，他对党的唯利是图的态度，以及他把党的事业归结为各种“生产阶层”的“共同事业”的作法，这表明他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武器。你们不妨翻阅一下这两年半来直到今日为止的《共同事业》，看看在它的社论和其他论文里究竟写些什

么！其中究竟有没有一点多少类似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的东西？所有这些论文是不是说明了在事变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不是说明了一些不连贯的思想在徒然地拚命争取读者，并且在其中表现出偏好“生产阶层”的愿望？在两年半时间里，这个杂志是不是在宣扬什么“共同事业”、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些思想是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等等的思想——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原理——全异共趣的）？你们再看一看，在两年半时间里，《共同事业》杂志有几次提到过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提到过它的任务和方法、它的原则。在《共同事业》上，党不见了，给它排斥掉了，党的任务为“共同事业”的任务、为机会主义所取而代之！同时，在两年半时间里，杨·萨·却装作一个大圣大贤的样子，自以为掌握了什么深邃的奥秘，妄谈什么马克思主义枯燥乏味，什么没有生命力的公式和“狭隘的观点”。他的行为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无论过去和现在，杨·萨·都犯有一个罪行——他没有勇气说出一些比较科学、比较靠得住的话来，他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散布对党的基础和方法的怀疑情绪，而主要的是，他怂恿人们不信任坚持党的基础和方法的人。对于杨·萨·的这种行为，能不能够、应不应该默然无言呢？在这里谈得上什么个人私仇、什么个人动机呢？总之，使我们分道扬镳的，并不是什么“个人不睦”，而是深刻的原则分歧：一方面是力图把党变为机会主义政党，变为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党，另一方面是力图维护党，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再也明显不过的。再重复一遍：凡是相信这场论争是“个人争吵”和“个人不睦”的结果的人，都是我们党的最危险的党员，是保加利亚机会主义者的叛卖策略的牺牲品。

其次，我国的“宽广派”比谁都害怕在党内、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理论争论。他们自然害怕讨论原则问题，

因为他們害怕党、党员(主要是雇佣工人、无产階級出身的党员)在理論上得到成长。只有在党员根本沒有理論修养或者理論修养很差的政党内，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蠱惑手法才可能生根。只有在无产階級的理論修养比較差的地方，例如在法国，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蠱惑手法才会在社会主义政党里滋生繁荣，以致使得社会主义政党变为无人领导。反之，在无产階級的理論水平比較高的地方，例如在德国，这些伎俩就无能为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的“寬广派”不仅逃避理論性的討論，而且千方百計地力图主要在无产階級的心目中貶低在党的机关报上或者在党的組織中进行任何理論性討論的意义。他們把这类討論說成是徒劳无益的事情，是白白浪費時間，把理論討論的活跃說成是不怀好意地希望妨碍实际工作、引起“爭論”等等。为了党的成长和加强党，任何理論討論都是必要的。但是对党内的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蠱惑伎俩來說，理論討論却有致命的危險。因为只有当党员的修养水平不高的时候，机会主义者才能順利地把党员吸引到机会主义那里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們用种种許可的和不許可的手段要把非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非馬克思主义者吸收为党员。他們对党組織中的任何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表現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并且千方百計力图避免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理論性的討論，把这种討論說成对党的实际活动是不必要的，說成是不可能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里无需論述在党内和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理論上的爭論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上面說的这些，我想就已经够了。

我不能不請大家还注意一个情况。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且还有理論斗争。假如有組織的无产階級在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同时不进行理論斗争，不进行保卫和宣传社会民主党的原則和方法的斗争，那末，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也是不能取得成效的。仅仅只有政治斗争和

经济斗争，而没有通过理论来加以阐明，这些斗争也决不可能是强大有力并能把无产阶级引向胜利的。只有在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由三个方面——理论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所组成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才能强大有力并能引向巩固的胜利。这里我们想起了我们的俄国同志列宁（一位著名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化名）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引述的一段名言，这段话是从恩格斯给《Der deutsche Bauernkrieg》^①第三版写的序言中引来的，它同我们感到兴趣的这一问题的有关。

恩格斯说：

“德国工人与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知识阶级’几乎完全丧失掉了的理论思想。如果先前没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创立起来。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思想，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深入于他们的肺腑。而这个优越处之无限重大，则有如下两件事实可作证明：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因原始式的蒲鲁东主义传播而发生着混乱与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由于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传播而发生着混乱与动摇。”^②

德国工人的第一个优越处，自然同时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优越处，便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优越处就是德国工人的高度理论兴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个优越处，照恩格斯的说法，是

^① 《德国农民战争》。——俄文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627页。——译者注

在于运用了英法工人运动“用高价换来的”丰富经验，使他們得以避免錯誤。

“必須承认：德国工人之善于利用自己所处地位的这些优越处，真是罕見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之强有力而不可战胜，也就是由于这一种可說是配合举行的攻击。”^①

讀者从我加了着重点的那些恩格斯的話中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不可战胜，在于“在其所有三方面……互相配合，互相联系”地进行的有条不紊的斗争。沒有理論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便是不可思議的。恩格斯的这些話写在一八七四年。当时的情况同現在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地位。当时他就向他們提示，“假如将来也会照旧前进”，他們就将永远在斗争者的行列中占据这一光荣地位。他的話是有先知之明的。但是在同一个地方他又对他們說了如下一番話：

“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在斗争和鼓动的各方面都加倍努力。領袖們特別必須愈加增进他們对于各种理論問題的知识，愈加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觀的慣例詞句的影响，而时刻注意到，自从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以来，它就要求人們去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朗的意识，用有加无已的热忱传布到工人群众中間去，必須日益加紧团结党组织和职工会組織。”^②

一点不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政治組織和工会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628頁。着重点是布拉戈耶夫加的。——譯者注

② 同上书。——譯者注

組織，也不僅在於工人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而且在於把這些組織和鬥爭同理論鬥爭聯繫起來。但是只有黨本身在理論上是強有力的，並且日益廣泛地在工人中傳布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時候，理論鬥爭才有可能進行。然而我國的“寬廣派”機會主義者卻對“理論”頭疼並且反對在工人中傳布理論。就在這兩年半時間里，例如在《共同事業》雜誌上，他們究竟進行了什麼理論上的階級鬥爭或者號召我國的工人作過什麼理論鬥爭呢？他們通過這個機關刊物在我國無產階級中傳布了什麼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知識呢？是的，他們是進行“理論鬥爭”的，不過是在黨內進行反對理論的“理論鬥爭”；他們是向我國工人進行宣傳的，不過是宣傳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理論”。因此，他們才在特爾諾夫代表大會上那樣使勁地要想說服代表大會不允許進行理論上的爭論。因此他們才對黨的機關報《工人通報》那麼不滿，因為它高舉着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旗幟，黨的旗幟，因為它不想成為他們的機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空想的武器，最後，因為它在工人羣眾中散布對機會主義的抗毒素——科學社會主義的正確的理論概念。因此，他們對《新時代》雜誌和巴卡洛夫同志的社會主義的著述活動、對一切可以妨礙他們在黨內和在工人之中傳布機會主義的東西才那麼不滿。但是黨的力量正在於“理論興趣”的增長，必須在我國“無產階級”中間盡量擴大這種“理論興趣”。只有到那時，我們黨才能成為強大的、充滿活力的、真正的社會民主工黨。

現在我們來看看代表大會上的爭論。這裡暴露出我國的“寬廣派”的策略的另一方面。我國的“寬廣派”從德國機會主義者那里牢牢地掌握了機會主義策略的一些最重要方法，奧艾爾在他給伯恩施坦的那個人所共知的勸告里曾經很精確地說明了這種策略。當伯恩施坦起來“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奧艾爾寫信給他說：“愛德華，你是個笨蛋。這種事不是說的，而是做的！”我國的機

会主义者所牢记不忘的正是奥艾尔的这个策略；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他们的想法不符合社会主义，他们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原则，他们甚至会愤怒地叫起来，“绝无此事！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我们坚决站在这些立场上，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你们歪曲了我们的思想，把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思想强加在我们身上；你们把马克思的学说弄得枯燥无味，诸如此类。”然而在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却正是人们所责备他们的那一套。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他们在为哪一个主人效劳。他们所干的勾当，也就是所有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所干的勾当（出入只是地方条件的不同），我们在列宁的上引书第7页上看到列宁有这样几点评述，其中有一点是可以适用于他们的：

“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社会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际上实行着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处分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①；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是这种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②

这四点评述中的任何一点对我国的机会主义者都是适用的。但是我加了重点的第三点评述无疑对他们最为合适。实际上，我国的“宽广派”早就已经溜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了，并且力图不是通过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悄悄地、狡诈地来达到

① 着重点是布拉戈耶夫加的。——俄文版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卷，第326—327页。——译者注

自己的目的，来败坏党。一当对他们进行了一些什么揭发，他们就赶紧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掩护起来，冒充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流派”的信徒，是主张对社会主义作“宽广”理解和“批评自由”的信徒。然而，列宁同志的如下一段话是对这种狡诈行为的公正答复：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如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装，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麼，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给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①

“宽广派”努力要说服特尔诺夫代表大会不讨论“理论问题”，但是代表大会不顾这些，决定首先讨论理论问题，到这时候，尽管杨·萨·在代表大会开会时作过主张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所有妖魔鬼怪合作的公然的机会主义演说，尽管他在代表大会上宣称，他曾经隐约想起过一件他还不能明确表达的事情，尽管波兹维里夫同志声称杨·萨·“误解了”，达贝夫同志声称杨·萨·“在走钢丝”等等；我再说一遍，杨·萨·本人和各个代表都作了好些声明，这些声明的含义全都是指责“宽广派”为机会主义、指责他们愚弄党，然而代表大会不顾这些而根据代表的发言作出了必要的评介，这时候，“宽广派”，主要是杨·萨·和热德洛夫、巴斯杜霍夫这两个代表，就以机会主义的外表出现了。这时候，他们就劲头十足地开始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勾当。杨·萨·那时还宣称，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党的原则，他的想法同那些责备他犯偏差的人完全一样，他之所以还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卷，第320—321页。——译者注

沒有进行解释,原因在于他由于受欺負而气昏了,因为說他背弃信念的責备是来得如此突然。显然,他认为有必要忘掉自己在普列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寬广派”和“寬广派活动”的声明,忘掉他曾經隱約想到过某种“新东西”,忘掉要我們同資產階級进行合作的主张,就是說,忘掉在这以前几个小时里所說的一切。他曾經声明过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声明当然到現在也不妨碍他用小資產階級的胡塗方法来“研究”保加利亚的“社会政治生活”。

特尔諾夫代表大会上的“理論爭論”是从譴責楊·薩·背离党的原則和方法开始的。叶紐·馬尔科夫斯基同志(舒門来的代表)在一篇詳尽的发言中揭露了楊·薩·的偏向。其他代表,例如柯拉罗夫同志¹⁷(也是舒門来的代表)、尤尔丹諾夫同志(普列溫来的代表)、察涅夫同志(戈尔諾-奥里亚霍維茨来的代表)、西捷尔·托多洛夫同志等等,全都支持叶紐·馬尔科夫斯基同志。他們在自己的发言中还順便談到楊·薩·在人民會議的特別會議上的发言中所表述的思想。我国的“寬广派”就抓住代表們对楊·薩·这一講話中的思想所作的批評,而对楊·薩·的其他一切行为置之不顾。他們把爭論縮小到这个問題上去:楊·薩·断言我們不反对小私有制,楊·薩·在第十二届例行人民會議特別會議的发言中發揮了“立宪理論”,在这些說法中有沒有背离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地方?热德洛夫和巴斯杜霍夫竭尽全力来证明在这問題上楊·薩·的思想同現今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前輩理論家之一卡尔·考茨基的思想是相一致的!而这在私有制問題上格外来得明显。

我沒有可能把这两个代表为了保护楊·薩·所說的一切話全部叙述出来。等到速記記錄公布之后我們再来詳細考察他們的言論。但是对于楊·薩·的“立宪理論”却終究不能不說几点意見。“立宪理論”不仅是社会主义者所不屑談的,就連正派的資產階級激进派也不屑談,只有像热德洛夫和巴斯杜霍夫这样的“寬广派社会

主义者”才会提出来要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加以重视。其次，这些同志为了一心要把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说成是根本无辜的（当时提出了倍倍尔在吕贝克大会〔斯图加特大会以后的一次大会〕上提出的决议问题，这个决议向伯恩斯坦提出他只有一个选择：不是脱离党，就是放弃自己的行为），就引用了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原理》^①和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伯恩斯坦的行为的决议，并且故意断章取义地引用这些材料。热德洛夫和巴斯杜霍夫对吕贝克决议的涵义和实质避而不谈，却抓住一个比较早的关于伯恩斯坦在党内的行为的决议。等到讲话的速记记录发表之后，我会再来讲讲这个问题。但是，在速记报告发表之前，对于这两个代表在特尔诺夫代表大会上引用倍倍尔的决议的方法要是还不能说些什么，那末对于他们引用考茨基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私有制的态度问题的言论的方式，倒是可以在现在说一说的。热德洛夫把自己的文章以《社会民主党和私有制》为题登在《共同事业》第二、三期中，这有助于我们来谈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是一种引用考茨基著作的典型，我们的“宽广派”想借这种引用为幌子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文章表明机会主义策略的一种典型，这策略就是：每当把机会主义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就公开说出主张来了。

首先，热德洛夫从文章一开头就立即把整个问题归结为在他个人周围的“大叫大喊”，这方面是同任何机会主义者都一样的。他显然是想说，问题之所以提出，并不由于这个问题对党有着重要意义，不是为了要向党说清这个问题，而是由于存在着一些喜欢“大叫大喊”的存心不良的同志。这无非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机会

^① 即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参见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原书出版于1892年，书中虽然已经反映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但这本书大体上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的。——译者注

主义者的那一套手法，是他們要想貶低問題意义的打算。为了这个目的，热德洛夫改变了考察这个问题的“方式”。但是在談論問題的本身之前，我想現在就先指出这一点；甚至热德洛夫“照搬”楊·薩·同志的言論时，也都不是逐字引述的，而是照自己的意思隨便轉述，尽管有几行还加了引号。因此，在作进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將从楊·薩·的講話中全照原文引用“一段”，何况他也要求我們这么做。下面这一段是我們在楊·薩·講話的速記記錄第23頁上看到的原話：

“我的同志布拉戈耶夫先生向你們宣稱，我們反对財產，并且我們以这一点区别于其他党派。首席部长先生对我这位同志答复說，正是由于我們反对私有制，我們就违背了我們要帮助現在的統治机构的願望。（总理达涅夫博士說：“显然如此！”）很好，但是我将要求把这个‘显然如此’全部取消！當我們說反对私有制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們并不否认个人占有自己的財產的权利；我們不否认有自己的衣着、自己的食物、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牲口、自己的田地的权利；我們不否认称之为个人財產的东西；我們反对的是剝削別人劳动、邻人劳动的用于生产的財產；我們反对的是剝削人类劳动的生产中的財產。但是我們不能反对那种用以开发自然力的財產。”

从楊·薩·发言中摘出的一整段話便是这样的，它同热德洛夫所杜撰的那“一段”全然不同。我們从上举文字中可以看出，楊·薩·明明白白是說“我們并不否认个人占有自己的財產的权利”，并且不仅“不否认称之为个人財產的东西”，而且不否认一般的私有制，不否认土地、劳动工具和生产資料的私有制。甚至更进一步：“我們不能反对那种用以开发自然力的財產”！实际上，我們分析了楊·薩·的思想之后，不仅不能在其中发现甚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子，而且还能找到那些只能从小資產階級庸俗民主主义者那

里听到的东西。但是我们暂且不来作这种分析。我只想着重指出，民主主义者同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楊·薩·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只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反对剥削别人劳动的私有制，但是他们不反对下面那种私有制，用楊·薩·的话来说，就是那种“开发自然力”的私有制。在楊·薩·的思想和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之间简直是毫无区别。因此，特尔諾夫代表大会上的同志们认为以上从楊·薩·发言中引述的这段话是否承认任何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断言党不能认为这种非社会主义思想是自己应有的，这些同志作得很对。所有那些认为楊·薩·的发言是机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同志，也都作得很对。然而热德洛夫和巴斯杜霍夫却把楊·薩·的思想說成同考茨基的思想完全合拍！从上述热德洛夫在《共同事业》上发表的文章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怎样证实这一謬論。我们看到，热德洛夫在其文章中，同他和巴斯杜霍夫在代表大会上一样，把下面这一問題搞混了，这就是：取代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管这些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具有什么形式）是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最終目的？社会民主党对这个問題的答复是毫不犹豫的：是！它的最終目的、它的理想就是消灭任何形式的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普列汉諾夫說过，承认任何形式的（大的、中等的或小型的）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人，要是他不是机会主义者的某一变种，也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至于社会民主党由以实行从私有制向公有制、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的方法問題，則是另一回事。但是对社会民主党人說来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即社会民主党的最終目的是把私人占有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变为一无例外地由社会来占有。無論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考茨基都沒有承认过社会民主党不是任何一种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反对者。考茨基只是談到过从小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方法，而这同我国机会主义者所强加于他的說法絕无类似之处。但是，为

了指出考茨基也是同他們自己一样的机会主义者，他們从他的著作中仅仅摘引了一些个别的思想，热德洛夫在其文章中就是这样作的。例如，热德洛夫从《沒收财产》这一章（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原理》一书第148頁）中引举了二三小段从考茨基的整个思想中剝离出来的話。这样自然就变成考茨基的想法同楊·薩·以及热德洛夫和巴斯杜霍夫的想法完全一致了。

向《新时代》杂志的讀者证明考茨基的想法同我国“寬广派”的想法并不一样，那实在会令人觉得可笑，不过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們現在把考茨基表述在上述那一章（該书第149—154頁）中的整个思想全部引述出来（沒有引述关于这个思想的詳細发展情况的論述），为的是使讀者相信我国的机会主义者一心要想把考茨基做招牌的意图是多么可笑。

“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根本沒有提到过沒收。这不是由于小心，由于害怕业主們离开自己，而只是由于对此不能說出什么肯定的东西来。只能肯定地說，经济发展的趋势必然要过渡到使大企业归社会所有和由社会经营（第149頁）……

然而可以滿有把握地說，经济的发展将使只剝夺一部分現有财产成为必要。经济发展要求的是把生产資料轉化为公共所有。但是这絕不触犯个人消費品的私有制（第150頁）……

向社会主义生产的过渡（着重点是我加的）不仅不要求剝夺消費品，而且甚至不要求剝夺一切所有者的生产資料。（第150頁）

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必要，是由于大经济引起的。集体生产也要求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但是，正如私有制同大经济的集体劳动有矛盾一样，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也同小经济相矛盾（着重点是我加的）。

我們已经看到，小经济需要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取消小经济方面的私有制是沒有作用的，这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正是要力求

使工人成为必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在小经济方面剥夺生产资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着重点是我加的)——即把从原先的所有者那里夺来的生产资料又重新交还到他们的手里。

可见，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同剥夺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绝无任何关联。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夺取他们任何东西，而且反过来可能给他们带来若干好处，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具有用为直接消费的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的趋势(第151页)……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是资本家在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社会主义社会将结束这一剥夺。

当然，经济发展不会因社会主义而停顿。反之，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能力使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同在现代社会中一样，大生产将日益发展，并把小生产排挤掉(着重点是我加的)……

现在农民或手工业者从小生产者转变为大生产的劳动者，在他们说是意味着从所有者转变为无产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情况恰巧相反，农民或手工业者在转到集体性大生产中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享受集体性大生产一切好处(着重点是我加的)。他们的情况将大大改善。这时他们之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着重点是我加的)已经不能与过去之由所有者变为无产者相比拟，更加不能同从小所有者变为大所有者相比拟。

小生产注定非灭亡不可。但是正是社会民主党才使全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群众有可能成为大生产的劳动者，而不至于降落到无产阶级的水平上去(第152页)……

到那时候，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不再是消灭落后企业和剥夺其业主的竞争，而是较为发达的企业和生产形式对落后的企业和生产形式的劳动者的吸引力。

一旦独立经营者害怕沦为无产阶级的恐惧消失了，一旦公共

的大生产的好处在各个不同方面向它的所有参与者都显示出来了，一旦每人都有可能享受它的优越性了——那就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再去拚命保持旧的生产形式（第153頁。着重点是我加的）。

……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将在短期内达到这一点，并且还是不采取剥夺的办法，而仅仅依靠赢利較多的生产形式所具有的吸引力（着重点是我加的）。

在农村的农业经济还没有成为商品生产、而主要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地方，这种经济还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若干时候。然后这些居民阶层也将能估计到公共的大生产的好处。

小经济向大经济的过渡——在农业方面也将因城乡对立的日益减弱、工业企业向农村迁移的趋势（这个趋势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必然出现的）而加速和变得容易起来（着重点是我加的）（第154頁）……”^①

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对待私有制问题的思想整个說来便是这样的，从上面这些引文（尤其是从考茨基和我加了着重点的地方）中显然可以看出，他說的仅仅是从小经济向社会主义大经济的过渡，仅仅是社会民主党用以最后达到自己的終极目的的方法，这一終极目的就是把一切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用“社会主义生产”来代替“旧的生产形式”。考茨基仅仅是說，社会民主党之用社会主义生产来代替小生产，不能用剥夺小所有主的方法，不能通过暴力，而要通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的吸引力。考茨基在哪里也沒說过社会民主党不反对小私有制，或者說社会民主党“不能反对开发自然力的私有制”，即反对小经济。恰恰相反，他斬釘截铁地断言：“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再

^① 参阅考茨基《爱尔福特綱領解說》，三联书店版，第116—120頁。——譯者注

去拚命保持旧的生产形式”，“小生产注定非灭亡不可”，“正是社会民主党才使全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群众有可能成为大生产的劳动者，而不至于降落到无产阶级的水平上去”。考茨基說，社会民主党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做到这点，不是通过剥夺他們，而是用事实本身，即社会民主党使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和分配形式成为占統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和分配形式。“向社会主义生产的过渡并不要求剥夺消费品，它甚至不要求剥夺一切所有者的生产资料”。剥夺只有对私有制和私人经营的大企业才有必要。是的，考茨基仅仅是說，在必需剥夺私有制的地方社会民主党才需要剥夺，而在不需要剥夺的地方剥夺就是不可思議的，这就是說，在一种場合下私有制将由社会民主党通过剥夺来消灭，而在另一場合下私有制将不经任何剥夺而消亡。考茨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只能这样說。这个思想同楊·薩·的思想絕无共同之处，这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了。

楊·薩·用自己的思想来反对我在今年夏天在人民會議特別會議上答复国王的演說时所表述的下面这个思想：

“我所属的那个党或社会集团却根本不那么认为。它认为，人类一度是生活在沒有私有制的情况下的，而人类又能生活在沒有私有制的情况下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这是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的信条。無論我国还是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同其他政党的区别，就在于他們认为私有制不是万世永存的制度。他們认为，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而現在也正在到来这样的时刻，这就是所有制曾经是公有的、并且正在重新成为公有的和将要成为公有的。社会主义学說和资产阶级的所謂学說之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見《走什么道路？》第4頁）

我在人民會議上所表达的思想就是如此。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同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同考茨基以及每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

人的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的这些正确的思想却把我们的机会主义者楊·薩·給吓坏了，他赶紧用自己机会主义的、“宽广派”的思想来反对这些思想。我之所以没有在人民会议上用插话来打断他的话，原因在于那里不是解决这种党内原则性分歧的地方。党的纪律感也阻止我这么做。但是，十分明显，楊·薩·就我们对私有制的态度问题所说的一切都只能使机会主义者、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最庸俗的民主主义者相信。但是他在代表大会上被揭穿之后，却像一切“宽广派”的做法那样，赶紧用考茨基做招牌，借考茨基的嘴来说出考茨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思想。无论是考茨基，无论是我们的“信条”即社会主义学说，都认为“私有制不是万世永存的制度”，“它将成为公有的时刻正在到来”。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嚷嚷说，不对，考茨基不是那么想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捏造他的思想。

从热德洛夫的文章和从我自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原理》中引述的那些话来看，热德洛夫只是引了这本书和另一本著作（《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中的几处个别的地方，而这几处都是同考茨基的整个思想脱节的。对别人的文字作这样卑劣的引用，为的是要从考茨基的著作中作出下面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妄诞结论。

热德洛夫在《共同事业》第二、三合期第42页上想用这样的话来说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无需乎触动后者^①的私有制；把小作坊和小农的土地变为公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公有在将来不会起任何作用。私有制是在现在的制度下起作用的法学范畴，但是到将来它就会丧失任何意义，因为它将实际上对社会发展不发生任何影响。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现在就不是反对任何私有

① 指小生产。

制，而仅仅反对在其中隐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一切病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个根据考茨基的著作作出来的虚假的结论，同考茨基的思想以及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绝无任何共同之处。这是最最庸俗的民主派的概念。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任何私有制”，即不反对“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因为无需反对它。反对它的是它的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经济发展。那末社会民主党是否保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呢？不然！不仅不保护它，而且公开宣称“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必然消亡。经过这一番解释我们就可以想像得出：热德洛夫、我国的机会主义者说，“把小作坊和小农的土地变为公有”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公有“在将来不会起任何作用”，他们的这些话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样小资产阶级的谬论。

我的这篇文章出乎意外地拖长了。希望读者不要因此责备我。我再说一句，现在已经是这样做的时候了，揭穿我国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率直指出他们在我们党内进行的卑鄙勾当，这种勾当正在公然败坏党的队伍、党的干部和我国的无产阶级——党的现在和将来的力量源泉。我知道，现在我国的“宽广派”仍将拚命把事情说成是“个人争执”，把一切都归结于“个人问题”。他们的策略也就在于此，这种策略的目的在于贬低一切能够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加强党的纪律和团结党的队伍的东西。全世界所有“宽广派”的策略都是阴险狡诈的，并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最为危险的。

党的纪律和党的前途要求我们谴责这种策略并且永远加以无情地谴责。因而，我们的党将来究竟是否仍旧是一个纯洁的、思想一致的和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还是转变为一个失去理智、动摇不定、让无产阶级跟在它后面做尾巴的可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政党，这全要看党员了。由所谓宽广派采取那么狡猾的手段偷运到我们党内来的机会主义要走后一条路。我们反对这么做，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谁要以为我们的斗争是“个人受委屈”的结果，他就是在帮助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彻底败坏党。总之，我们希望，“宽广派”在党的队伍中散布的迷雾终将彻底消散，党内的理论上的理智终将占上风并肃清机会主义。

我原想从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这本书包括三部分)中再就我们对私有制的态度问题引述一些材料。这本书比《原理》新。考茨基在其中更为详尽地就我们对“个人私有制”的态度问题发表了意见，尤其是谈到了“家园”以及与家园有关的物品在将来的意义。但是这只好留待来日了。

原载《新时代》杂志一九〇二年
第十二册

译自保加利亚文，据《第米特尔·布拉戈耶夫选集》(两卷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索非亚版，第39—62页

俄译者沃洛比约夫

中译者魏城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 我国有没有基础?¹⁸

作者前言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早在三年之前就有意写作了。当时在我国报刊上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基础?¹⁹但是这本书在当前也还是迫切需要的。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基础这一问题,近来是提得越来越明显了。由此可见,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答。这本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这个解答是不是完全,是不是明白,读者有权自己去判断。

读者从这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的作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且把自己列入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之列。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因这一点而同那些还没有固定组织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有着根本的区别²⁰,而这些社会主义者却在自己的行动中把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全都形容成只不过是一个可笑而虚伪的神秘宗派。但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同这种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远不止此。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对象是雇佣工人和将要从事这一种姑且说是社会职业的人,以及那些我们指望他们会迟早理解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知识分子。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将来的趋势如何的问题,这取决于

社会主义运动在将来所处的条件以及統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待它的态度。但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和平的、公开的和合法的活动是最为自然的活動。只有这种活动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也取得公认,好像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使之取得公认一样。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几乎在全欧洲都已被认为是合法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家知道,凡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已被公认和政府对社会民主主义者采取宽容态度的地方,就不会有人力图靠炸弹和炸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杜撰出什么革命来。美国、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国家的情况就向我们提供了这种例子。而如果我們不想重复对其他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錯誤的話,其他国家人民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

本书作者相信他准确地叙述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至誠地希望人們能够正确地理解他。

让我再說几句。这本书是在一个小省城^①里写成的,这里科学資料极其稀少。因此作者只不过利用了手边的一些資料。但是作者认为必須指出一些虽則他手边沒有但是讀者可以从中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比較詳細的情况的資料。如果讀者觉得第四章所列举的事实还不够多,希望讀者考虑到,在我国收集統計材料是非常困难的。我国的官方統計在几个最重要的方面都是糟糕透頂的。例如,关于土地的变动,即土地易手的情况,就沒有任何統計材料。其次,从农业信貸所²¹的公報中十分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看出究竟有多少土地被典质。由社会团体救济的貧民的統計材料根本沒有,諸如此类。在第四章中列举的某些材料,都是作者本人和靠一些朋友的帮助收集起来的,作者对这些朋友謹表謝意。最后,作者力图在所論述的对象的科学性所容許的範圍內通俗地叙述科学社会主

① 指特尔諾夫城。——俄文版編者注

义思想。这本书究竟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自会有公正的批评来指出的。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
——社会主义一詞及其含义。——举例。——
现代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的
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及其优越
性。——劳动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产品分
配。

您听，人们在谈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社会主义，说它在我国似乎没有基础，就是说它在我国没有容身之地。不仅如此，这些人甚至不去研究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说的原因，就把两件不同的事情——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混为一谈。难道这是同一件事么？最后，这些人又不写出片言只字来说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这是极其不好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我们来试着看看社会主义在我国究竟有没有基础。但是照我的看法，在这样做之前，必须先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了解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为了让别人能够判断我们究竟有几分是处，更有必要这样做。

那末我们就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是什么谈起吧。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们打算把它回答得尽可能明确。社会主义一詞起源于动詞社会化。而这个詞在保加利亚文里的意思是：使某种东西成为公有。我们通过一些例子就最容易了解这一点。

世界各国在三百年之前，而在我国甚至是在三、四十年之前，譬如說，要把一封信从这个城市寄到那个城市或者从这个国家寄到那个国家，就只得通过一些私人——基拉日亚(кираджия)^①，每个托他带信的人都要分別付錢給他。这个工作是每一个居民的私事。当然，当时信件之类的轉递是极其緩慢的，耗日費时，費用很大，周折很多。那时还没有一个像我們現在称之为邮政局的机构。但是那时已经出現了一些这样的私人，他們专门承包寄給一定地点的邮件，而寄給其余的居民点的邮件則由另一些人承包。

这样，譬如說，某些城市的居民要寄递信件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就得付錢給某一个人，而其他城市的居民为此也得付錢給另一个这样的人。人們终于发现这样来传递邮件既不方便又不合理。他們确信最好的办法是大家都把寄信件的錢付給一个人。不过付給誰呢？誰来为大家服务，并且这个人要可以证明不致于舞弊，能使信、书以及其他邮件的寄递进行得迅速、如期呢？誰能够真正給全体人民以这个保障呢？当然，社会本身，即全体人民可能做到这一点，就像現在到处所实行的那样。这样，信件的传递，即邮政，就成为社会的事業。全社会、全体人民付錢給共同的邮局，而邮局則必須一視同仁地传递他們的信件。現在在这件事情上花費的劳动和時間都比較少，它的价錢大为低廉，而且风险也較少。这难道不好、不合理和不方便么？当然不是。大概沒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假如有人向我們宣传說，邮政应当取消，每个人都要自己来关心信件和书籍的传递，这样的人我們会叫他疯子。但是这个事业并没有完全社会化，也就是說，并不是像应有的那样使全社会都能从这种机构中得到好处。这是显而易見的，因为人人都在同样地出錢来維持邮局，却并不是人人都在同样地利用它。有些城鎮、村庄，

^① 基拉日亚是用大車或馬匹承運貨物的人。——俄文版編者注

邮政不去或者到得非常慢。最后，由于大部分居民的貧困和沒有文化，邮政往往只給富人利用，因而邮政就比較地更貴了。而这一切事情本可以組織得使人人都能利用上邮政，而且花錢不多，耗費時間和劳动也很少的。

再举一个例子。五十至一百年前，而在我国是十五到二十年前，每个病人都必需自己找医生治病。誰都知道，無論过去和现在，医生都是想利用自己的职业来发财致富的，因此他們的診費总是多多益善，而大多数人民却是穷人，他們沒法去就医，只得死去并把疾病蔓延到全社会。即使是有能力請医生上門的人，也不能从这种治疗中得到什么有益的结果，因为他們的居住条件不好，要不然就是飲食和照料欠佳。于是疾病重又蔓延。漸漸地人們开始意识到，大家共同出資，在公共医院組織治疗，病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良好的飲食、合适的住处以及必要的看护，这样更合理些。而这是什么意思呢？用于国民保健的資金难道不是社会的么？这样好不好呢？該不該否认公共医院的好处呢？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并不是所有資助了公共医疗的人都有享受它的机会。首先，由于公共医院并不是处处都有，而只設在城市，离开小城市和农村远得很。其次，由于很大一部分居民都是穷人和沒有什么文化的人，他們就不能享受医院的治疗。同时，現在还有許多病不只对你我有威胁，而且威胁着全社会、全体人民。这些病的起因何在呢？起因于力不胜任的劳动、不好的飲食、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人們現在还在过着的今天不知明天事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这就是現在为什么要花费大量金錢、時間和劳动而仍然不能使人民保持健康的原因。难道不可能消除疾病的原因，使得公共医疗人人都可享受，并且使照料人民健康的工作便宜一百倍么？当然是可能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于国民保健的資金成为真正是公共的、社会化的。

还可举一个例子。过去是根本没有学校的，誰要想教自己的孩子念书，就得亲自来教或者为孩子找寻教师。后来，富人們开始联合起来給自己的孩子办学校。显然，富人有时間学习，因为他们不参加劳动。随着教育的普及，他們想開設程度較高的学校。但是創辦这些学校需要大量費用，这样的費用只有全体人民才出得起。事情也就果真是这样办了。尤其是在現在，高等学校即大学、中学和其他教学单位的开支都是一古腦儿由全体人民負担的。这就是通常所說的連学校都归根到底成为公共事业了。但是这些公共学校的开支既然由大家来担負，却不是人人都可能享受它們，那些比誰都負担得多的人，最少享受甚至根本不享受它們，因为一大部分人民工作繁重，并且都是穷人。同时，人們又規定只有在一定年齡(例如二十一岁)以下的人才可以上学。

为了說清楚“社会主义”一詞所由以起源的“社会化”(即使某物成为公有的)这个动詞的意义，还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像电报、铁路、公路和桥梁的出現以及城市街道照明等等。但是最好的例子还是下面这一个：

过去(在某些发展落后的民族中至今仍然如此)，每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劳动者都同时就是劳动工具的占有者，他用这些工具来生产生活必需品。每一个家庭都亲自生产維持家庭成員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們且以欧洲和美洲为例。那里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很大一部分人民已经变为或者正在变为无家可归的工人。例如，巴黎人类学会教授列都尔諾說，“英吉利的一半属于一百五十个人，苏格兰的一半属于十个或者十二个人。十七个业主掌握着一百万公頃^①以上的土地，价值二十五亿；在英吉利的三千一百万公頃土地中，二千二百三十八人掌握

① 一公頃等于十决留姆(土耳其制)。

着一千六百万公顷。在法国,最近的調查表明,情况亦复如此,那里尽管有大量的土地,大所有权仍然扩展到全部納稅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五。”^① 这种情况几乎处处存在,出入很小,而这些微小出入也在逐年消失中。一切現存財富的生产都是在工厂中使用机器进行的,这些工厂的規模有如我們通常的城市。在这些工厂中,几千部噴火的机器和好几十万雇佣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着。工厂和机器就同土地一样,都属于由不足一百个人組合而成的为数不多的公司,而全体人民却变成为了图取仅够維持生活的工資而一天劳动十到十四小时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之間的劳动分工十分精巧,每个工作人員只生产一件物品的一部分。例如,生产縫衣針的工厂中的分工是这样的,一些工人做铁絲,还有一些工人把它切断,第三部分工人抛光,第四部分工人車針尖,第五部分工人做針眼,諸如此类。用这种方法,花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在工厂里做出几百万枚針。因此,在工厂中同在农业中一样,人民的劳动是集合起来的,在工人中間有精确的分工,并且組織得能使每个工人生产尽可能多的物品。这时,工厂中和土地上的产品都不是为了滿足制作者或是工厂主的需要而生产的,而是为了全体人民、各个民族的人民,甚至可以說是所有买得起这些产品的主顾。从这里难道还不能看出,人民的劳动和財富的生产、产品的生产已经帶有公共的、社会的性质了嗎? 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問題,便会发现生产是掌握在几百个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即为了致富获利而管理生产的私人手里。这一現代社会制度中最大的矛盾和当前社会的最令人憤怒的不公正就在于: 千百万工人生产着大量財富却一貧如洗,而这些財富却給几百个人所霸占去。最后,現在的商品生产进行时並沒有任何預先拟定好的計劃。工厂

^① 列都尔諾:《道德的进化》,一八八八年巴黎版,第388頁。

主和地主生产物品的时候，不知道它的需要量有多大和哪里需要这些物品。因此現在的市場上老是充斥着非常多的商品，終于使这些商品成为冷背貨，卖不出去。而这种市場上商品过多的現象又使得进一步的生产停止进行，工人大軍失业，貧困与极大量的財富同时并增，而使得国民经济即工业、农业、技术等等的继续发展成为不可能。这里就很明显，必須实行完全的社会化，把工厂、机器、土地、矿山、交通工具，即全部社会財富的生产資料由私有变为公有，即社会所有，并按照全体人民即生产者本身的需要根据統一的、准确地制訂出来的計劃組織社会生产。

总之，把全体人民的生活、健康、精神和道德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資料社会化，即变为公共財產，就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說的一般內容。把現在的私人資本主义生产变为公共的生产，把一切生产工具——机器、未耕地和已耕地、矿山、交通工具都变成由專門的工业机构管理的公有財產，把現在的私人資本主义占有社会財富轉化为由社会来分配这些財富，也就是說，使所有的人(同时也是指每一个人)都可能享受分配，——当前的、現代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目的就在于此。那些遵循这一学說并且努力传布这一学說、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就叫作社会主义者。

我們已经說过，現代社会主义最主要目的是把生产資料和財富的占有从私有轉变为公有。这是現代社会主义者的最主要的意图。事实上也只能这样，因为一切都取决于社会財富的生产是怎样組織的。如果生产組織改变了，所有其余的东西也就自然会改变——所有其他設施都将自然失去作用而为新的、符合这一新組織的要求的設施所取代。舍弗萊說，“因此，現代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力求根本改革現在存在着的经济秩序，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①

实际上，一旦生产資料由私有变为公有，这些生产資料就会立

即变为能使人民强盛和自由的公有的和其他形式的手段。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弗·恩格斯說：“无产階級(即工人)夺取社会权力，并且运用这个权力把脫出资产階級掌握的社会生产資料轉归全社会所有。这样，它就使生产資料摆脱它們先前作为資本所具有的全部属性，而使它們的社会本性能够完全自由发展起来。从这时起，依照預先規定的計劃来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階級的继续存在成为顛倒时代的現象。随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将消亡下去。人既已終于成了自身社会生存的主人，因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①

所有这些都是顛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很晚才为人民和每一个人所觉察到的。究竟什么是对于人民和每一个人說来最为重要的事情呢？难道不是指使每个人和他的家族能够吃得飽，在飲食、衣着、居住、健康各方面有保障么？这是人民的生活以及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首要条件。其他一切都依此为轉移。社会的真正目的即在于此。正因为这原因人們才在一起共同生活。然而我們看到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从我們所知道的历史时期起，直至現在，各族人民及其家族从来也沒有在最必需品上得到过保障。在国民经济中就是現在也仍然是一片无人领导和杂乱无章的現象。一切都取决于个別人的任意胡为，而其中起指导作用的又是私人利益的斗争。人类历史是各个階級为了保卫自己的个别利益和在生活資料上取得保障而进行内战和国际战争的历史。人們在一百

① 柯·舍弗萊：《社会主义的本质》，一八九一年日内瓦版，第2頁。（舍弗萊 [Scha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一八五一——一九〇三]，奧地利的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一八七一年曾任奧地利的商业部长。——譯者注）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154頁。——譯者注

年前才开始承认这一点。例如，上世紀末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写道：“造成各族人民間由于地界而存在的普遍的敌对关系的，还有一个新的原因，这就是商业利益；由于商业关系产生了普遍的隱蔽斗争。在促使每个人为自己謀取好处的私人利益上，还得加上迫使別人失敗的利益；人們时常是幸灾乐禍的，尽管他們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只是干了一件坏事……这些商业利益的斗争时常是在别的借口下开始的战争的真实原因……最后，从商业利益中产生出一些簡直难以想像的野蛮的政治概念，而由于这些概念产生出战争，这些战争的原由已经无可隱諱，而为人人所共見了。”^①早在約五十年以前，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曾經更明白地讲到这一点。“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貴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簡短些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終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隱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結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階級同归于尽。”^②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各个階級的这些內战和国际战争，各族人民很容易服从严格的国民組織，军队就是这种組織，每个人到达二十一岁以后就必須在军队中服役二年或者三年，而国民经济——一切工作的基础——却至今仍然沒有任何严格的和必需的秩序。人民幸福所系的那些工作——人民的劳动和人民的生产——仍然沒有任何严格的有計劃的組織。

实际上，是誰占有着各种借以生产社会財富的手段（土地和生

① 費希特：《閉关自守的国家》，欧洲作家和思想家丛书，一八八三年彼得堡版，第110—11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465—466頁。——譯者注

产工具)呢? 几千个私人占有着这些东西。无论哪里,物品生产本身都是由几千个私人或者几百家资本家的公司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而管理着,没有任何社会的、人民的或者某种受人民委托的机构的监督。这样能行吗? 能把最主要的东西——整个民族的国民经济——仅仅让一些私人来掌握,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私利来管理国民经济吗? 不管这多么荒诞不经,然而却是事实。我们看到,人们进行物品生产时并不考虑一定数量的人们的需要,也不管这些需要究竟有多大,就是说没有任何计划。我们已经说过,由于这个原因,现在在市场上商品越来越过剩,这些商品都不可能找到销路,因而生产陷于停顿。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使千百万工人的劳动归于无用,生产资料白白耗费,于人民毫无好处。天下的蠢事莫过于此,然而这种蠢事却在在皆是。劳动产品出厂以后转售给买得起它们的人的工作,即商业工作,也是进行得十分不合理的。实际上,物品即商品从工厂到达买得起的人即消费者、买主的手里,必须经过几千双手,经过几千个商人、中间人、经纪人、萨姆萨儿²²和各种转卖商之手。结果怎么样? 我们且不说物品的价格抬高了,就说有多少时间白白耗费掉,多少人民的劳动归于无用呢。然而,在那些在发展上落后于其他民族的人民那里,所有这些还要进行得不合理。

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只要在这些民族的城市和农村中走一遭,就会相信这一点。首先我们看看农村中的情况。第一,我们将看到土地都分散在大量农民中间。他们怎样耕作土地的呢? 使用原始的犁和原始的方法,一天工作十六到二十小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科学、艺术和技术有可能使人们少费几千倍的劳动多生产出几千倍财富的时候,却有多少人力白白耗费掉,很大一部分人民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 为什么人们不去利用这些可能性呢? 据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愚昧无知。例如,在我国,有一些区的管理员和巡回农业教师²³常常抱怨人民无知,因为他们不想买机

器。^①这是不是事实？的确，农民不想买机器。然而他们为什么不买？当然首先是由于机器要值许多钱。其次，我们且假定农民买得起机器。那么请问，他们能不能使用这些机器？要知道，如果用机器操作，就得把土地集中在那些有机器的人的手里。要不然最好的机器也是一无用处的。假如农民的土地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段上，农民能不能使用机器和运用一切农业中的技术革新呢（纵然他甚至拥有几百公顷地）？显然不能。别的民族的人民使用着机器，然而我们在那里看到，土地都集中在几个大地主手中，而农民变为单纯的雇佣工人。如果把农业国民经济转移到几个大地主手里，让他们随心所欲地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管理农业国民经济，而农民们都变为无家可归的工人，那又是否合理呢？无疑是不合理的。但是更不合理一千倍的是：整天在田里弯腰劳动而毕生没有想到自己还是一个人，永远过着贫困的生活，懵懵懂懂地过一天算一天。如果人民还在这样的阶段上，那不用说，就意味着他们必定要永远贫困下去和永远不能独立。为了使这种情况万世永存，别克尔说得很好，就需要宣布在一切方面都抱着安分守己、平稳度日的思想。那样会有什么结果呢？显然，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变土地为公有，而把农业管理变为社会的事。艾米尔·德·拉维列^②说：“为了使贫困不致发展到像财富所发展到的那种程度，乔治先生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把土地变为国家所有……斯图亚特·穆勒在晚年曾建议，由于集体的（普遍的）、社会的、公共的进步而不是由于业主的个人努力所得的地租（收益）的增加部分，归国家所有。”^③

① 参见一九〇〇年区管理员向区管委会的报告。

② Emile de Laveleye, 一八二二——一八九二，比利时经济学家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③ 艾米尔·德·拉维列：《现代社会主义》，一八八八年巴黎版，第303页。

現在我們來看看落后民族的城市里的情况。無論你走到哪里，有一件事总使你为之吃惊：这些民族的人民根本不珍惜時間，不珍惜劳动。实际上，你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走过时能看见些什么呢？几千个小店主出卖着同样的商品，几千个手工业者不得不从早到晚都盘着腿、拿着針弯腰曲背地干着同一件事。这是怎么回事？他們滿意嗎？健康嗎？有錢嗎？有文化嗎？我們知道他們的情况。每个人一觉醒来就得耽心——他今天能卖掉些什么？明天和后天会不会有粮食吃？他怀着不可告人的嫉妒心理，怀着想使所有其他的商人垮台而只留他一个人这样的不可告人的願望，来開設小店，他的头脑里还充滿着許許多多其他非基督教的和不人道的願望。我們且不說这个。然而人民白白地耗費了多少劳动、多少時間，而所有这些事情本来可以有另一种作法，这些事情本来可以組織得让每个人都过有保障的生活的。

实际上，假如每一城市都設置一个公共商店来代替几千个小店，時間和劳动是不是会少花費一千倍呢？在这种公共商店里人們可以根据国民经济所生产的一切商品的陈列样品进行定貨。这种商店同区的公共商品倉庫相結合，而公共商品倉庫又同各个公民的家庭有直接联系，这样这些家庭所預定的商品就会送上门来。你說，这是不是幻想，这样是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不是。現在在欧美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已经出現了。你到巴黎、伦敦、紐約和世界上其他城市去走一遭，就会見到大商店里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的，不过只有富人才能享受这些方便，并且在这上面还是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劳动。其次，如果我們在上面提到过的几千个手工业者，不再每一个都每天盘腿坐着、拿着針慢慢磨蹭十五到十八小时，而是都集中在一两个保加利亚的工厂里，用机器操作，那又会多么轻而易举地解决我国全体人民的衣着問題呢！如果整个国民经济被划分为若干个部門（部門的多少根据充分为人民服务的

需要而定)，而每一部門都將使用機器、工藝、技術——那時只要化費一些微不足道的勞動就可以使人人吃飽、穿暖、身體健康！

總之，如果國民經濟變為根據預定的計劃組織起來并由人民所委任的機構來管理的公共事業，其對每個人的利益是難以計量的。實際上，如果生產資料成為公共所有而國民經濟有了嚴格地規定的秩序，如果用這種方式生產出來的財富由主顧在公共商店里直接購得，從中得到的最主要的好處將是：一切現存的擁有大批非生產的官吏的機構都會成為不必要，而國民經濟卻得到了一批新的生產力，這些生產力到現在為止還都是由國民經濟白白供養着，對國民經濟本身一無好處。其次，現在每個人都把別人的不幸視為自己的幸福，這種秩序之下存在着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嫉妒心理，到將來這些現象都會消失，而代之以高尚的競賽——每個人都應當履行自己對社會的責任，而社會允諾給每個人以安寧的生活。另一方面，隨着至今仍為很多犯罪行為之根源的貧困的消滅，警察和監獄都將沒有必要。最後，隨着現在的商業以及一切商業設施——各種高利貸行為，金錢，交換，出賣和建立在私人利益鬥爭的基礎上的其他設施——之消滅，在公民之間的年深月久的爭執的根源也將會消失，現在的法庭及其混亂不堪的訴訟程序以及為數眾多的律師都將消失。簡而言之，一切使人冷酷無情、使人不再像人而更像野獸的東西都將消除。

社會主義者要求實現這種社會制度，他們並且正在循着這一方向進行工作。

關於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的各項重要原則，我們在這里就不說了，因為這說來話長，很費時間。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原則的人，可以讀一本社會主義方面的最主要的著作——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或如舍弗萊所稱呼的，這是工

人的《新福音书》)①,可以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舍弗萊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美国人貝拉米②的《未来世紀》(《一百年后》)③。在本书中我們將限于叙述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最主要原理的問題。什么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原理呢?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就是說,无论是谁,在受过了教育之后,都必须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参加若干年国家生产,经过这种人人都必須遵守的生产工作之后,还得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能力为社会工作到一定的年龄。每个人享受社会生产的財富的权利将只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劳动的社会效益。Qui non laboret, nec manducet——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道德准则将成为社会主义秩序的主要基础。这条准则只有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得到完全正当的运用,并且将成为激发人們从事劳动的最主要的力量。现在的劳动对一些人說来无异受惩罚,而对另一些人說来則对它感到厌恶,其原因在于劳动是过度的,十分沉重,而劳动产品又不归那些劳动得最多的人享用。另一方面,由于貧困和国民经济管理的不合理,人类不能完全把能力、机器和全部技术知识用于生产財富。因而社会必要时间就比社会主义社会里可能有的时间来得长。在社会主义社会,使用体力的粗笨的手工劳动将全部被机器代替,劳动将成为一种使人只会觉得愉快的义务,而由于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可以完全得到保障,这种义务感还将增强;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縮短到极小的程度。

① 能讀法文的人,最好是讀法譯本《資本論》,因为这个譯本是馬克思审查和增訂过的。

② Edward Bellamy, 一八五〇——一八九八,美国作家。这里提到的《未来世紀》有中譯本,名《回顾》,商务印书館一九六三年版。——譯者注

③ 懂英文的人,可讀美国人劳伦斯·格呂恩兰特有关这个問題的一本书,《合作国家概要》,英文版,一八八六年版。(格呂恩兰特[Lawrence, Gronland, 一八四八——一八九九],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和作家。——譯者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社会、人民生产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时所必要的时间。这当然决定于在生产必需品时所运用的技艺和工作紧张程度的平均水平。没有疑问,随着机器和技术知识的应用,人民的平均技能水平会日益增长,而紧张程度则减少……例如,照目前我国人民的技艺和紧张程度,要生产全部生活必需品,每个人平均每天至少得工作十四小时。使用了机器,这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减少一半。照现在的条件用机器来生产物品,据计算,其他民族人民的社会必要时间不会多于六小时。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按照人民的不同需要把国家的生产分配给各个部门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将规定每人都要亲自参加人民的生产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劳动时间无疑将比我们现在所假设的要少,可能要少一半左右。劳动时间减少到这样的程度,劳动当然就不能不成为一种胜任愉快的义务了。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工作人员的劳动的社会效益将成为在各人之间分配社会财富的依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劳动的效益才有意义,而每个工作人员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则没有意义。人们的才干和能力各有不同,可能会永远有这样的情形,然而这绝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并不违背正义感。对社会来说,有意义的是一件事,就是人人都在工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一个较有能力的人工作劲头比较小,而另一个能力较差的人却工作劲头比较大,那末,社会和人民当然总是对后一个人表示更多的敬意。然而在实际上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给能力较差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人的酬劳,同给较有能力而干劲较差但是生产的数量却与前者相等的人的酬劳比较起来,来得少一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实现的是这一条伟大的道德准则:“给谁的报酬多,问他要的东西也多。”^①

^① 参见貝拉米著:《未来世纪》,一八九〇年彼得堡版。

然而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分配社会财富的原则是依这些财富的生产方式为转移的。而由于一切都依生产方式为转移，所以随着现在私有生产之改造成为公有生产，人们的道德概念也会得到改造。

马克思说，分配方式的变化，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机体，并且取决于生产者的历史发展。自然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因为人类良知的一切感觉、一切行动无非就是物质世界即现实界的变化了的反映。朗格说：“没有疑问，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定不承认感觉是离开物质的东西而存在的。同样，他认为良知的表现也无非是通常的物质变化的反映。”^①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人的意识也会在短期内得到改造。

现在自然不会有一人说社会主义制度会在明天或者后天就实现。然而有一点终究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我们越是往前走，就越是能够意识到：历史发展正在把我们导向社会主义。只要留意一下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再留意一下现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各地风起云涌的情况，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变革为期不远了。恩格斯说：“而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到那时，由他们所发动起来的社会原因才在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②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正是这种情况。

唤起这种认识、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发展规律、指出人类未来的自觉的历史发展的途径的学说，这就是社会主义。

① 朗格：《唯物主义史》，一八七九年巴黎版，第30页。（参见中华书局版《朗格唯物论史》中译本上卷第29页。——译者注）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152页。——译者注

第二章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各族人民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阶级的起源。——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古代人民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世纪封建的和行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近代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它吸引各国人民走上这一发展道路。

从上面这一章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主义这种学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看到，现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正在日益社会化，一切东西正在变为公有的，这也就是说正在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简而言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在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

实际上，各国人民的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依赖于生产产品时所依据的方式的，也就是依赖于物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说过，现在所有的产品都用喷火机器大量生产，而这些产品的交换则通过买卖关系进行，在买卖时，产品的价值用货币来决定，因此，现在生产品都要转化为商品，而商品又转化为货币，货币又重新转化为商品。产品的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自然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而只是在以前的一个时期里才形成。例如，从前有一个时候人们就没有任何生产物品的工具，这时的人们当然是极其贫困和软弱无力的。后来，他们发明了弓箭，学会做石链、铁锹和其他器具，然后又发明了犁，学会种粮谷、熔化金属并加以使用。自从人们发明了第一批工具时起，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生产都还是公共的。当人们有弓箭的时候，他们已经以或大或

小的公社、或大或小的民族的方式生活了，在这些公社和民族之中，工作由大家来做，而由共同的劳动所得到的产品则在公社全体成員中間进行分配。例如，当人們主要从事狩猎的时候，各个以狩猎为业的公社的情况便是这样的。当各公社已经开始从事农业时，土地就属于整个公社，成为公有财产，大家共同耕种，收成由公社的成員共享。例如在各个原始部族中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种秩序的遺迹至今仍旧能在某些国家的农村中看到。例如，据斯特拉本的证明，印度的土地就曾經是公有财产；大家出力耕种，收成归公社的成員共享。在印度的某些地方这种公社一直保存到上世紀末。在斯拉夫各族人民中（例如在南方斯拉夫人中），在不久以前还有“大家族”（“задруга”）存在，而在俄罗斯人中至今还存在着农村公社，公社的土地是公有的，只是偶尔在公社成員之間进行重新分配。在原始公社或者在“大家族”中，根据年齡、性別和一年中時間的不同按照計劃进行劳动分工。例如，在印度的农业公社中，劳动分工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人必需劳动，生产和公社的管理工作由选出来的公职人員担任，用一部分公地或庄稼給他們作酬劳。^①在这种公共生产的情况下，决不会有交换的需要。所以这时人們根本不知道什么交换。产品交换是較晚的时候才开始的，那时协作劳动和公有制已经变为私人劳动和私有制了。然而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也有它所特具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首先，在原始公社里人无分貧富，沒有主奴隶属关系，所有的事情都由公社會議解决，公社的管理工作首先是管理生产。

但是随着生产資料的发展，即随着劳动工具的改善、生产本身的扩大，协作劳动和公有制消失了，因为生产資料改善了，因而生产也扩大了，在某些公社就出現了有些产品过剩的現象，同时也出

^① 考茨基：《卡尔·馬克思的經济学說》，一八八八年日内瓦版，第13--14頁。（參見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中譯本第7頁。——譯者注）

現对其他公社生产的別的产品需要。但是各个公社彼此之間是根本不相来往的，是互相独立的。于是人們就不再把自己的公共劳动联合在一起、用較新式的工具来扩大公共生产和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而是把生产物分掉，开始用这些生产物进行交换。此外也别无他途，因为当时生产和劳动工具的发展水平比較起来还是非常低下的，这情况迫使公社经常迁移；农业公社要经常寻找新的耕地，畜牧公社要寻找新的牧场。而由于各个公社是不相来往的，它們的迁徙就会导致敌对的冲突，这时比較强的公社把較弱的公社的财富劫掠一空。这样一来有一些公社才知道別的公社所生产的产品，于是才开始在公社之間出现产品的和平交换。^①

上面指出的各公社之間的冲突現象，迫使其中某些公社联合在一起共同保卫自己。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冲突也慢慢地使公社中間发展了由一些什么工作也不做的人組成的个别阶级。起初，在战争时期，公社选出一个軍事首領，领导大家作战，而在战后就没有权力。但是逐渐这些軍事首領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批卫队，并且从人民那里夺走了权力。上述卫队当然是什么工作也不做的，而是靠搶掠致富，并且把战败的公社中的成員作为奴隶。因此，战败的公社的生产資料——土地、牲畜和劳动工具就成为战胜者的私有物。人民被划分为被統治的奴隶和主人。这时，先前的协作劳动和公有制就消失了。

在古代人民——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有历史的时候，生产資料已经无处不是私有财产了，并且这些古代人民已经分化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奴隶、貧民、富人、自由公民，在这些人之間经常发生斗争。古代人民的产品生产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奴隶生产主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随着手工业和奴隶

^① 季别尔：《原始经济文化纲要》，一八八三年彼得堡版。

主的需要的发展，产品的和平交换也渐趋发达。起初这种交换只是物物相易。例如一个人把皮革给另一个人，他得到相对应数量的谷物。开始时在交换产品时并没有媒介物，后来人们很快就选择了货币作为媒介物。还有一点也是必需指出的，就是当时只有剩余产品才允许交换。

古代人民的其他一切设施也莫不建立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奴隶制对这些民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都打上烙印。例如，一些古代最有学问的人认为，有一部分人是生而自由的，理应享福和统治人，而另一部分人却是奴隶，必须为自由人工作并且居屈从的地位。公民的社会地位决定于他所掌握的奴隶数目的多寡：他有的奴隶越多，就被认为越富，因为他掌握了大量土地和牲畜，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那末谁的牲畜和土地最多呢？十分显然，军事首领及其卫队最为富有，这些人构成为贵族阶级：希腊人称之为欧巴特里德(эвпатрид)，罗马人称之为帕特里齐亚(патриция)。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管理权——政权和社会的权力——当然也就归他们所掌握，并且成为使别人服从自己和致富的手段。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事务都在人民会议(希腊人是长老议事会[буле]，罗马人是百人队的民众会议[центуриальные комиции])上解决，而参加这些会议的只有富有的奴隶主。贫穷的公民、平民，尤其是奴隶，是根本无权的。因此，古代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平民和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史，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同归于尽。

在当时古代人民的生活条件的发展状况下，社会阶级的斗争除了带来皇权和征服之外，不会给他们带来别的结果。

由于这些情势的压力，希腊老早就灭亡了。在作为阶级斗争的结果的古代意大利，也出现了皇权和征服行为，罗马靠这些才使当时所有已经知道的世界都归属于自己。这种征服行为无疑地扩

大了交換，也就是說擴大了商業，而在城市里則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被征服國家把相當多的糧食作為貢物和通過貿易運往意大利，因而意大利的土地就逐漸轉變為牧場，而這些牧場歸根到底又集中在皇帝和廷臣手里，成為大地產——latifundia。土地（其中也包括牲畜）像這樣的集中於幾個大地主手中，自然就使得奴隸的勞動成為根本不必要的了。意大利的奴隸制終於逐漸消失，而隨着它的消滅，一切也都起了變化。解放了的奴隸增加了自由的、飢餓的和無家可歸的公民的人數。生產資料和生產本身還是很不發達，以致這些忍飢挨餓和無家可歸的公民不可能找到賣力氣的地方，也找不到擺脫這種既成局面的出路。他們成為無業游民，沒有階級意識，因而任何一個政治冒險家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他們羅致過來。由於這些原因，到後來，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家庭的和宗教的設施都從根本發生了動搖。誰都拒絕舊的信仰，政治和社會秩序隨着羅致這些無業游民的人的不同而變化，家庭生活被破壞了，代之以明目張膽的腐化墮落、賣淫行為和肆無忌憚的道德敗壞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日耳曼部落來到了羅馬帝國。他們推翻了羅馬帝國，在它的廢墟上興起了一些具有新秩序的新帝國。日耳曼部落把羅馬的土地瓜分掉，把居民歸自己統屬，使之長期居住在土地上进行耕作，生產糧食。所有被征服的土地都宣稱歸國王所有，國王則把土地分贈給男爵和伯爵們，條件是在戰爭時期他們要對他作人力上的支援。男爵和伯爵們又把土地用自己的名義分給國王衛隊中的其他代表人物，其條件也是當發生戰爭時這些衛隊要幫助他們。這種秩序（即人們常說的封建秩序）在歐洲統治了好幾個世紀，這幾個世紀構成一整個歷史時期，即人們稱之為中世紀的時期。封建秩序的基礎是土地之被占有和農民被固定在土地上。農民不能夠自由自在、毫無顧忌地離開封建主的土地。農民必須耕

种封建主的土地，其条件是养活他们所属的封建主及其卫队人员。只有占有土地才能使人独立自主，并且具有各种权利。实际上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是完全独立的，在一切方面（政治、军事、审判和货币流通）都进行单独的管理^①。反之，农民却得完全受封建主管辖。不经过封建主的允许，农民甚至不能结婚（封建主在这时享有“初夜权”）。封建主同贵族阶级一样，蔑视劳动，而认为抢掠和战争是他们唯一值得去做的事。他们只做这样一些事情：从设防的城堡中向城市进攻，在通衢大道上抢掠财物，互相厮杀和同国王作战。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和产品交换（即商业）自然无法发展起来。

为了防御封建主的抢掠，城市渐渐兴起。中世纪的城市日益扩大，还是靠了农民，因为农民都纷纷离开自己的主人逃到城市里来。在这些城市里手工业日渐发展，并且产生出人们称之为行会制度的秩序。

行会组织是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手工业的师傅是生产资料即劳动工具的完全的所有主。每一个帮工和徒工学习手工业都是为了当师傅和生产工具的主人。用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于生产者（师傅、帮工和徒工）本人。交换的范围极小。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样，首先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或者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主人的需要而生产。家庭成员都从事准备手工业所必需的材料和参加制作其他生活必需品，因而只有那些生产者感到多余的产品才拿去进行交换。例如，农民只把剩余产品送到城市的市场中去，而他们交换到的也是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

行会制度就正是这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每个师傅都想保持自

^① 参见《拉薩尔文集》，第一卷。

己所有主的独立地位。因此，無論是帮工和徒工还是师傅本人，都必须受許多約束的限制。行会制度就是建立在重重約束的基础上的。每一种手工业的所有师傅組成一个行会。做些什么手艺活的分配問題，完全由每一城市的行会来决定。每一个行会有做某一种手艺活的绝对权利，不是行会中的任何不相干的人体想染指，同样，这一个行会也不能干另一个行会的活。师傅沒有从这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的权利。帮工要做师傅，难上加难。

封建主义和行会組織把一切都束縛起来——無論是人的思想还是人的精神。因此，在中世紀占优势的是宗教神秘主义、宗教迷信、对超自然力量的盲目信仰和煩琐哲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是建立在使一些人从属于另一些人、使一些人依賴另一些人的基础上的，它把人民分成許許多多彼此完全隔絕的个别单位。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农民完全从属于封建主，而封建主之間又都用各种各样相互依賴的条件联結在一起。在行会制度下，帮工和徒工完全归师傅支配，师傅們又在行会組織中相互联結在一起，而各个行会組織再联合为行会同盟。就好像封建的地产形成一些完全独立的小国家，城市也形成了一些互不依賴的单个的城市公社、城市中的共同体。每一个城市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单位：它們由自己的議事机构、自己的法律来管理，有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警察。城市的这些权利，是由于同农民或者同国王联合在一起经过斗争才向封建主取得的。中世紀的历史同样是一部各个社会階級之間的斗争史。貫穿整个中世紀史的，是整整一系列农民反对世俗的和宗教的封建主的起义、战争以及宗教性的社会运动。塔波尔派和胡斯派的战争、保加利亚的波果米尔派战争、法国的亚尔毕派战争、法国的以“札克雷”聞名于世的农民起义、英国的农民起义以及德国的农民战争，就都属于这种性质。城市总是也参加农民对封建主的这个斗争。在城市内部，我們也可看到这种斗争，这个斗争的一

方是帮工和徒工，另一方是师傅和行会的约束。

从十字军远征开始，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陆上贸易）飞快地发展起来，因此城市日趋高度地昌盛繁荣。十字军远征是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以及中世纪全部生活条件的结果。城市给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国王的权力，而削弱封建主的权力。但是最主要的是，城市帮助了人类的思想、人类的精神从中世纪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而且在西欧唤起了研究和怀疑的精神。

十字军远征到十三世纪停止，从这时候开始，封建秩序逐渐崩溃，而城市阶层就强大起来，后来从城市阶层中产生出第三等级（*tiers état*）——资产阶级。在此之前，大家都知道，土地还只是归封建主掌握的。

但是在十三世纪土地慢慢转到城市阶层手里。因为这原因，农民渐渐从自己的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并且不再固定在土地上，而成为独立的庄稼人。封建主义的削弱扩大了集中在城市和城市同盟中的陆上贸易。城市阶层的财富增加了，除了不动产之外，动产、资本的作用也增长了。到中世纪末，海上贸易更加增加了资本的作用，使资本积累加强了。行会组织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要，于是开始解体。手工业开始一天比一天分散化。师傅脱离行会，不同其他师傅在一起，自设作坊，独立地工作。手工业的这种分散现象最后终于破坏了行会组织的方法，出现了企业主，他们大批地买进原料，依靠雇佣工人进行加工，然后把成品在市场上批发出去。

但是，随着美洲和到印度的航道的发现，封建的和行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就被排除掉了。美洲很快就充斥着从欧洲来的移民。美洲、印度和中国扩大了销售市场，并且引起商业、工业和航海业的空前发展。旧的生产方式——封建的和行会的生产方

式——已经完全无力滿足新的世界市場的需要。于是这种生产方式就趋于衰落、解体。在大城市和港口，都開設着大工厂，其中生产的产品只供交换、出售。这些工厂的商品是用雇佣工人的手工劳动生产的，工人的数目增长得很迅速。雇佣劳动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首先，是因为行会組織日趋衰落，手工业的发展停滞，其次，当时农民由于苛捐杂税、债台高筑而卖掉土地变为雇佣工人。大农場、庄园的发展使使用雇佣劳动的机会更加扩大。在此以前，劳动是在各种不同的行会之間进行分工的，現在劳动都集中在大作坊、工厂之中，并且是在雇佣工人之間进行分工。过去由各个单独的生产者所掌握的生产資料——劳动工具，現在也都集合在企业之中，归工厂主、工业资本家所掌握。

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就是工場手工业的方式。产品的生产成为批发性质的，并且首先已经不是为了滿足生产者的需要，而是为了市場的需要。这时，人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特性。在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下，小生产和小商业开始趋于衰落。从城市行会阶层之中产生出新起的第三等級——工业阶层或称资产阶级。

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使社会思想以及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此以前，譬如說，人們对商业和工业劳动都頗为轻视，而現在，連趾高气揚的男爵、伯爵、公爵本人都成了各种貿易公司的股东。追求奢侈生活的风尚普遍发展，而资产阶级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开始起着指导作用。科学和知识扩大了問題的范围，旧信仰和宗教的謬誤认识也开始遭到批判和怀疑。最后，第三等級——资产阶级终于做到了与国王和其他阶层共同掌握政权。

然而工場手工业对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破坏毕竟是十分緩慢的，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一个长时期里还同工場手工业同时并存。因此除了第三等級之外，当时还存在着中世紀的

各种旧阶层，而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则归一切富有阶层分享。簡而言之，从新世紀初直到十八世紀末，中等阶层是全部历史的主角。然而从十八世紀到本世紀初，世界市場扩大起来，对商品的需要也大为增加，以致工場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滿足新的需要。这时出現了阿克萊特的织布机和瓦特的蒸汽机，在工业和在生产中引起了变革。手工作坊变成用机器生产的大工厂。工場手工业生产改造为大机器生产，并从第三等級中間产生出現代的财富百万的資本家。目前，现代生产以及商品交换（即商业）都是靠資本家之間的斗争、靠他們之間的竞争——誰能在世界市場上售出自己的商品——来調整的。另一方面，竞争为商业和生产的更大发展造成机会。海运和陆运都发展到了空前的規模。斯蒂文逊发明了蒸汽发动机，这就出現了火車和铁路。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促使生产、商业、航海业和铁路事业更大地发展，直到現在这种样子。所以說，現在的经济制度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长期发展和整整一系列变革的結果。

現代大生产（它从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卡尔·馬克思开始就被称为資本主义生产）在非常短暫的时间內就彻底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和其他一切阶层。資本主义生产所借以完成这一变革的手段是什么呢？这种手段就是資本家用以充斥市場的廉价商品。那末什么时候商品才变得廉价的呢？显然是在这些商品用最新式的机器进行大批生产的时候。因此在世界市場上只有那样一些人才能卖出商品并获得利潤，这些人的商品在市場上标价比較最低廉，而其他一切人就都只好完蛋、破产。可見，現在的大生产無論过去和目前都在使小生产破产，并且把小生产者变为單純的雇佣工人。因而凡是大机器生产发达的地方，同时也是現代交换发达的地方，小生产和小商业无不趋于破产。生产資料——机器、土地和劳动工具——聚集在一些人的手里，聚集在大工厂和大地产中，它們变

成为公共的，也就是說，正在社会化。在这些工厂和地产中，工人之間的劳动分工其实只有一种形式，即工人所生产的財富都是千千万万工人的劳动果实。这些財富并不是用来滿足工人和資本家的需求，而是滿足全世界的需求。这就很清楚，劳动和生产过去和現在都具有了公共的、社会的性质。那末是誰占有了公共劳动和生产的成果呢？大家知道，这些成果都給資本家占为已有了。我們已经看到，这是現代資本主义生产中的最令人憤怒的矛盾。其次，人民現在已经仅仅分化为两个階級，并且一天比一天向这两个階級继续分化。这就是財富百万的資本家和雇佣工人，工人已经丧失了任何所有物，他們的人数也由于資本家本身人数减少而不断得到增加。机器的改善使人的劳动归于无用，极其多的工人就找不到工作。因此工資下降到最低程度。現代生产創造出大量財富，但是同时也形成着前所未聞的貧困。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結論：从一八二五年起，市場上一天比一天充斥着各种找不到銷路的商品，工商业危机、破产頻頻袭来，生产和商业停滯，而財富和人民的劳动白白遭到毀灭。在这种危机时期，資本家本身也遭到了毀灭，他們补充着雇佣工人的队伍，或者照时下的說法，补充着无产階級的队伍。由此可見，現代資本主义生产充滿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使生产已经沒有能力来制馭正在它內部发展壮大的生产力。現代经济制度就跟中世紀的经济制度一样，已经成为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制度也同中世紀的制度那样，正在自趋末路，并且正在发展未来的新制度的因素。

实际上，現在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容納在資本主义生产的狭小范围里的程度，这些生产力怒吼起来了，正在动摇現代生产的根基。因此現代資本主义生产只得开始換一个花样：由私人資本主义生产变而为合股的生产，这就是說，資本家們为了調整現代的生产力，正在把生产資料联合在一起。但是这种資本主义生

产的新花样在很多企业里是无济于事的，尽管资本家以为这样做不无意义。正因为这缘故，所以现在国家一天比一天觉得有必要把对一些最大的生产部门的管理权拿过来，就像它已经对邮政、铁路、电讯、采矿和其他企业所做的那样。不管怎么说，国家总是在吞食所有私人的和合股的资本家，而日益变为一个共同的集体资本家。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资产阶级显然已经变成一无用处，变成多余的人，变成废物，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件荒唐事。只要看一看现在究竟是誰在管理生产，誰在履行资本家的工作（不管这资本家是股份公司或像国家那样的共同的集体资本家），就会对这说法深信不疑。我們如果在欧洲和美洲走一趟，去访问一下那些工厂和貿易堆栈，就会看到那里尽是些雇佣的工作人员，雇佣的技术員、工程师、技工、化学工人、医生、管理者、监工、出納，总之都是雇佣的工作人员，而无论在这些工厂、堆栈的哪一个角落也見不到资本家本人。他們根本不劳动，而只是攫取公共生产所創造的巨大财富，他們只是一些靠社会养活的寄生虫，而沒有他們生产也照样能够存在并且实际上存在着。由此可見，虽然私人资本主义生产轉变为合股的和国家的生产，现代经济制度的矛盾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大，达到了它的最后的发展阶段。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是矛盾发展的頂点，而不是矛盾的消灭。要使现代经济制度中的矛盾消灭，只有到实现向公有生产过渡的时候才有可能，这种生产是按照计划来组织的，其目的在于使生产能够既满足全体人民也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而要达到这一点，又只有当生产资料成为公有财产、而资本主义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变为实际上归社会占有的时候，只有当一部分产品由全社会作为扩大生产的手段而加以占有、另一部分由每个人作为生活资料而加以占有的时候。

现代人类的历史发展正在把我們引向这一变革。现在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正在造成一些必定会完成这一变革的社会力量。那些正在把居民变为雇佣工人、无产者的人向这些社会力量提供武器，使它们运用这些武器来进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千千万万工人处于同样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为一支受制于各种管理者、各种监工、机器和商品生产本身的产业大军，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像士兵一样具有纪律。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是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它迫使资本家们去同本阶级中与大生产有利害矛盾的那些代表人物不断进行斗争，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不断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求助于无产阶级，吸收无产阶级参加政治运动。这就在政治上教育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因工商业危机而破产的资本家补充着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些人也把自己的政治修养带到无产阶级中间去。最后，现代社会中的矛盾显得极其突出，以致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认识到历史运动的过程而转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就好像过去有一部分贵族分子曾拥护资产阶级一样^①。所有这些都使无产阶级成为一支几乎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社会力量，这支力量并且还不断地获得各种改造现代经济制度的必要手段。无产阶级的斗争从一八三一年就已开始，如今已变为人民和一小撮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最近以前这个斗争还是分散进行的，在工人之间没有什么协商，斗争是地方性的。然而现在迅速而方便的通讯工具已使这种斗争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而照马克思的说法，任何一种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因此，现在无产阶级无论在哪里都已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党派而出现，这个政党正在竭尽全力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普选权、自由选举和自由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达到这一目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18—19页。——译者注

的最主要的手段。資產階級既然沒有能力管理現代的生產力，同樣也就沒有能力掌握住政權。現代資本主義本身正在使日益巨大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所有，它指出了一條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正因為這原因，現在我們看到，在一切國家里世界性的社會民主黨正在漸漸掌握國家政權。就好像當年資產階級、大資本家曾經掌握政權而使一切事物從屬於資本主義生產一樣，工人階級也將奪取國家政權並利用政權把生產資料由私有轉變為公有。在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後，國家自然成為完全多餘的東西，它將像恩格斯說過的那樣趨於消亡，因為在生產資料轉為公有之後，目前存在着的階級鬥爭就將消失，階級本身（其中包括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也要消滅^①。任何別的階級在掌握了政權之後，都使其餘的階級從屬於自己，不管全體人民的死活只求自己發財致富。工人階級也是人民，沒有誰受它統治，它的利益就是全體人民的利益^②。因此一當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人民之劃分為階級、劃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現象就告消滅。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首先就把生產資料轉化為國有財產。但是從而它就消滅了自己之為無產階級，從而它就消滅了一切階級區別和階級對立，同時也就消滅了國家之為國家。過去和現在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着的社會，必須要有國家，即必須要有剝削階級的這個機關，以便維持其生產的外部條件，因而特別是以使用強力把被剝削階級箝制在由當時生產方式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封建隸屬制，雇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集中為有形的集團，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為這樣，只是因為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它是具有國家

① 這里提到的關於國家消滅的論斷，列寧曾經作過精辟的闡述，參閱《國家與革命》第五章。——譯者注

② 參見《拉薩爾文集》，第一卷：《工人綱領》。

公民資格的奴隶主的国家；在中世紀，它是封建貴族的国家；在我們所处的时代，它是資產階級的国家。当国家終於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自己使自己成为贅物了。当任何一个必須加以鎮压的社会階級已不复存在时，当一个階級对另一个階級的統治以及根源于現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竞争已不复存在，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行都一并消失时，那就会沒有什么人必須加以鎮压和加以控制了，那时对于现今执行着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会再不需要了。国家以全社会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个行动——将生产資料轉化为社会所有，——同时也将是它以国家資格所作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将逐渐成为多余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于人的管理便会由对于物的管理和对于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消亡下去的。應該以此为根据来估量关于‘自由人民国家’的語句，这一語句在鼓动的意义上可以暂时存在，但归根到底說是沒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應該以此为根据来估量所謂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废除国家的要求。”^①

那末从上述全部言論中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应当得出的結論是，人类的历史除了原始社会之外都是各个不同的社会階級的斗争史。例如，古代人民的历史就是奴隶和平民反对貴族的斗争史；中世紀史就是农奴反对农奴主、帮工和徒工反对师傅的斗争史；近代史就是第三等級反对封建主和行会組織的斗争史；現代史就是工人階級、无产階級反对資產階級、大資本家的斗争史。然而階級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我們看到，階級是由于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而产生的，就是說，是由于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从上面这些話里也可以看出，对人民來說一切都取决于他們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149--150页。——譯者注

在一定历史时期生活于其中的经济条件，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制度和概念都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制度。“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①

我们从这一章里已经知道，生产方式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产生于旧制度本身之中，在它内部发展起来，而终于把它取而代之。例如，手工工场取代了行会组织，而现代大生产又取代了手工工场。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正在社会化即把生产资料由私有变为公有，同时也就是在否定着自己。它本身创造出消灭自己的手段。它在自身中间发展着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列维·摩尔根说：“我们势必遭到的那种社会的灭亡，将是以财富为其唯一终极目标的这一历史活动场所的结束，因为这样的活动场所包含有招致自身灭亡的因素。行政管理上的民主，社会内部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是现今经验、理性和科学已在不断为之努力的社会未来更高阶段的特征。这个社会将是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较高形式上的复活。”②人类的历史发展正在把我们带到这个目标上去。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每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要服从这规律。

这是非常容易懂得的，因为现在的生产和交换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的特性而具有全世界的、世界主义的性质。例如，从前任何一个民族(族)的需要是靠自己的、一地的财富来满足的，而现在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341页。——译者注

② 摩尔根：《古代社会》，伦敦1877年版。（引文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324—325页。——译者注）

各民族就不能单靠这些东西来满足需要了，他们已经希望得到许多在极辽远的国家生产的東西。因为这原故，各族人民就都处在相互依赖之中，而现代交换即现代世界贸易迫使各族人民不能再过闭关自守的民族生活。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非常迅速地发展着生产力，使得各族人民之间的通讯往来变得十分迅速便利，同时也把各族人民甚至最落后的人民吸引到自己的道路上来。它依靠自己商品的低廉价格迫使每一民族的人民接受它的产品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要不然他们就会遭到毁灭。一旦有一个民族的人民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这一民族的一切陈旧的制度都会被消灭，它的生活就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影响，什么东西也不能把这一民族从现代经济制度所沿以进行的道路上拉开。

卡尔·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令它已经发现了自己运动的自然规律……它也还是既不能跳过自然的发展阶段，也不能用法令来废止这些阶段。但它能够减少和缓和生育时的痛苦。”①

我们已经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自然规律，它在今天统制着全体人民并促使他们顺着自己的脚印前进。但是这种生产本身也正在引起社会化，就是说正在使生产资料从私有变为公有。

不管怎么说，现代人类的自然发展规律正在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偶然现象。——社会主义思想是十八世纪思想的较为完整的发展。——十九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社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初版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430页。——译者注

会主义的发展。——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辩证的思想方法。——科学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会仅仅是偶然的、没有原因的。例如，现在在我国手工业正趋于没落，小商业停滞，贫困增长，这就不单是一种偶然现象。我们在周围看到的一切事物，在自然界和人的生活中每天都在产生的一切变化，都是有原因的。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它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的人的胡思乱想。在前一章里我们说过，现代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现代经济制度的发展正在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整个来说，社会主义同任何现象一样，是有其发展史的。因此，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就会发现它是十八世纪的各种学说、思想的较为完整的发展。

那末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究竟鼓吹些什么主张呢？——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宣称，人人按其构造说都是一样的，这表明人人都应当是平权的。十八世纪哲学家宣称，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是一个人的最大的幸福。他们还宣称说，在他们以前存在过的一切都是同人类理智相矛盾的，在十八世纪末之前人们生存于其下的一切制度都是非正义的，都同人类共同生活的目的相抵触，这种共同生活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的社会联合。因此，平等和博爱就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旗帜。那末结果如何呢？这些伟大的创举实现了没有呢？大家知道，并没有实现。列都尔诺教授说：“平等、正义、真理迄今还都是以条规、以人的空洞的公式的形式存在着：它们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心灵里都是不存在的。”

十八世纪哲学家所允诺的普遍自由、平权和正义转而为仅仅

对富人、对第三等級，或者照现在的說法，对資產階級适用的平权和正义。这在革命刚一結束以后就暴露出来了。早在宣告革命成功以后的第二个月，即一七八九年九月，第三等級即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就拟訂了自己的宪法，其中宣布要进行建立在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选举，誰有錢誰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后来也就这样实行了。最大多数人民，即貧民、工人，仍旧毫无权利和受压迫。虽然当时宣布了“劳动自由、貿易自由和迁移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究竟同十八世紀所允諾的自由是不是一回事呢？大家知道，不是一回事。最主要的關鍵在于政权已经給富人、資產階級所攫取。資產階級頒布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他們的利益是同貧民、工人的利益直接对立的。中世紀的奴隶制仅仅改变了样式和外形：現在出現了处在資本的桎梏之下的雇佣工人的奴隶制。哲学家們所曾經认为是全民族、全体人民的第三等級，只是具有特殊利益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的这些利益是同人民的利益完全对立的。所有这些早在本世紀即将到来之前人們就已经看清楚了。人們很清楚，来到的并不是哲学家們所許諾的“理智和正义的王国”，不是“和平”，而是資本的王国、空前未聞的劫掠的王国，是为了夺取資產階級能够出售自己的商品的市場而进行无休止的战争的王国。

在十八世紀作了那么大的許諾之后，在人們的期望受到了这样大的欺騙之后，人們对已经宣告建立的社会制度就必然要感到失望了。不久以后的情况果然如此。难道还能不是这样？法国革命破坏了規定特殊权力、貴族階級和僧侶階級特权的旧制度，也取消了国王的无限权力。但是所許諾的“理智的王国”并未来到。人們宣称的“劳动自由”、“貿易自由”和“迁移自由”結果对穷人來說成了残酷的嘲弄，对穷人和富人來說成了相互敌对的残酷战争。所許諾的“博爱”并未出現，出現的是这一条原則——*homo homini lupus est*——人对人是狼。誠然，在当时行会秩序速同一

切特权都给摧毁了，财富的生产在此之前发展得像爬行一样缓慢，现在已经有了起色，大踏步地飞速进展了。但是人们宣布的相互敌对的战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此为“自由竞争”）却取代了许诺过的平等和幸福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贫困、痛苦、罪恶、腐化、欺骗和嫉妒心。

在法国产生这种种情况的同时，在英国却开展着一场和平的、然而却是深刻的革命。阿克莱特的精纺机和几乎同时发明的瓦特的蒸汽机根本上改造了产品的生产：用手工劳动制造产品的作坊即手工工场变成大工厂、大工业。社会的一切旧基础全都动摇了；社会开始分化为大工厂主、大地主和大商人；行会师傅和小商人变成贫穷的雇佣工人，贫困、家庭解体、腐化现象都有所增长。

现在这个十九世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来的。富人当然不仅是心满意足，而且还宣布新制度是万世长存和永久不变的，并开始着手填补自己对财富的欲望。然而这些情况本身同公众的期望是相抵触的，抵触到它们不能不引起一些善于思索问题的人来进行考虑。在十九世纪初的普遍失望情绪之中，在普遍渴求财富和种种不文明的享受之中，有三个伟人几乎是同时地承继了前一世纪的事业。两个天才的法国人圣西门和傅利叶和一个也是有天才的英国人罗伯特·欧文，在本世纪初开始把十八世纪的思想继续向前发展。他们同上一世纪的哲学家一样，也认为只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东西才有存在的资格。但是由于革命而产生的制度却同理性根本不相符合。这是什么原因？他们回答说，这是因为十八世纪人们还不知道真正理性的制度，因而革命所宣布的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理性的制度要求解放全人类，而不只是解放一个阶级，真正理性的制度希望的不是随便哪一个阶级获得解放，而是消灭一切阶级。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怎样才能消灭阶级呢？要做到这点显然必须得有另外一些根本不同的

社会制度，而不是从本世纪初起就存在着的那种制度。这些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呢？

这三位大思想家都一致认为：这些制度必然会发现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必然发现最好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就能够实现了。人类的理性在探索这些最好的制度的时候，自然会趋向社会主义。而在实际上人类的理性也使人们相信：要实现十八世纪宣布的那些伟大思想，就应当消灭阶级。怎样消灭？正是寻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使人类的理性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只有当人人都工作，当用以制作产品的手段即生产资料（机器、土地、矿床、交通工具）都成为公有财产，而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于那些生产产品的人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之下，阶级才能消灭，人类共同生活的伟大原则也才能实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能够用以实现这些制度的手段又在哪儿呢？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认为，这也是人类理性的事情：它必然会发现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手段。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三位各就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创建了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就这样想用示范行为来表明人类是可能根据正义的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大家知道，他们的实验一无所成：这些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得容易，崩溃得也快。这一些最初的著名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不可能广为传布的，因为它们不能证明自己的科学真理性。它们所依靠的并不是科学的基础，而仅仅是自己的天才的人的理性力量。因为这个原故，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就是说这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

无论在什么地方，社会主义显然都是十八世纪哲学思想的比较完整的发展。在因革命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下，“思维着的理性”之趋向社会主义是十分自然的。思想的逻辑发展不能不把人的理性导向社会主义。缺少的只是一件事：使社会主义立足于

巩固的基础之上，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使社会主义立足在这样的基础上。然而他们的聪明睿智却播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初的种子。卢梭早就发现，“第一个把一小块土地圈起来的人，第一个说：‘这是我的土地’并且找到相当愚蠢的人来使之相信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创始人。最大的幸福——自由，就在这里断送掉了。”^① 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破天荒第一次表示过那些为四、五十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所完全证实的思想。圣西门首先表述了这样的伟大思想：“人人应当工作”，“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事物的掌握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傅利叶首先指出现代经济制度的各种弊端，指出在这些制度之下“贫困产生于多余的财富”。“那认为妇女解放程度是每一社会中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的思想，就是第一次由他提出的。”他还首先表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人类在自己的发展史中经历了几个阶段。“他把社会历史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他还表述了这样一种伟大的思想：“每个历史阶段各有其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并且在关于整个人类未来的问题上，他更往前发挥了这个观点”。欧文用自己的职工会和劳动商场作为例子，表明人类没有商人和工厂主也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金钱也能活下去，表明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应当成为公有财产。^② 但是十九世纪初第一批社会主义者的这些确实卓越的思想还不能发展起来和得到科学的证明。当时经济条件还不够发达，这阻碍十八世纪的人们看到真正的历史趋势，不能推动人们做到上面这一点。

我们从上一章里已经看到，使用机器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

① 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三联书店版，第56页。——译者注

② 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123—125页。——译者注

在本世紀初才出現的。那時大機器生產還剛剛開始，它的特性還沒有表現出來，它的发展規律也沒有被發現，它的方向（或者照通常的說法，它的趨勢）還沒有被人們所看到。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在本世紀初大家還不知道資本主義生產要發展到哪裡去。最初的社會主義者思想的不確定性，當然是同經濟條件的這種不夠發達的情形、同新的經濟制度的趨勢還不明確相適應的。他們提出了個別的天才思想，並且了解到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但是他們還不能科學地論證這些思想和原則，還不能證明歷史發展是趨向社會主義的，同時也不能發現能夠用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

十九世紀初，無論在社會主義者的頭腦中，还是在所有人的頭腦中，無論在哲學中还是在科學中，都還是舊的思想方法和舊的概念、舊的觀念體系占據統治地位。例如，最初的社會主義者同十八世紀的哲學家一樣，也認為人類是受理性的制度支配的。他們認為，“理性的王國”、“平等和博愛”之所以沒有出現而出現了資產者的王國，原因在於在他們之前的人們還不知道真正的理性的制度。最初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向人們指出真理、向他們指出實現真理的示範行為的時機已經到來。空想社會主義者在觀察新制度的時候完全不顧同過去已經消失的制度的聯繫。他們脫離了過去的時期來考察新的歷史時期，並且認為過去的時期是完全不合理的、非正義的。他們相信必須消滅階級分化現象，勞動工具應當成為公有財產。但是他們沒有找到在生活條件中實行這種變革的手段，他們不認為這些制度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並且在其中包藏着向更高級的制度過渡的手段。他們以為這些制度應當是由人的理性設想出來的。這種思想方法人們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

形而上學方法的實質是：把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中發生的事物、事件或者現象都是彼此孤立地來加以觀察，而不顧及它們的相互聯繫。如果我們只想研究某一個別現象，這種思想方法是沒錯

的。例如，我們可以把中世紀同其他各世紀隔絕开来加以研究。如果我們对中世紀孤立地进行考察，我們就只能知道这样一些情况：它的起迄時間，在这几个世紀当中存在过哪些制度，只能研究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性，甚至只能研究中世紀中的个别历史現象。显然，对中世紀作这样的研究，并不能使我們了解問題的实质，不能了解发展的規律。要知道，中世紀的規律同現代的規律一样，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偶然出現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因为这原因，我們如果要想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来研究这些事物，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就根本不适用了。按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即彼此隔絕、彼此孤立、不顾相互联系地来进行观察，我們周围被考察的事物、事件或現象就会显得是偶然的、混乱的和不可思議的。就因为这原因，最初的社会主义者在把現在的历史时期同过去的时期隔絕开来观察以后，就认为它是偶然的、是人类理性的錯誤。因此，他們不能在現代制度的否定的(坏的)方面中看到肯定的(好的)方面。但此外也別无他法，因为在現象和事物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还占据着統治地位。但是在十九世紀初，我們已经看到，经济制度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形而上学在各方面还都占着統治地位。在本世紀初期牛頓的太阳系不变的学說还占統治地位，这个学說断言，太阳系始終是同一的，同太阳系在一起的是一些沿着同一軌道运行的同样的天体。在有机界方面，林內和居維叶的关于动植物种不变的学說占統治地位。我們这个行星的运行路线在其他行星的最前面，而人被认为是同其他生物隔絕地被創造出来的生物，人的理性統治世界。

但是从本世紀初开始，机器和知识有了极其迅速的改善，同时資本主义生产也有了极其迅速的发展。海格斯、哈革里夫斯、克兰普东的精紡机、阿克莱特的机动車床和斯蒂文逊的蒸汽发动机更加促进了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越是发展，它的特性越

是表现得明显，它的趋势就越是清楚。大家看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全盘消灭小生产、手工业、农业和小商业，把生产资料——机器、土地和其他劳动工具——集中在若干大资本家手中并使之社会化，而人民却变为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大家看得很清楚，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把人民分化为仅仅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他们的斗争创造了现代的历史。一八三一年里昂(法国)工人起义²⁴和一八四二年英国工人运动²⁵揭开了这一阶级斗争的序幕，而在目前，无产阶级正在不断地(经常地)在全世界进行这场斗争。

但是不仅仅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进行着变革，在人的头脑里也进行着变革。技术和生产的大发展使人的智慧和人的思想有了发展的余地。终于在思想方法上产生了变革。旧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学已经根本不可能解释当前的发展情势。新的生产的特性已经十分明显，以致除了它的否定的(坏的)方面以外，它的肯定的(好的)方面也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在十九世纪初人们只懂得，资本主义生产增加贫困和引起破产，它使腐化、掠夺和欺骗行为遍及各地，它破坏一切并导致互相斗争。后来人们就清楚地知道，随着机器的改善和生产的发展，人摆脱了体力劳动；资本主义生产使机器、土地和一切劳动工具社会化，也就是说使之变为公共的；它正在把人民变为无产者并且把他们组织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资本主义生产随着自己所固有的矛盾的发展随后就会自我否定。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要正确理解过去和现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或者现象，只有当不仅注意它们的否定的方面、而且注意其肯定的方面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也就是说，只有当在相互联系中去考察我们周围发生的事件或现象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事件或现象当作是偶然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时我们将看到，一切都在变化，都在运动，一切都在按照准确地确

定了的共同規律發展着。

按照這種思想方式或思想方法，人的智慧就能在矛盾的現象中發現共同規律，這種方式或方法人們就稱為辯證的方法或方式。這種方法的實質無非是：在相互聯繫中來考察現象。通過舉例最容易看到這一方法的實質。譬如，要了解植物發展的實質，就必須在相互聯繫中考察它的生長和死亡。我們用這樣的辦法考察了植物的發展情況之後，就會相信：它同時既在生長又在死亡，它既是這一株植物又不是這一株植物。初聽起來這好像是奇談怪論，然而事實就是如此。事實上，我們從自然科學中知道，植物的生長就是細胞的經常不斷的新陳代謝。因此可以說植物同時既在生長又在死亡，既存在又不存在。我們如果同其他各世紀聯繫起來考察中世紀，在相互聯繫中考察中世紀的種種現象，我們也會相信，中世紀的制度早在以前的時期里就已開始發展起來，而在各個不同時期這些制度各不相同：與這些制度同時有新的制度開始發展起來，在它們本身之中具有新的制度的萌芽，從它們本身產生出這些新制度的因素。換句話說，中世紀史看來也是一個生長與死亡同時並進的過程：新的制度逐漸發展而舊的制度逐漸消亡的過程。這種方法其實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方法。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早就知道這種方法。但是在我們這個世紀，由於人類的歷史發展開始為人們所理解，它才得到充分的發展和自覺的應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使得那些迄今為止並不由於人的主觀努力而產生人類進步的種種矛盾現象發展到最後階段，同時也使這種方法在目前必然要占統治地位。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越是發展，這種統治地位就越是來得強固。辯證的思想方法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已確立。起初它出現在科學中。拉普拉斯首先證明了牛頓的太陽系不變說在數學上的錯誤。他證明，行星的運行不是固定不變的，地球和其他行星的運行軌道始終在變化，太陽和其他天體都是由其

周围的星云构成的，星云的存在完全证实了赫瑟尔的研究的远见。^①从拉普拉斯的学说中可以非常明显地得出一条结论：太阳系也有自己的终始，有自己的长达亿万年的历史。关于地球发展情况的科学（即地质学）也证明，地球也有自己的长达亿万年的发展史，它并不永远都是像现在这样的，它不断在变化着，有终有始。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辩证的思想方法从科学转移到哲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首先把辩证方法运用于哲学，并设想一切现象处在同一个普遍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尽管这样，到本世纪上半期末，旧的概念或思想的体系仍然阻碍学者形成关于事物发展所依据的规律的实质的明确概念，而最主要的是它们阻碍对人类历史的正确理解。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学者还都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人脑中现成存在的思想的模糊的反映；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都是人的理性和人的意识的结果。例如，学者们认为，火的概念（思想）——它能燃烧和发热——并不是得自经验，而是在我们的头脑中现成地存在着的。经验只是发现火的思想在人脑中的存在。植物生长的思想，就是说植物的生长在于新陈代谢，也是在我们的头脑中现成地存在着的，而不是由于研究了植物的生长情况后才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法权等等制度的变化，似乎都取决于人的理性、人的意识。这种概念或思想的体系早就盛行了，而到现在在许多人的思想里还占着统治地位。这就是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名的古代体系，即唯心主义体系。

唯心主义完全同人类意识不够发达的情况相适应。它之所以到本世纪上半期末还占统治地位，是丝毫不足为奇的。的确，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仅仅在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才达到现代的高度发展，并且在那时才开始出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特性的科学研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发展，人

^① 德雷贝尔：《欧洲精神发达史。理性世纪》，第二卷，一八八五年圣彼得堡版。

的思想的范围就越是广泛，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就越是能得到广泛的发展。现在旧的思想方式和思想体系当然是根本不能向我们解释现象了。达尔文关于物种和人的起源的学说现在正在渐渐把形而上学方法根本排除掉。达尔文证明，任何一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其中也包括人)，都是千万年来发展的结果。达尔文说：“一个人只要不像野蛮人那样满足于把自然现象当作一些没有任何相互联系的现象来考察，他就不会认为人是某种个别的创造活动的结果。他必定会承认人的胚胎例如同狗的胚胎十分相似，人的颞骨、各个部分以及整个人体的构造，同其他哺乳动物的同类器官的构造是一模一样的(暂且撇开这些机体部分的用途问题)；在人身上会偶然出现各种不同的机体构造，例如在人身上会出现猿所固有的特殊肌肉，这对人来说是不正常的，——对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别的事实，他必定会承认，这最明显不过地使我们懂得：人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起源于大家共同的始祖。”^①正是这个学说终于确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也就给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以致命的打击。

整个自然科学向我们证明，人体仅仅是由物质(实物)组成的，即由骨、肉、血和神经组成的。事情不过就是这样。这些科学证明，人的生命就是组成他的机体的物质的不断变化，就是物质粒子的不断地相互作用。我们的感觉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机体的物质的各种不同变化。例如，当我们感到渴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机体中的物质粒子之中发生了非常迅速的粒子的相互作用、分解和化合过程，或者是我们所吸收的液体或其他物体已经耗尽因而出现了对新的物体的需要。现在大家就可知道，对外界事物的思想或者概念并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现成地存在着的，而是这些事物在人脑

^① 达尔文：《人的起源》，第二册，俄文版第585页。(参见达尔文：《人类原始及其类群》，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版，第九册，第34页。——译者注)

中的多少正确的反映。要在我們的头脑中产生对某一事物的思想，就必须要有这个事物存在并且使我們产生印象。我們的意识取决于我們所生存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并不取决于我們的意识。例如，要产生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实现这一意识，就必须发展現代的生产及其生产資料，即机器、各种知识和技术革新。而現代生产越是广泛发展，生产的发展越是接近頂点，这种意识就越是成长得快。简单說来，人的任何精神生活都是在人周围的物质(实物)条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条原理現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真理。从本世紀下半期初开始，工人同資产階級之間的冲突就开始形成为国际无产階級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斗争，工人同資产階級之間的冲突证明，人类的历史是各个社会階級之間进行斗争的历史，而在一定时候由哪一階級掌权都取决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即取决于物质条件或经济制度。因此这种体系称为唯物主义体系。它是現代发展的結果，而且使智慧、科学和思想都日益服从它的影响。

然而，必須把科学唯物主义同“唯物主义”这个詞分別清楚，“唯物主义”一詞有人是指追求物质財富，追求粗野的享受和快乐。科学社会主义同粗野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沒有任何共同之处。朗格說：“实践唯物主义是指一般地追求利益和物质享受，科学唯物主义和对知识的向往与此完全相反。可以說，就其最朴素的方面来看，古代人民的伟大的唯物主义体系也比常常会轉化为幻觉的空想的唯心主义好許多倍。古人的这些体系能够使思想离开鄙陋的和通常的事物，而使它具有真正解决問題的正确方向。”^①实际上，現代唯物主义也是人的全部現代知识的基础。它把这些知识結合为一整体，它从物质生活条件的观点向我們明白易懂地解释一切自然現象和历史現象。現代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体系，沒有

^① 朗格：《唯物主义史》，第一卷，第39頁。（參見中华书局版中譯本上卷第38頁。
——譯者注）

这种体系就不可能合理解释任何一种现象。现在，谁要不是唯物地进行思想，他就会在黑暗中迷路，他就不是一个完全自觉的、会思想的、有教养的人。

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仅改变了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且改变了思想方法本身以及思想的体系。辩证的思想方法促使人类智慧不得不承认现代经济制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时期，它终究要消逝并且让位给其他的经济制度，就好像当初旧的制度让位给现代制度一样。它使善于思想的学者不得不确信在现代制度的矛盾中发展着新制度的萌芽。这是普遍的发展规律。科学唯物主义还使人不得不承认：任何历史现象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物质条件，即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而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又取决于在这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我们在考察现代经济制度的时候，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正在社会化，就是说一切都在转变为公有财产——换句话说，就是在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因此，科学唯物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基础。而我们越是向前进步，科学社会主义就越是迅速地在科学中和在人的头脑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体系。最初的社会主义者无法做到的事情，现代的历史发展和它所创造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及现代唯物主义体系正在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终于立足在坚实的基础上了。

社会主义成为了科学。

第四章

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的传布。——工厂生产的发展和旧经济制度（行会制度和手工业）的衰

落。——纺织业工厂生产的发展和土地的集中。

——大商业和商业中心的发展。——机器和对工人的剥削。——社会、政治、家庭、法律、宗教和精神关系上的变革。

现在是回答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基础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经过前几章的解释，对这问题的答复是显而易见的。谁只要细心地、没有成见地读了本书的前几章，他就会同意：社会主义在我国不可能没有基础。

在这几章里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现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或贸易）方式正在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就是说正在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的，正在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我们还看到，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它同任何现代科学一样，都是以辩证的思想方法和科学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由于掌握了这一原理，善于思想的人的理性就日益在理论上（科学上）承认人类的自然发展正在导向社会主义。而这些原理越是被领会得深透，就有越多的有学问的人承认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现在，美、英、德、俄、法、比等国的最有学问的人士都承认，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是必不可免的。最后，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成功不是民族的事业，就是说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事业。只有在即使是一、二个欧洲国家里同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才可能成功。因为这个原故，现在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成为国际运动，并且正在按照共同的国际纲领努力追求同一的目标——夺取国家政权，借助于国家政权社会主义运动就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假如在一、二个欧洲国家里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那末其他国家也就不得不受这些制度的支配，就好像现在所有国家都受现代资产阶级制度所支配一样。

既然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国的发展当然也要受这个规律的支配。既然社会主义运动是一项国际事业，而社会主义

制度在某些国家的成功也会使其他国家受这种制度的支配，我国人民当然也必须受这种制度的支配。既然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而一个人如果对这门科学缺乏了解在现在就无法称为完全有学问的人，那末这就是说，对我们保加利亚人来说社会主义也是一门科学，我们要是对这门科学缺乏了解就始终在科学方面是盲目无知的。我们显然应当了解、应当研究、应当在我国传布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不然我们便不能了解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了解这一发展正在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运动，我国人民也要服从这个运动的胜利，显然它就要求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变革的意义，在人民中间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不然人民便不能有准备地进行最伟大的国际变革。最后，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它显然也必须也在我国得到发展，必须加以宣传，因为要是对这门科学缺乏了解，我们便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只能一窍不通，毫无认识。难道在我国没有传布历史知识的基础么？姑且假定我国并没有这样的基础。显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不管别人在那里说些什么，传布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我国总是存在的，就好像也存在着传布其他学说的基础一样。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可以传布得快点还是慢点则是另一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传布得快还是慢，这取决于我国的经济条件的发展有多快，以及传布社会主义思想的努力如何。既然如此，也就用不着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基础的问题了。更正确些是问：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在我国有没有基础？这个问题是必须一提的，因为如我们所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正在使生产资料——机器、土地、劳动工具社会化，就是说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正在发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并正在指出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在我国传布得是快是慢取决于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快慢。因此，假如我们能够说明我国的资本主义

生产有没有发展起来，它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那就最容易达到目的。

究竟在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的基础呢？我们在本文第二章里看到，在现代海陆交通这样迅速方便的情况下，在目前世界贸易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正在把所有人民，甚至是最落后民族的人民，都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使他们摆脱了原始的狭隘的民族生活，使所有民族都互相发生依赖关系。我国人民当然也必然落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所不及的影响之下。我国刚一解放人们就立即开始感觉得到这种影响：旧制度一下子就开始趋于解体。这种解体当然是从旧的生产方式起头的。我国一解放之后，我国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就衰落了，而在外部竞争的影响之下手工业本身也在消亡，小商业也趋于停滞。现在行会组织已经完全消失，而小商业则彻底停顿。不管到哪一个城市里去看一看，就足以相信这一点。到处都看得到这些现象，许多手工业消失了，小商业已经根本没有交易可做，小商人都已歇业。这一点已经是人人承认并为政府的出版物所证实。州管理员每年都在自己向地方自治机关的州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证实这种衰落现象。一八九一年六月十九日这一期的政府报纸《自由报》上在谈到“政府机关管理的无产阶级”即向政府机关乞求救济的穷人时写道：“手工业和商业的衰落是造成灾祸的根源……政府机关管理的无产阶级就是由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构成的。”^①而在同年六月二十日这一期的一篇题为《怎样才能振兴我国的工业？》的文章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话：“不久以前，在我国还没解放的时候，几乎在我国所有的城市和大村庄中都有规模相当发达的手工业，这种工业不仅能够满足地方上的需求，并使这些城乡的很大一部分居民得到糊口之资，而

^① 参见《自由报》第五五三期。

且是发达的对外贸易的对象……这种不久前还繁荣兴盛的工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广泛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到现在留下一些什么呢？除了一些令人望之心酸的残迹之外，别无所见。而大多数这些繁荣的城市曾几何时便已败落殆尽，城中的能干的、爱好劳动的和殷实的居民，尽管日益稀少，现在还都要花费许多劳动、经受种种辛苦才能勉强苟延残喘。”^①而在该报第五十一期上说道：“从各省报纸和各方人士那里，听到的都是一个呼声（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人那里，所闻也莫不如此）：资金缺乏，商业呆滞，手工业凋零。这的确不是假话，而是真理——人人触目即见的痛苦的真理。”^②本年五月十四日的《普洛符迪夫报》也证实了这一情形。有一系列以《我国手工业》为题的论文，在考察哪一些手工业已经衰落和哪一些还可能有生机这一问题时，讲了这么一段话：“不很久以前，我国手工业和我国的手工业者一度极尽繁荣。它们是國家的主要支柱……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我国大多数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的处境非常不妙。”^③

现在在我国随处可以见到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及竞争彻底破坏了我国的旧经济制度，迫使我们接受它自己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我们要不致毁灭便只得如此。这一点现在是无人不知的了。《自由报》在谈到怎样恢复我国手工业时写道：“不，在这里是需要私人的积极性的，当然这要在相应的国家机关的促进之下。目前，私人积极性应当表现在旨在帮助和支持保加利亚手工业者的手工业联营上。”^④《普洛符迪夫报》在谈到改善整个手工业的状况、尤其是改

① 《自由报》第五五三期第三版。

② 《自由报》第五十一期第二版第三栏。

③ 《普洛符迪夫报》一八九一年第五十一期第一版。

④ 《自由报》一八九一年第五十一期第三版。

善裁縫业^①的状况时写道：“我国的裁縫工人应当深刻地意识到，假如他們要同欧洲的裁縫手工业方面的对手竞争的話，他們就得把自己的微弱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我們干嗎在普洛符迪夫開設二、三十家縫制欧洲服装的小鋪子呢？我們干嗎要有二、三十个裁剪工而这些人一星期里只裁得上一、二套衣服呢？假如这些小縫衣鋪合并为一家或两家服装社，每家配备两个或者四个最有手艺的裁剪工和二十到三十个縫衣工，岂不是有利得多！”^②《巴尔干曙光报》在《保加利亚的近代工业》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談到这一問題：“我国沒有一张报纸不为我国手工业的衰落感到惋惜，不在寻找恢复手工业的办法。然而，不管怎样努力，总是沒法消弭灾禍，手工业总也無法提高到原有水平上去。手工业的衰落是一种经济进步，全欧洲都已经发生并且还正在发生这种情形。手工业者小規模地生产各种商品，彼此完全隔絕并且各自負担开支。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厂生产要便宜得无比……在我国已经趋于衰落的手工业，在欧洲早已絕迹。梦想把手工业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即使是恢复其中那些可以代替工厂生产的手工业，也是痴心妄想，也是想使不只是我国、而且是外国的工业发展停頓下来。应当尽力使我們也具有完善的工业（它会扼杀我国的手工业），使得国内发生变化而且使我們的财富不致外流，这比上面这办法要聪明得多和优良得多。我們应当努力做到这一点，并且終将有意无意地努力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无法抗拒的经济規律。”^③

所有这些都正在为生活本身所证实。当行会組織在我国趋于沒落的时候，就开始出現一些生产現成商品的单独的手工业作坊，而所有别的师傅、帮工和徒工則作为雇佣工人为这种作坊工作，或

① 指欧洲式服装的生产。——俄文版編者注

② 《普洛符迪夫报》一八九一年第五十四期第一版。

③ 《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一九九期第二版。

者是师傅以及自己的帮工和徒工在自己的作坊里为这种大作坊生产商品。例如，在许多城市里都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制鞋作坊，属于一个业主所有，同一行业的其他师傅、帮工和徒工都为它工作，他们都算是雇佣工人，有固定工资或按件计酬，然而都在自己的小作坊里劳动。这种情形我们在裁缝业、黑白铁业、染坊业、陶器业以及其他手工业中都能看到。在索非亚、薩莫科夫、維亨、魯謝、特尔諾夫以及其他城市都能看到这种作坊。

但是目前在我国呢絨业和紡织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最为发达。大家知道，前此不久我国几乎全部居民都是从事呢絨和紡织生产的。但是自从一八七八年解放以后，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家庭小生产很快就被消灭了。工厂生产起而代之，工厂的数目与年俱增。现在在斯利温城这种生产最为发达。一八九〇年，該城及其郊区中的工厂达十四家，^①而在今年工厂就已经达十六家。斯利温以下是加布洛沃、特利亚符納、卡贊雷克和卡尔洛沃。在加布洛沃有五家生产呢絨和从事紡织的工厂，特利亚符納有三家，卡尔洛沃和卡贊雷克各一家。这些工厂中的最主要的几家是用噴火机械和机床操作的。我们在本书第二章里已经看到，这些机器可以代替人的劳动，而管理机器既不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又不需要特殊的技能。因此现在哪里（也包括我国）都宁愿雇佣孩子、少女和妇女来管理这些机器。我国的所有工厂里，大部分工人都是从六——九岁到十四岁的孩子、少女和妇女。男工大多在那些还用老式机器和机床操作的工厂里干活。不管怎么样，现在在这些工厂工作的是工厂所在的城市的全部居民，人們無論在工厂还是在家里都是作为雇佣工人而工作。

其次，面粉业中的大生产在我国有相当大的发展。例如，在維

① 一八九〇年斯利温城州管理員的报告。

亭州有两个蒸汽磨，在特尔諾夫州有四个蒸汽磨，而在布尔加斯、索非亚和普洛符迪夫据我們所知各有一个。关于这些蒸汽磨的产量没有什么确切的材料。但是有一些关于特尔諾夫的蒸汽磨的确切材料，其中的两个年产量是一百九十万奥卡^①面粉。并且其中一部分是运往国外的，另一部分則在国内市場銷售。在国内外市場出售的面粉总值达十三万八千列沃^②。除了上举各厂之外，这一年还新开了一家看来規模頗大的造纸厂。我国的豪門巨富都是股东，投入了資本，而我国政府还对这工厂特意加以保护，責成所有的机关都向这家工厂买紙。

整个來說，我国的工厂生产在其他許多工业部門也是有基础的。但是在目前說，呢絨业和紡织业的发展最为重要。实际上这一生产部門的工厂数也在迅速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具有临时的性质。竞争、利害斗争統治着資本主义的生产 and 交换，它們不可能容忍有那么多工厂集中在一个地方，它們会消灭其中許多家而只留下有最多的生产資料即資本社会化的那几家。这一情况就是在現在也是显而易見的。例如，在斯利温城的十六家工厂中，一家政府办的工厂发展得最好，这是显然的，因为它具有大量生产所需要的資金。以下就是薩雷伊凡諾夫的工厂，这家工厂经营得很出色，并且看来正在吞并其他的工厂。我們在加布洛沃和特利亚符納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有些工厂无力与这样一些工厂竞争，如加布洛沃的馬納福夫公司的工厂和特利亚符納的茲拉捷夫公司的工厂。各国的情况莫不如此，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出入只是在于，在我国，竞争的鞭策迫使某些股份公司不得不更快地把資本——生产資料集中在自己手里。

我国紡织和呢絨的大生产的发展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造成重

① 奥卡是一种重量单位，等于一点二八二公斤。——俄文版編者注

② 參見一八九〇年特尔諾夫州管理員的报告。

要的经济变化。无论在别的任何地方还是在我国，这种生产都是国民经济最关重要的部门。因此在这一部门中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就会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根本的变化。上面说过，呢絨和紗线的加工工作在不久之前还是分散在几乎全体人民之中，而现在却从人民手中取消了这一工作而改变为工厂生产。就像在别的民族的人民中发生过那样，这种由小生产向大生产、由家庭生产向工厂生产的变化，剥夺了农民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使之变为养羊业的大牧场和技术作物的种植场，我们这一工业部门的工厂生产的发展也会在我国提出发展养羊业、设置培植各种技术作物的大种植场这样的要求。这在现在已经可以从人们的情绪上看出来了。例如，国民教育部工业委员会的一项报告中在论及养羊业之改善办法时说道：“首先必须改善我国绵羊的饲料，其办法是改善牧场和草地以及实行牧草栽培制度。”^①委员会发现，在现代小型农业生产的条件下我国的牧场、草地等等正在变为田地，于是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抵制这种做法。这个报告说：“我国的田地面积达公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八，而这个数量正在迅速增长，这是不合乎我们的愿望的，因为田地的面积应当同草地、牧场、森林等等有一定的对比关系——我们只要想到这些，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就更加容易感觉得到了。”^②在同一份《巴尔干曙光报》上我们读到：“我国目前实际上还没有这样一种大片领地可以促进大量资本集中在某一些人手中，因而意味着促进运用比较现代化的技术，而在还没有到这一地步之前，不仅不能使用复杂的农业机器，而且都无法考虑技术作物的大量生产问题。”^③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很明显，这是说应当把很大一部分土地变为牧场、草地和技术作物的种植

① 参见教育部工业委员会的报告第41页。

② 教育部工业委员会的报告第9页。

③ 参见《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三八七期第二版。

場，也就是說土地应当轉到若干个大土地所有主的手中。

然而土地就是这样正在日益集中在資本家手中，日益从小农占有变为大地主占有。我国的事件的进程命定地(盲目地)会把我們帶到这条路上去。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到异乡客地去寻找幸福。实际上現在土地就已经不属于农民了；他們只是形式上占有着土地——土地还登記在他們的名下。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国农民的土地无不为重重債務和徭役所束縛。我国的統計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关于我国土地的动态的材料，即关于土地易主情况的材料。但是誰都知道，我国农民的土地不是已经典质給銀行、給农业信貸所，就是典給了高利貸者。加貝先生在談到瓦尔納州的农民的恶劣经济情况时宣称，“只有一点还要补充一下：由于地价的跌落和农民对銀行和农业信貸所所負的巨額債務(尤其是对后者)，我們看到，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是虛假的，只要銀行和信貸所取消借約，它們就是全州的主人。”^①这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几乎所有各州的土地情况都可以大致作如下的判断。根据教育部工业委员会的計算可以看出，全公国从事农业的有二百二十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七人，共耕地一千七百九十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九决留姆^②，折合一百七十九万一千八百七十六点九公頃。根据一八九〇年一月一日的材料，公国的农业信貸所共发放貸款二千二百四十二万三千五百四十八列沃二十四斯托丁卡。把这数目除以农民人数，可知公国的每一农民身上要攤到十列沃十五斯托丁卡的債務，他們付給信貸所的利息还没有計算在內。把这数目除以公国中耕地的公頃数，每一公頃土地大約要攤到十二列沃五十斯托丁卡的債務，利息仍然不計在內。此外，自从发布了允許銀行发放以田地、草地和其他土地为抵押的貸款的法令以来，这类

① 加貝：《农业問題》，一八九〇年魯謝版，第12頁。

② 一决留姆=十分之一公頃。——俄文版編者注

貸款數已從二百六十八萬七千六百三十二列沃五十五斯托丁卡增加到一八八九年四月的一千一百八十三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列沃七十七斯托丁卡。假定在這些貸款中只有五百萬列沃是抵押貸款，那就表示每一公頃土地又得攤上大約三點一列沃的債務，利息不計在內。^① 由此可見，每一公頃土地要攤到大約十五——十六列沃的債務。我國每一公頃土地的平均價格不超過此數，由此可見，我國農民只是名義上佔有着土地，實際上土地並不屬於他們。

另一方面，農民所支付的稅賦與年俱增。大家知道，公國的預算已從一八八五年的三千六百萬列沃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八千一百零九萬三千一百七十五列沃。由此可以看出，五年來預算至少增加了四千五百萬列沃。我們如果注意到很大一部分預算是由向農民征收的稅賦構成的，就可以知道農民所繳納的稅賦比其他任何納稅人都多。加貝先生列舉了關於瓦爾納州稅賦分配情況的有說服力的材料，相當忠實地反映了全公國的情況。他在列出瓦爾納州稅賦情況表時寫道，“從這個表上可以看出，一個農民共須納稅八十四列沃五十五斯托丁卡，也就是說，一個農民繳的稅相當於二十個官吏、或六個自由業者、或二點七個商人、或六個工業手工業者、或六點八個手工業者所繳的數目。換言之，農民所負擔的貨幣貢獻比其他的納稅人要多百分之六百二十。”^② 現在我們只要稍為計算一下，就可得出一個令人不大愉快的結論。我們從工業委員會的報告中看到，我國有二百二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七人在一千七百九十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九烏拉特^③ 或一百七十九萬一千八百七十六點九公頃土地上從事農業，換言之平均每一農民有八點一決

① 參見一八九〇年的《國家公報》。關於一八八九——一八九〇年度公國農業信貸所的情況和銀行的收支情況的報道。

② 加貝：《農業問題》，一八九〇年魯謝版，第17頁。

③ 一烏拉特約等於十分之一公頃（九百十九平方米）。——俄文版編者注

留姆土地。一决留姆土地一般能带来十四列沃收益，那末八点一决留姆可得一百十三点四列沃收益。假定每一农民付七十列沃捐稅，十二列沃地租，共計八十二列沃。一百十三点四列沃減去八十二列沃，这样农民就賸下三十一·四列沃或一百五十五格罗什。一个农民拿那么些錢究竟首先干什么好——付利息好呢还是付伙食費和其他必要开支好？

最后还必须注意到，現在旧习惯在农村生活中正在消失，个人主义正在渗入农村的青年一辈的生活中去，这就是說，每个人都力求尽快分居而成为独立的主人。因此，土地日益分散为小块土地，照現在的原始的农业工具和土地耕作方法，这种小块土地是根本不能抵偿农民的劳动的，——农民的收入正在日益减少。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农民不得不向高利貸者借錢过活，而高利貸者則全无心肝地利用农民的这种恶劣处境。高利貸者借款給我国农民的利息，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年息百分之一百到二百甚至三百！加貝先生說：“总之，高利貸在我国已具有深刻的根源，并且已经变为一种强大的广泛流行的经济現象。”^①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很大一部分农民当然是付不起这种丧尽天良的利息和各种其他债务的。以后怎么样呢？那就是开始从农民手中把土地夺取过去而成为高利貸者的财产。現在这种情况应当是我国的通常現象。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就我們所知还没有任何統計材料。然而有若干这方面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一个著名的富翁——布尔加斯的一个犹太人——在布尔加斯、亚姆博耳和卡尔諾巴特各县占有了巨大的財富。还有一个德里亚諾夫的也很著名的富翁，把土地卖给謝符利耶沃县內一个村的居民（这个村距謝符利耶沃城二小时路程）。他用分期付款加利息的

① 加貝：《农业問題》，一八九〇年魯謝版，第11頁。

办法把土地卖出，然而过了若干时候他又把这些土地夺回来，而农民的私有财产却作为利息为他侵占，农民淪为他的奴隶。这种情况在斯塔尼馬克县也有发生。斯塔尼馬克的一个著名的哈治^①在一八九〇年买下了几个村，在一八九一年又买下两个村，他把这些村的土地都用分期付款加利息的办法卖给斯塔尼馬克县的农民。然而，过了一些时候，他又收回自己的土地，农民的财产则为了偿付利息被他所夺取。我们在土兹卢什县也能见到这种情况。在克尤斯田迪耳县，大家知道，早从土耳其统治的时候起很大一部分土地就在若干契符里克契耶^②手里，而其余的土地又都是沙石地。但是这个县的居民已经变为半雇佣工人和完全的雇佣工人。

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最后，近来在我国经商的风气大为发展。国内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家商业股份公司或用以积累资本的储蓄公司。例如，一八九〇年在瓦尔纳有三家公司，“瓦尔纳保加利亚商船公司”，资本一百万列沃，“勤业公司”和“慈光公司”。后两家公司的经营目的是通过发放有息贷款的办法增加自己的资本。^③ 在鲁谢有“基尔达普公司”“保险公司”“鞋业股份公司”。索非亚有“经营公司”，其目的是为自己的股东取得不动产，还有一家“顺利储蓄公司”，在普洛符迪夫有“保加利亚源茂商行”，在斯利温有“恒业储蓄股份公司”，在加布洛沃有六家储蓄公司和商业公司，在谢符利耶沃有一家商业公司和三家储蓄公司，等等。^④ 在物品交换方面同样也有根本的变化。最近以前我国的大宗贸易都是在集市上成交的（如

① 哈治，去麦加朝过圣的伊斯兰教徒的称呼。——译者注

② 契符里克契耶即农场、小地产的占有者。——俄文版编者注

③ 一八九〇年瓦尔纳州管理员的报告。

④ 参见一八八九、一八九〇年《国家公报》。

朱馬伊、烏宗卓夫等集市)，但是現在这些集市的作用是微不足道了。現在貿易日益集中在沿铁路、水道的几个大商业中心，像索非亚、普洛符迪夫、布尔加斯、瓦尔納、魯謝、斯維什托夫等地。比較殷实的商人都不断从內地城市迁移到这些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就一年比一年扩大。因而在我国与資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大城市也将发展起来。

总之，我們的国家已经走上資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道路。从我国解放时起直到現在，我們的生活完全处在西欧的经济制度的影响之下，而我国人民之間也发生了一种資本主义生产早就使其他文明的民族服从于它的相互依賴关系。我們越往前发展，这种影响和我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依賴关系就越大。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国同其他国家人民的貿易关系自从国家解放以后就越来越扩大了。这可以从关于对外贸易的統計材料中看出来。例如，四年来进出口量从金額(列沃)上看就有如下的变化^①：

年 份	进 口	出 口
1886	64,285,309 列沃	50,404,314 列沃
1887	64,742,481 列沃	45,747,247 列沃
1888	66,362,431 列沃	64,198,634 列沃
1889	72,869,245 列沃	80,581,076 列沃

把这张表中的数字作一番比較，尤其是把上述年代中的出口量同一八七九年出口量作一番比較，我們就能够看出显著的变化。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至一八八〇年三月一日即十四个月的出口量共七百三十七万七千二百零九列沃，一年共六百零九万六千零十

① 《一八八九年保加利亚公国同外国的貿易統計》，一八九〇年索非亚版。

六列沃。^① 这說明，十年以来，公国的貿易关系从金額来看不是增加到十倍，那也至少有五倍！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对外貿易的增长还可以从国际邮电通信量中看出。例如，国际邮电統計向我们表明以下的情况^②：

年 代	来 量		去 量		附 注
	私人电报	商品样品	私人电报	商品样品	
1886	53,185	12,508	35,732	27,678	本表的材料中 不包括政务电 报和公务电报
1887	56,034	5,272	40,692	32,340	
1888	59,629	12,950	46,384	16,368	
1889	64,807	15,812	48,196	47,724	

由于修建了联结沿海的和多瑙河沿岸的商业中心的铁路，这些关系自然还要日益扩大，欧洲各国经济制度的影响也还要日益增加，我国人民的命运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的联系还要密切。保加利亚同欧洲通过海道、多瑙河、铁路和邮电联盟而保持的联系，保加利亚人对钱财的爱好，国内的自然财富——所有这些都把我们生活推向实际上它已经走上了的道路，即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道路。如馬克思所說，只要人民預測到自己的自然发展規律，那就决不能再使他們离开这一規律。在这种場合，个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减轻我国人民在新的生产方式誕生时所经受的痛苦，以及寻找一种良药来医治新的生产方式帶給人民机体的創伤。

我国出現的資本主义是最新式的，欧、美已经存在的就是这种形式，这就是資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形式和拥有构造新穎的机器的集体的(共同的)国家資本家这种形式。在对劳动的剝削方面，我国的資本主义也是最新式的。例如，在我国也同在其他各国一样，

① 一八七九年《国家公报》。

② 參見一八八八、一八八九、一八九〇年《国家公报》。

工厂总是喜欢使用童工和女工的劳动，因为童工和女工工资比较低廉而且他们又完全管理得了机器。在我国，工人们也是日夜劳动，一天劳动十四到十六小时，所得只是二十到六十斯托丁卡工资，只有男工一天才总算可以挣到一列沃到一列沃五十斯托丁卡工资。但是事情还不止此——对工人的剥削在我国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通常工厂主总是按月雇佣工人的。这说明，工厂主在一月的时间里不只剥削工人，而且还剥削工人的工资。工厂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一年时间里就还要多些)用工人的工资做流通资金，从中渔利，到月底从所得的利益中来偿付工人的劳动。这样，我国的工人就受到了双重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方法现在在欧洲无论哪里都是找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劳动都是按件计酬的，工人至少在周末要得到工资。要是那里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工人的剥削就算很强烈了的话，那末在我国的这种剥削方式真可谓残酷达于极点了。既然我国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也正在使过去的独立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使他们为饥饿所迫而不得不彼此争相出卖自己的劳力，那末，国家的责任就是要限制工厂主对工人进行的这种残酷剥削。

但是，不管怎么样，资本主义在我国不仅是有基础的，而且是以它的最新的发展形式出现的。既然资本主义有基础，那末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在我国也有基础。这是清楚不过的事情。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就越是广泛。外国的竞争的妨碍我国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影响造成的结果却是一样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和人数与年俱增。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巴尔干曙光报》说得很干脆：“工厂造成无产阶级，但是在我国要是没有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数还要来得多。”^①

^① 《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三九九期第三版。

在头几章里我們看到，经济制度是基础，在它上面形成其他一切設施；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設施等等。假如社会的经济制度改变了，所有其他的制度也就会起变化。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即经济制度的时候，自然也在其他任何一种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精神关系）上使我們的生活得到改造。大家知道，在我国从土耳其的羈軛下解放出来之前，我国社会中的这些关系是何等单纯。但是自从解放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彻底改变了我国的一切。而这种生产越是发展，这些变化就越是广泛，它們也就将越是深入和容易理解。实际上，过去我国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相同的；既无大富，亦无大貧，財富的分配多少是均等的。現在的情况正好相反：財富日益集中（集积）在少数人手中。既有大富也有大貧——貧民的数目与日俱增。这是可悲的、然而是不抗拒的真理。政府报纸《自由报》在一八九一年四月十二日的一号里写道：“过去实际上并不感觉到貧困，因为生活是简单而出奇地乏味的，而現在我們已经在解放以后进入了比較复杂的生活，各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資本集中在某些人手里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发展（虽然在我国发生的这一些情形，同其他欧洲国家过去已经发生和現在正在发生的情形比較起来，还是属于小型的）。那就不能再說我們这里沒有貧困了。”^①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同一份报纸上《我們献身于工业》一文中說：“然而当情况比塞尔維亚更可怕的时候——貧困使我們一无所有，同时通过飢餓使我們的智力和体力衰竭，我們漠然地不发一言，只是有时嘟囔几句，說是政府本身应当加以考虑。但是这是不对的。每一个爱国者在这一人民的事业中都担当一份責任。淪于赤貧、忍飢挨餓的祖国比淪陷的祖国更不好。”^②

① 參見《自由报》一八九一年第五〇四期第三版。

② 參見《自由报》一八九一年第五五九期第三版。

在同年六月十九日的《巴尔干曙光报》上我們讀到，“据說，特洛揚县克涅日村的一个农民把自己的妻子用一百奧卡面粉和五列沃的代价卖給了別人。他由于貧困，无法养活自己的妻子，不得不出此下策。实际上在特洛揚县貧困現象是相当广泛的，因为那里的一大部分土地寸草不生，并且有很多村庄簡直在挨餓。”^① 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該报在答复《自由报》时写道，“《自由报》的編者还知不知道，在克尤斯田迪耳县有一些石沙地，那里的农民三天才吃上一次面包，通常只用撒上一点儿面粉的熬蔬菜（很像靠当东西过日子的农民喝的波伦泰^②）充飢。他們知不知道，在符拉昌县和普列溫县有这样的地方，那里的农民住的小屋子不是造在地上，而是在地里挖出来的，他們全家都住在这种窑洞里，洞里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窟窿，既是門又是窗又是烟筒。”^③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該报在答复克尤斯田迪耳州管理員的反駁时写道：“第三，我們不妨告訴您（尽管这同您的州和您的管理工作无关），在索非亚州有一个叫做伊斯克烈察的县，在这个县里有一个叫做斯沃吉亚的村。去年有人在这个村里发现，妇女把剝掉了玉米粒的玉米心子弄碎，做成粉来喂孩子。”^④ 瓦尔納州管理員德拉索夫先生在考察州內的农业問題时对农民生活問題这样說道：“他們的食物、他們的衣着和住房都很恶劣。他們的主要食物是烤得很坏的黑面包、胡椒、葱，偶尔有些牛奶和干酪。肉是他們的奢侈品，只有斋戒前的最后一个葷食日、开斋日、圣诞节、复活节和其他不多几个节日里才出現。衣服的膩垢重重，也不加洗滌。他們的很大一部分住房你可以把它們隨便叫做什么，可就是不能叫做房子。住人的地方

① 參見《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三七三期第二版。

② 波伦泰(Полента)——用玉米粉或栗子粉熬的粥。

③ 參見《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三七七期第三版。

④ 參見《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四〇七期第三版。

也放牲口，因而疾病丛生。”^①

关于在我国貧困正在增长的情况，还可以通过許多别的例子看出来。例如，从貧民所編制的关于他們救济的貧民情况統計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这些統計表是隱瞞起来秘而不宣的，好像这样就可以修改真相了。但是尽管这样，我們还是可以根据我們所掌握的两个貧民所的統計表来判断我国貧困迅速增长的情况。例如，卡贊雷克貧民所以对貧民免費施药次数如下：一八八八年三百次，一八八九年八百次，一八九〇年一千一百次。可以看出，在两年时间里，卡贊雷克貧民所加以救济的貧民数目增加了两倍。魯謝的城市貧民救济所在一八八八年发放貸款二千零三十五列沃，一八八九年为三千五百列沃^②。从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九年，就是說在六年之中，沒有偿还能力的、死于穷困的和迁居而未留下一点财产的負有国家債務的人，据称达七十七人，这些人并且都已定罪（最少是因負債一列沃七十七点五斯托丁卡，最多是三千列沃）。根据一八九〇年一月的材料，公国的农业信貸所一共发放了十八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列沃七十四斯托丁卡来賑济貧穷的移民。此外，我国貧穷的增长还可以从其他統計材料中看出来。現在大家都知道，随着貧困現象的日益扩大，犯罪、自杀以及罪犯的数目都有所增加，而且增加得特別快。例如，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到一八八八年七月，共发生了四百九十二起蓄意謀杀和致伤案件，一百十七起自杀案件，六百三十九起盜窃案件。^③ 而从一八八九年二月到一八九〇年八月共发生了八百十四起蓄意謀杀和致伤案件，二百零六起自杀案件和一千二百六十三起盜窃案件。^④ 公国的监

① 一八九〇年瓦尔納州管理員的报告。引自加貝著《农业問題》一书第10頁。

② 參見一八九〇年《国家公报》。

③ 參見一八八八年《国家公报》。

④ 參見一八九〇年《国家公报》。

獄中囚禁的农民人数在一八八八年一月有一千四百九十六人，此后每月不断增加，到同年十月达一千五百六十三人，一八九〇年十月达一千七百七十五人，而在一八九〇年八月达一千九百八十四人。囚禁的手工业者的人数在一八八八年一月有三百五十五人，此后与月俱增，到同年十月达四百零七人，到一八九〇年十月有四百十四人，而在同年九月达到四百五十四人。①从这些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我国最大多数的囚犯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其次是僕役，而他們也是貧民。大多数囚犯都因犯偷盜罪而被判刑，其次則是因为犯杀人罪。例如，一八九〇年一月有一千零七十个犯偷盜罪的囚徒，这数目与月俱增，到同年十月达一千二百七十五人。杀人犯在一八九〇年一月达六百四十六人，除了四月份人数减少到四百零二人以外，此外都月月增加，到同年十月达七百五十三人。②如果人們丰衣足食、生活很好，难道会去偷盜、杀人么？最后，无力付稅的納稅人数目与年俱增，这也說明了貧困的增长。这可以从大量的欠稅和收稅时的那种严厉态度中看出。例如，瓦尔納州在一八九〇年欠稅額达二百三十四万四千一百十二列沃，斯利溫州达二百零二万六千零四十列沃六十五斯托丁卡，特尔諾夫州达一百六十三万七千五百七十三列沃，等等。③关于貧困的程度还可以根据酒館数和一般酗酒現象的增长来判断，据一些州管理員的«报告»指出，酗酒現象近来增长得特別厉害。与貧困增长的同时，疾病自然也就更加蔓延，从公国的病院的材料中我們可以确信这一点。卖淫現象——私娼和公娼——也普遍起来，与此同时梅毒也就蔓延开来，这有使全保加利亚都傳染上的危險。

总之，貧困在增长，而我国人民日益分化为两个社会階級：手

① 參見一八九〇年«国家公报»。

② 同上。

③ 參見一八九〇年瓦尔納、特尔諾夫、斯利溫等州管理員的报告。

中集中了財富的資本家和飢寒交迫、一無所有的貧民，即无产者，后者的人数与日俱增，彼此間的竞争正在加剧，他們的境况日益恶化。根据我們从斯利温、加布洛沃、卡贊雷克和特利亚符納的工人那里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看，可以自然得出一个結論，我国的失业大軍是够庞大的。哪个地方的工人都對我們說：“只要有一个工人走了，就有十个人等候在工厂門口。”但是在这些城市里工厂数的迅速增加充分证实我国无产阶级在增加这一看法。

我国的政治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只不过几年以前，我們的国家还是保护小生产和旧生产关系的；它不是某一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它代表全民利益。现在情况根本改观。目前国家越来越开始支持新的生产方式、資本主义、大工厂工业，并公然庇护資本家階級。例如，去年国家以补助形式拨出十五万列沃給加布洛沃的一家股份公司，供修建被焚毀的厂房之用。今年它給予馬納福夫公司的造紙厂以特殊权利。八月十五日的《巴尔干曙光报》写道：“一八八九年三月十日发給軍队的第九号通令規定，各部队和軍事机关以后购置的一切家具都必須是地方生产的。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发給軍部的第二百号命令規定士兵須着‘呢制服’……同年三月发給軍队的第八十三号通令指示，金銀边飾、线绳都应当用地方生产的，而不用舶来品。”^①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国民會議中的人民代表已经都是工厂主和資本家。最后，国家政权一天比一天集中，而地方自治机构則趋于衰落。近来甚囂尘上的“选举資格”問題，即限制选举权的問題，是侵犯根本法——宪法的。通过無論什么选举資格来限制选举权，結果总是使政权和社会的权力仅仅集中在有产階級、資本家和工厂主手中²⁶。

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发生的重要变化也反映在訴訟法上，新的

^① 參見《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四一八期第三版第二栏。

遺产法就是根据訴訟法施行的。新遺产法²⁷是法国遺产法的一字不易的譯本，因而自然就符合資产階級的利益。它取消了我們国家人与人之間的一切旧有的日常关系。最近以前我国还是遵行土耳其遺产法的，这个遺产法中一大部分是关于家庭和公社习俗的，它完全符合人与人之間简单的旧经济关系。但是随着新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人的关系开始大大复杂起来，已经不能够再用旧法律来調整了。新法律作为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支持者立即应运而生。可以預期，将来我国的整个立法都会按照新的经济制度而起变化。

現在最显著的变化是家庭关系和宗教关系上的变化。解放之前我国风尚之淳朴是人所共知的。那时把夫妇之間的不忠实行为看作是罪大恶极的事情，而解除婚約則是十分少見的現象。在締結婚姻的时候，要求女方的无非是她应当成为一个优秀的和勤俭的主妇。現在的情况适得其反。夫妇間的不忠实行为和离婚現象在在皆是，人們都已习以为常。現在人們把婚姻看作是致富和生产財富继承人的手段。男子要找富有的妻子，女人要找富有的丈夫，以便丈夫可以保证她过游手好閑的生活和供她奢侈揮霍。現在的婚姻的主要基础就是財富、資本，而先前婚姻的一切基础都已消失。不幸福的婚姻自然比比皆是，多妻現象也一天比一天普及。結了婚的男人，尽管有着賢惠而健壯的妻子，仍然到妓院里同別人的妻子勾搭；这种現象現在在我国絕非少見。我們在《活动家报》上讀到，“現在的婚姻造成夫妇之間的不忠实，这种不忠实导致最大的不幸，甚至导致像毒害和謀杀这种犯罪行为。”^①在《巴尔干曙光报》上也对这問題作了闡明，“但是，与我国获得解放的同时，奢侈浪費、风俗敗坏和道德淪丧行为都开始在我們的簡朴的家庭中

① 參見《活动家报》一八九一年第一期第13—14頁。

猖獗起来。”^①《活动家报》在談到这种状况的原因时写道：“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几乎难以枚举，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这些：根据利益上的考虑、而不是根据誠摯和朴实的爱情結成的婚姻，年龄上不相称的婚姻。”^②

总之，婚姻完全失去了过去有过的浪漫的宗教的意义，而变为致富的手段。这是資本主义生产的結果，資本主义生产过去和現在都在破坏我国的旧婚姻形式，就像在其他国家已经作过的那样。

宗教关系方面也发生着这种破坏現象。資本主义生产推翻了我国的宗教信仰。我国人民在过去虽然并不特別信教，但終究还有一些宗教条規和宗教的恐惧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們在生活中的准則。現在这些都消失了。目前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个人利益、对财富和享受的渴望为准則。現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金錢，为了财富，人与人之间进行着畜牲般的斗争。自己的利益、金錢、财富——这就是目前我国的宗教，同整个欧洲的情况一样。因此，道德败坏、弄虛作假和欺騙詭詐現象在我国有着深刻根源。一八九〇年一月之中，犯伪造、欺詐罪的囚犯达五十二人，五月达六十八人，六月——六十四人，七月——六十七人，等等。强奸案件在一八九〇年一月达一百十三起，此后逐月上升，到同年十月达一百五十起。^③这是我国的惊人現象。要是我国的官方統計能够再精确一点，情形就还要惊人。在現代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影响下，無論哪里的保加利亚人同所有的文明的基督徒一样，都仅仅是口头上的基督徒，而在实际上則在自己的生活中奉行着相反的規則。而所有这些变革之所以发生，并沒有任何一人作过任何促

① 參見《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四三〇期第二版。

② 參見《活动家报》一八九一年第一期第13—14頁。

③ 參見《国家公报》，关于一八九〇年里公园各監獄內囚犯情况公告。

进推动，而纯粹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自然结果。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保加利亚正走上了这条历史发展的道路。

最后，我们都是我国思想生活方面巨大变革的见证者。五、六年以前，在我们国家里，人们绝不注意经济问题。保加利亚人的思想只在旧概念的狭隘范围里活动，这些旧概念又都拘守在一般的陈腐而暧昧不清的观念之中。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简单纯朴、经济上的静止状态束缚了精神，限制了思想。随着旧经济制度的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发展，简单纯朴和静止状态日益消失，而代之以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急剧的经济变动。与此同时，思想和观念也就越出了狭小的范围，渐渐扩大，并且已经不能满足于旧概念。近来，人人都忽然谈论起工业、商业、农业和机器来；人人都在研究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迫切问题”。我国经济条件的发展也引起了经济学说的发展。《自由报》和《巴尔干曙光报》发展了关于保护关税政策（保护我国的商品免受外国的竞争）的学说，《工业》杂志发展了资产阶级的陈腐的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旧原理，即国家决不能干预社会的经济活动的原理。^①

除了这些学说之外，还有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也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诚然，我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还是很不发达的：到现在为止只有不久之前才翻译过来三四种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我国的经济条件越发展，就越是会感到有发展新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生活中的经济趋向越是明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者说来就会越是容

① 参见《自由报》一八九一年第五五四期《怎样才能振兴我国的工业？》一文，《巴尔干曙光报》一八九一年第三九九期《近代保加利亚的工业》一文和一八九〇年的《工业》杂志。

易理解。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保加利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那末，从以上的全部论述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十分明显，我们的生活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自己的形象，并且正在具有资本主义的形象和与资本主义社会近似之处。我们的生活完全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而这一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正在十分自然地导向社会主义。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们的生活的自然发展正在把我国人民导向社会主义。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在我国是有基础的。

第 五 章 结 论

每个人从本书以上全部论述中都可以看到，对我国一切社会主义者的责难究竟有多少是处。这些责难尽管是荒谬无稽的，却已经流布甚广，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结论中就此申述几句。

有人說，我国的社会主义者希望分配财富。这不是事实。

誰都知道，而从本书上一章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的财富早就多少平均地在所有人之間分配过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的影响之下，我国的财富现在正集中(集积)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大多数人民却变为忍飢受餓的貧民，变为无产階級。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我們是指那些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原則的人，即社会民主主义者)承认这一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承认它正在使生产資料——机器、土地和一切别的劳动工具——社会化，使之成为公共的，这也就是说，这一历史过程正在导向社会主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承认，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归根到底要使一小撮资本家階級的存在成为不合时代的东西(荒谬的东西)。这些资本家簡

直是啥也不生产，他們沒有管理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能力，而只是把社会财富占为己有而已。他們还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日益频繁的工业和商业危机(崩溃)正在阻碍生产和交换，消灭现在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同时加深贫困和痛苦。因此，现在国家一天比一天不得不着手管理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但是历史过程并不以此为止。它继续向前行进，以致终于迫使国家宣布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并把财富的资本主义占有变为社会占有。

总之，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希望分配财富，而是希望财富社会化，变为公有的财富。或者说得确切一点，不是希望分配财富，而是认为像过去那样的分配财富并不会带来益处；财富的分配使人沦为贫民并终身不得自由，因此就不可能把人类再往后拉到这种财富分配上去。人类目前的趋势是把财富以及对财富的占有变成为社会的事业。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随着生产资料之变为公有财产，产品占有的性质从资本主义占有变为公共占有，在各方面都将发生变革。他们认为，由于这种经济变革，阶级的分化现象以及现在那种形式的国家都会自然消灭。国家从政治单位变为经济单位，从管人的机构变为管生产的机构。它被改造成为各个生产公社的联合组织。他们认为，这一变革将使两性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都得到平等权利，人人将都能受到教育，教育将成为一种社会的义务。最后，他们认为造成所有这些情况的原因，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而不是由于某一个人要这样做或不要这样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绝无那种天真的幼稚见解，即认为人类社会中的革命是由于个人愿望而发生的。他们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认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下面这些：向工人、人民解释清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这些规律的结果；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并且向他们说明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在我国的作

用；在我国普遍启发人们具有这种意识，即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更明确些说就是正在走向：

(1)把生产资料和占有方式改造为公有的；

(2)分散国家权力并把国家改变为生产公社的联邦同盟。²⁸

(3)两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平等。

(4)两性都可享受成为社会义务的、完全的和科学的教育和教养。

向我们的工人指出种种合法手段，他们用这些手段就可以团结一致和自觉地、与社会的历史发展相适应地进行工作——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所在。

有人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者希望婚姻关系混乱，这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婚姻关系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是混乱不堪的。在这种影响之下，家庭中的道德败坏行为、多妻和多夫现象、卖淫和梅毒正在发展。现在我国的婚姻关系是从利害关系出发的，是为了金钱财富，所以它就要转变为道德败坏行为。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将仅仅建立在互爱和两性平权的基础上，只有到将来这个时候，婚姻关系才会消灭道德败坏行为和家庭悲剧，而这些在现在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要毁灭宗教，这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看到，宗教在我国正在自行消灭，没有任何人加以促进。它是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消灭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人的信仰一定是随着人们发展时期的不同而不同的。这是每个人的私事。宗教问题是否同社会主义有关，要看它是否妨碍人们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宗教观念是随经济条件为转移的，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这些观念也

在变化。

有人說社会主义者散布憎恨富人的情緒，这也是不正确的。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决不是这样的。他們认为，資本的集中是发展的自然結果，資本家不能对历史的客观进程負責。他們是否要負責任，要看他們是否有意识地阻碍启发作为社会階級的工人的意识，要看他們是否代表退步現象和妨碍进步。

最后，有人說社会主义敗坏我国青年的道德，这是不正确的。

难道你向随便哪一个人說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規律就算敗坏道德嗎？你帮助某一个人意识到他所生活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規律就算敗坏道德嗎？你使人們了解現在轰动全世界的一門科学这算得上什么敗坏道德么？共实，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在正教中学里学习的青年并不是可以从中造就出我国社会主义者的阶层。工人和准备成为工人的人才是这样的阶层，在准备成为工人的人中包括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和能够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知识分子。学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关心的，因为他們在将来可能成为那种理解人类的現代历史发展的知识分子。

至于有人責难社会主义者反对民族界限，那也是不正确的。

我們已经看到，現代資本主义生产通过自己的灾难——竞争，通过迅速方便的交通工具，正在消灭民族閉关自守現象，使各民族发生极密切的依賴关系，破坏民族界限并把所有民族都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市場，变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民族。現代資本主义生产和交換把一切(科学,文学,乃至語言)都变成世界性的。但是我們认为，在人能够工作得最好的地方，人才能带来最大的益处。而人只有在他所熟悉的地方和在他所熟悉的人民之中才能工作得最好，因为他最了解这块地方和这一民族的人民，能够最好地研究和了解它們。总之，每个人最好是能在自己的民族中工作，他同这民族通过各种各样复杂的紐帶(对童年生活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友情、

亲属关系等等)而息息相关。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要那种对某一地方的形而上学的(不确定的)爱,这种爱是統治阶级向貧苦人民大肆宣揚的,他們称这种爱为“爱祖国”,而且在这一幌子后面隐藏着资本家阶级为了利己的目的而对各族人民的剝削。社会主义者有的是对作为现实的个人集合体的人民的爱,这些个人都在受苦遭难,要求生存、发展、蕃殖等等。社会主义者对人民的这种可以說是现实的爱非常强烈,而形而上学的“对祖国的爱”却非常薄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下,这种“对祖国的爱”根本就在逐渐减弱。实际上,如我們所看到的,現代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換一方面在把人民变为无产阶级,变为飢寒交迫、无家可归、不能找到工作的雇佣工人,同时还迫使他們不得不在各地、各国之間不断迁徙,因而那些使人同一定的地点和民族联系起来的紐带就被破坏了。这样,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祖国还有什么东西保卫着他們呢?“淪于赤貧、忍飢挨餓的祖国比淪陷的祖国更不好”。从另一方面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使得各国工人不得不互相接触、熟识、接近和团结一致。因而,无产阶级的对地方的爱就轉变为对个人的爱和对个人的联合的爱,即对人民的爱。社会主义者所要发揚光大的正是这种爱,因为它能加速历史过程,使我們能更迅速地向更高的和正义的人类共同生活形式——社会主义过渡。

由此可見,一切硬加在社会主义头上的罪名都是不正确的,那些責难都是沒有道理的。然而不能否认,在我国可能也有这类奇談怪論的鼓吹者。但是他們或者不是社会主义者,或者虽是社会主义者而并不理解現代社会主义运动,也沒有研究过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同那种立足于空想家的非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同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卷起褲管、聳起領子、衣衫不整、蓬首垢面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同那些把早已消亡的虛无主义的特征当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者毫无共同之处，也同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在明后天就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否重视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要看他们是否可能转移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即是否参加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队伍中来。

在我国，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甚至是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所知甚少。正因为这个缘故，才有那么多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者的谣言在流传。这些谣言还在某种绝对不是科学的书刊中得到证实，这些书刊近来在我国流传颇广，它们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混合物（除了上举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以外）。这类书刊说实在话只能带来许多失望情绪和造成许多幻想和无益的、不良的意愿。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才能够使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胜利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作中永远精力充沛。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能使社会主义理想取胜的科学工具（科学社会主义在历史发展中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工具），我们才能够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公认，才能够消弭对社会主义者的谣言，才能没有失望情绪，这种情绪是只有那些认识模糊、观念混乱和思想不科学的活动家才有的。那些已经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武装起来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正在启发我国人民的意识，并且帮助他们自觉地了解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对于他们，我们可以用列都尔诺教授的几句话告诉他们：“这些启蒙者，这些未来的同时代人，这些已经了解最高道德的理想和较为完善的社会必将到来的人将是幸福的。在这种较为完善的社会里，人人都能过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在这种社会里，任何人为的特权都将消失，人人可以各得其所，尽可能地得到发展；在这种社会里，谁也不能再听别人摆布或者被当作牺牲品；在这种社会里，现代的大宗教——对财神爷的迷信——已经没有信徒；在这种社会里，狭隘的利己主义——无论在个人范围内还是家庭范围

內——都将为对公众福利的关心所代替。”^①

願我国的这些活动家都是幸福的。願我国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在我国自觉传布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时刻是幸福的。科学和历史发展的自然規律是我們的忠实而不可战胜的盟友。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信仰和毅力的源泉尽在其中。

俄文譯自保加利亚文，据《第米特尔·布拉戈耶夫选集》（两卷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索非亚版，第1—86页。

俄譯者彼得罗夫

中譯者魏城

^① 列都尔諾：《道德的进化》，一八八七年巴黎版，第463页。

学习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主义学說学习指南²⁹

前 言

已经有好多年，一些青年同志总是书面或者口头地要求我給他們拟一个系統地自修社会主义学說的书目。尽管我很想这样做，但是却不能早点着手拟出这样的书目。主要有两个情况妨碍着我：

第一，适合于这个目的的保加利亚文的社会民主主义书籍，直到最近为止还是十分貧乏。加之某些为这个目的所必需的书籍的譯本，不仅譯得很糟糕，而且簡直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必須等待別的馬克思主义著作的新譯本和一些早先翻譯过的书籍的重譯本出版。

第二，每当我想着手編拟书目的时候，总是发生一个疑問：单靠这样的书目能不能达到目的。这个疑問必須解决。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它解决。

去年有一个机会促使我完成了这个嘗試。一位同志，女大学生依·馬·^①，我非常感謝她在修改《資本論》校样时給了我很大的帮助，她也要求我給她拟一个比較系統地研习馬克思主义的书目。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一次必要的嘗試。我編拟了附在这里的书

^① 指依万卡·馬林諾娃，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老党员。一九〇九——一九一四年在大学讀書时曾帮助布拉戈耶夫校閱《資本論》的譯文。——譯者注

目，并且建議依·馬·同志根据这个书目循序漸進地进行閱讀。但是仅仅依靠书目而沒有学习指导看来还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这一尝试使我想到了可以再写一个学习指南附在书目上，这个学习指南就是現在提供給讀者的。

这个学习指南中有几章是根据书目中的某几本书作出的結論。但是我並沒有完全袭用这些书的内容，并且还利用了一些在这几本书中沒有举过的例子。在其他各章里（主要是第二部分的各章），我完全沒有遵照书目中列举的书的内容結構。在这几章里，我举的全都是新例子。我这样做主要是出于这样一个想法：重复讀者在书目中列举的书籍里找得到的东西是沒有益处的。我的任务是在基本上指导讀者怎样較为容易地理解那些著作的内容，以及从中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因此，我的学习指南自然既代替不了书日本身，也代替不了对书目的认真钻研。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它仅仅是学习指南，讀了它以后应当极其认真地研习书目，然后再去比較具体地和广泛地研究馬克思主义，运用它来解释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現象及事件，以及解释其他各国的这种現象和事件。

在完成編拟书目和学习指南时所规定的任务上我究竟成功了多少，对同志的要求究竟可以滿足多少，这要同志們自己来判断。只要我能够对同志們掌握馬克思主义有所帮助，而因此有助于他們成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对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事业有所裨益，那我就十分滿意了。馬克思主义哲学学說是使这一事业达到胜利的最强大的武器。

第·布拉戈耶夫

一九一一年二月于索非亚

初学馬克思主义学說的书目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

1.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3. 波格丹諾夫：经济学簡明教程(其中历史部分)。
4.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原理(社会民主党纲领解释的第一部分)。
5. 考茨基：卡尔·馬克思的经济学說(第一篇)。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 恩格斯：費尔巴哈論。
3. 恩格斯：反杜林論。
4. 果特^①：历史唯物主义。
5. 梅林：历史唯物主义。
6. 別尔托夫^②：馬克思的哲学学說。
7. 普列汉諾夫：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

第三部分 通过实际运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的原理和辯证法

1. 克雷日維茨基：思想的起源和传布。
2. 拉法格：馬克思的经济决定論^③。

① Hermann Görter, 一八六四——一九二七年, 荷兰社会主义者, 詩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譯者注

② 即普列汉諾夫。——譯者注

③ 中譯本名《思想起源論》, 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出版。——譯者注

3. 考茨基：道德的起源。
4. 考茨基：伦理学和唯物史观。
5. 考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6. 亨利·洛·霍尔斯特^①：现代文学中的神秘主义。
7. 亨利·洛·霍尔斯特：易卜生。
8. 普列汉诺夫：艺术和批评。
9. 普列汉诺夫：历史上的新趋势。
10. 什里亚文：自由和必然。

第四部分 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 过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3.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5. 考茨基：法兰西共和国和社会民主党。
6. 考茨基：法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

马克思主义学说学习指南

导 言

进步是资产阶级作家、哲学家和学者最喜欢用的字眼。在教科书里，在供大学生用的关于历史、特别是关于历史哲学的学习指导书里，在哲学和人类社会史的导论里，你们到处都能碰见进步这个字眼。你们经常听到人们说，某一民族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人类

^① Holst, Henriette Roland, 一八六九——一九五二年，荷兰社会主义者，女作家。——译者注

社会在两千年來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那末究竟什么是进步呢？

进步这个詞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产物。它靠这个詞来掩盖资产阶级关系的本质，长期蒙蔽对资产阶级統治不滿的人的思想。但是究竟什么是进步呢？——归根到底，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

资产阶级社会即现代社会本身充滿着极大的矛盾、血腥的斗争和战争，在这些斗争和战争中，强大的統治阶级的残忍和卑鄙同资产阶级作家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心爱的公式尖锐地相抵触。人类社会史也正是一部不息地进行斗争和掠夺战争的历史，强大的統治阶级的残忍和卑鄙在其中占有极其显著的位置。不过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提出这一问题：究竟什么是进步呢？这个问题过去就发生了，资产阶级作家应当对它作出解答。但是资产阶级作家们的解答是五花八门的。因此，那些希望在资产阶级作家那里弄清楚进步的本质的人都如墮入五里雾中。而我们那些青年同志，虽然他们想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但是他们都在资产阶级学校里讀过书，他们通常都正在开始学习无产阶级的学說、学习馬克思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的本质的种种糊涂思想。自然，这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巨大障碍。

我们的青年同志都想把自己的一生同伟大光荣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联结在一起，帮助他们排除资产阶级关于人类社会进步本质的糊涂概念，因而就能使他们较为完整地掌握这一伟大事业的学說和哲学，这就是这一《馬克思主义学习指南》的主要任务。因此，它的第一部分就是讲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的。

根据馬克思主义学說，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結果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科学却相反，它用思想的进步来解释历史运动。照这种科学的說法，起初出現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他们开始鼓吹这些思想，终于完成了社会的变革。但是，这些进步思想究竟是从哪里出現和怎样出現的呢？它们为什么在

現在而不在一百年前出現呢？為什麼那些昨天還被認為是進步的思想今天卻相反地被認為是反動的呢？資產階級思想對所有這些以及類似的問題都不能給予科學的解答，或者給的根本是含糊其辭的、非科學的解釋。只有馬克思的學說才能在現在對這些問題作出科學的解答。

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思想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相反，它承認思想的力量。但是它的任務和它的最偉大的科學功績則在於說明：為什麼在一定的時候出現這一或者那一思想，這些思想是怎樣出現的，這些思想什麼時候才能够在生活中得到勝利。馬克思主義也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但是這裡需要作出科學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麼在一定的時候會出現這些在歷史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個別人物？正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地解說清楚了這一問題，同時又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而資產階級科學不是用純粹的偶然性就是僅僅用個人的堅強意志乃至神意天命來解釋這一問題。

這個學習指南的第二部分就是从馬克思學說的觀點來闡述思想或者意識形態的起源以及歷史事件的原因的。但是，主要由於第二部分的关系，學習指南的讀者应当注意我們的這些意見，因為在那裡沒有涉及關於思想的意義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不過他們可以根据在書目中指出的書籍來了解這個導言里所涉及的一些問題。

第一 部 分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的進步觀

(關於書目的第一部分)

進步思想主要是指人類社會來說的。它的本質可以簡短地表

述如下：社会组织的不断更替，旧的社会制度为新的社会制度所排斥和取代。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有自己所依存的特定的基础。这就是经济基础，它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最初的社会组织是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它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经济，即共同占有像土地、小船、住房之类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并且同社会的财产情况和需要相适应的共同消费品。那时的社会是一种闭关自守的和同其余的世界相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一种为了全社会的个人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的生产。而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

但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以后的发展中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方式。^① 共产主义经济逐渐划分为各个部门，而每一个工作人员仅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从事劳动。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劳动分工日益扩大了，而分工则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因此共产主义经济就分解为各种单独的经济，其中每一种经济所生产的已经不是社会需要的全部产品，而只是某几种产品，但数量却远比它所需要的来得多。于是，在这种经济中就出现了可以开始交换的剩余产品。

在谈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它是由一些孤立的共产主义公社组成的，其中每一个公社都是一个闭关自守、互不往来和自给自足的不大的共产主义经济单位。显然，在某些共产主义经济单位里，划分各种职业的过程完成得早一点，因此劳动分工也就早一点得到发展。由此就出现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出现了剩余产品。在别的一些共产主义经济单位里这一过程结束得

① 这里和以后，布拉戈耶夫所用的术语是不确切的、简单化的。商品生产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的特点，并且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还保存着。——俄文版编者注

比較迟。此外,在进行这一过程的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公社里,創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剩余产品。这正是在各个公社之間开展交换的原因。

产品交换在初期是偶然的、不经常的現象。但是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劳动分工越是深入,也就是劳动生产率越是提高,产品的数量也就越加增长。因此交换产品就日益成为常事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划分出来的各个行业逐渐发展成为各种专门为了交换、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生产产品的经济企业。

但是为了交换的生产逐渐地越来越使各个经济企业独立起来,终于使得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地分化为各个独立的、彼此分开的经济单位。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解体了,让位給新的社会组织。个体经济已经建立在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这里,产品从使用价值、从供全社会消费的产品轉化为交换价值,即商品。

換句話說,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商品的生产方式,或称商品生产(为商品而生产)的方式。社会的经济基础起了变化。

在商品生产时期,社会不再是闭关自守的经济单位。它分为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企业,其中每一家都独立地进行生产,并且根据私有制占有劳动工具。商品生产越是发展,供个人消费的生产就越来越变得无足轻重。每一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都不是供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出售,然后再买进各种必需品。这样,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就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在工作,而别人则为了他而工作。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要求从别的商品生产者那里取得像他所給他們那么多的劳动量。这就是說,任何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称商品交换之間的比例关系(比率),或称商品的购买力都取决于生产这些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是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产品的价值并不决定于个别商品生产者的特殊情况,而是决定于社会所处的一般条件。

起初小商品生产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工作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自己会注意制作出的商品质量要好，发挥自己的个人才能，改善劳动工具。因此，起初小生产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何况当时的市场是有限度的，很小的（一城、一区）。但是市场越是扩大，交换即商业就越来越发达（同时社会各部分之间的交通联络工具也发达起来），小生产就越来越不能满足增长不已的市场和增长不已的商业的需要。同时，随着新的交通途径的发现，原料数量也增加了，小生产已经不能很快地对这些数量的原料进行加工。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劳动工具的数量没有多大意义，就是劳动工具的质量也起不了像商品生产者的个人才能——他的技能、娴熟程度等等——那样大的作用。工具的改进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个人才能，而一旦这个商品生产者死去，他的个人才能也就没有了。而因为个人才能受到生产方式本身的限制，它们不可能是无所不包的，因而就不足以满足发展着的交换的需要。

首先，在商品生产的这一阶段，在商品生产者和市场（或消费者）之间插进来了一种特殊的中間人，以满足交换的需要。这就是商人。但是他只有当从商品生产者那里买进了商品后能加上利润卖给消费者（顾客）的时候，才肯做这个中間人。市场越是扩大，商人越显得有必要，而他们就愈加利用这一地位来剥削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来替自己积累商品和普遍的商品——货币。

另一方面，商业越是扩大，小生产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就越小，小所有主在经济上就越来越拮据。这就出现了高利貸者，他们利用小所有主经济拮据的情形进行剥削，并通过高利貸来为自己积累商品和货币。

商业和高利貸使商品和货币的所有主——商人和高利貸者有可能利用积累起来的商品和货币取得利润。因此，用以图取利润的货币或商品就称为資本，而占有这些财物的人就称为資本家。供

市場即供商业需要的商品必需大批进行生产，而只有用别种新的生产方式才能滿足这种需要。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就是大生产。大生产从一开始就是指資本主义生产，因为大生产只有那些掌握了組織这种生产所必需的手段的人即資本家才能够組織起来。

大生产成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旧制度的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础。小生产在同大生产的竞争中毁灭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变为无产者，即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工人。同时，在农村里大地主夺取了土地，用种种强迫手段把农民赶走，于是他們就跑到城市。独立的小生产者的这种破产和轉变为无产者的过程，也为大生产創造了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工人，他們不占有生产資料。后者（生产資料）集中在大企业、大作坊和工厂等等里面，成为大企业的业主的私产。这样就出現了两个新兴的階級——資本家階級和无产階級。前者是生产資料的所有者，因而是经济上强有力的階級，它使社会制度适应自己的利益和意願，是統治的階級。但是当在大生产中使用了机器以后（这时它就变成了資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这个过程就使得旧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終地消灭一切旧生产方式成为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个文明国家里占据了統治地位，并且把供个人消費的生产最終地排斥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社会完全受这种生产方式的規律所支配；在出現商品生产、生产資料私有制时的同时产生了国家，它成为了受資本家階級所掌握并且由它們的政党进行治理的社会組織。

但是資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已经走上了該用別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的途程。資本主义生产具有日益扩大的特性，而且这种扩大大大地超过市場的扩大。依靠不断改进的机器，劳动生产率达到了这样的規模，以致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长的障碍。大生产不断扩大，有增无已，一直增长到巨大的規

模，这使得商品充斥市场，而经过一定的、周期地重复的时间以后，就发生了生产的中断现象，给全社会的生活带来混乱，并且有颇大一部分工人被解雇。这就是工商业危机，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对社会越来越具有毁灭性。这种危机会使中小商品生产者以及大量资本家大批破产，只有某些条件极为优越的资本家在外。

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苦难和它的后果是工人阶级承担的。工人阶级人数越来越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为生产所完全吸收。在生产之外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军，即所谓劳动后备军，他们时刻准备参加生产，工资不妨少些，工时不妨长些。这样，资本家就把工资减少和工时增加。工人阶级的处境日益恶化。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全社会、特别是为工人阶级造成的这种处境的出路在于：消灭它的主要原因——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把私有制变为公有制。

经济发展本身为这一根本的社会变革、为社会革命创造了条件。它一方面使生产资料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集中在一小撮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手中；建立了某些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制，这些资本家只是图取利润，生产上却用不着他们。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还建立了国家垄断制：国家日益成为巨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例如铁路、邮电、采矿之类，都变为国营企业，变为国家垄断组织。但是无论是这一种或那一种垄断制都加深了社会的困难处境，使社会更加摇摇欲坠。不满情绪不只遍及工人生产者，而且笼罩着广大的消费者群众。同时垄断制十分明显地表明资本家阶级对生产毫无用处，表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和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以供全社会享用的不可避免性。

这也将是新的社会制度的新基础。

工人階級即无产階級最关心这一变革，因为这个階級从資本主义的严重后果上所受的苦难比其他任何階級都多。只有它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它必須形成一个社会階級，并且为反对統治階級、爭取掌握政权（政权必須从資本家手中去夺取）而展开斗争。現在无产階級正在成为这样的階級，成为解放者的階級，因而也就是現代社会中唯一革命的階級^①。它現在竭力要求掌握政权，要求創造各种条件来帮助它把政权夺取过来，因为政权是这样一种手段，可以用它来使建立在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占有生产資料的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组织代替旧的社会组织。

馬克思主义对所謂进步，或者換句話說就是对社会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这一看法是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同时它又是无产階級运动在科学上或理論上的表现，因为它科学地解释了出現无产階級的原因、它在資本主义（資产階級）社会中的地位、它在生产中的作用、它的历史任务和它应当完成的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因此，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工人的或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和解放的或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之中包含工人階級的哲学。而无产階級越是深入地領会社会主义，它就越是能够成为一个社会階級，成为解放者的階級，因而也就成为有能力完成社会革命（经济发展現在和将来都在为革命准备条件）、有能力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革命階級。

^① 作为紧密派人，布拉戈耶夫錯誤地认为农民只有当他們被剝夺了一切生产資料而轉变为农村无产階級的时候才可能是革命的。当时布拉戈耶夫还没有接受这一作为无产階級专政的本质的思想，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階級要同农民結成联盟。——俄文版編者注

第二章 进步或者社会发展是怎样发生的？

一定的社会制度，即社会的政治、法律(法权)、宗教和教育组织，并不是自动建立起来，而是由人们来建立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解体以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就分化为阶级，分化为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此，每一个经济基础或每一个新的生产方式都产生新的阶级，这个阶级是新的社会制度的体现者和代表者。

例如，在古代社会(古希腊和罗马)就出现地主阶级(希腊的贵族[эвпатрид]，罗马的贵族[патриция])和农民及手工业者阶级(希腊的农民[геомория]和工匠[демиург]、罗马的平民[плебей])。由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并且已经成为私有财产，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集中在大地主的手里；小农阶级日益失去这些生产资料，而这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逐渐转变为奴隶，奴隶阶级人数增多了。但是随着古代社会中的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内部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在奴隶劳动基础上进行生产的新的富裕手工业者阶级和富裕的商人阶级。换句话说，出现了城市中等手工业—商人阶级，即未来的资产阶级的前身。

起初，地主阶级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统治阶级。它使社会政治制度适应自己的利益。政治和社会的权力集中在元老院手里。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日益失去生产资料，并且依附于地主阶级。在他们中间开始了一场殊死斗争。凡是在手工业者阶级中还没有分离出中等手工业—商人阶级的地方，斗争的结局就是地主阶级建立起完全的统治。但在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兴盛繁荣并且形成了比较富有的手工业—商人阶级的地方，这一新兴阶级就成为农民对地主的斗争的领导。

阶级斗争构成了一部古代社会史，即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

換言之，在古代社会里所发生的一切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一切变动，一切思想上、哲学上、文学上的斗争，莫不决定于阶级斗争。^①

或者也可以說，阶级斗争是古代社会里社会发展、历史运动的动力。除去唯一的一个七十年左右的时期，这时手工业—商人阶级在古希腊曾占据统治地位，此外古代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结局都是地主阶级取得胜利。不过这个阶级斗争最后是以消灭奴隶制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变成农奴而告结束的。奴隶制的消灭使得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城市手工业转变为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的手工业。地主阶级在罗马帝国复灭之后(这时就开始了中世纪时期)在封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罗马帝国被分成为一些单独的区、省，其中每一个地区都由一个地主所占有，而所有的地主则在彼此之间订立卫护本阶级共同利益的一定的相互誓约，以此联结在一起。

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必须为地主阶级、封建阶级劳动，向他们无偿地呈献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履行安卡里亚^②。

封建阶级严厉地压迫它所统治的阶级，特别是农奴。因此，在古代社会就已开始的阶级斗争自然就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继续进行下去。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农奴制下的农民时常起义反抗封建主。两个阶级之间的这种斗争为手工业—商人阶级利用来反对封建主和争取自己摆脱安卡里亚和争取自治。这样，城市就成为独立的中心，农民流入城市，补充了城市居民，因而也就促进了城市市场的扩大。

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并促进了从行会手工业生产向工場式手工业生产即大生产的转变。一个新阶级兴起了，这就是资产阶级

① 布拉戈耶夫錯誤地把古代社会的地主和手工业—商人阶级这两者当作独立的社会阶级。从以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仅仅是统一的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经济和政治集团。古代社会基本的阶级斗争并不是统治阶级里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俄文版編者注

② 安卡里亚(Ангария, 保加利亚語)——一种无偿劳动。——俄文版編者注

級——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有时单独地，有时同国王、同专制政权联合在一起反对封建阶级，争取自己的解放和统治。可见，在中世纪，进步、历史运动的动力也仍旧是阶级斗争。起初，由于阶级斗争，城市才从封建政权下解放出来并成为独立的中心；由于阶级斗争，城市市场才有了扩大，大生产才得以增长。

但是资产阶级的真正兴起是随着美洲以及围绕非洲航道的发现而开始的。西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辟、移民（即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同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扩大——所有这些都空前地促进了商业、航海业、工业，提前了工业生产中因使用蒸汽和机器而引起的革命，使得资产阶级成为最强大的阶级，而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所有阶级都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最后，在近代史时期，有的地方早有的地方迟，资产阶级都通过阶级斗争掌握了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国家政权变成仅仅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了。现代的君主立宪政权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典型表现。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近代史时期，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仍旧是阶级斗争。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到了现代史时期，历史的动力也是阶级斗争。

总之，除了原始社会之外，人类社会的所有历史都无非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决定历史运动；阶级斗争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通过阶级斗争而产生进步。

同其他在历史上进行过斗争的阶级比较起来，资产阶级起过极其革命的作用。它把整个人类社会根据自己的形象加以改造。它借助大工业生产消灭了生产资料、不动产和居民的互不协调和零星分散现象。它把生产资料集中在一起，把所有制加以归并。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是由此所引起的结果，它建立了以政治集中化为基础的自己的政治秩序。在中世纪，生产资料的分散现象（在小生产

的情形下)是同封建秩序在政治上的分散現象,即政治分权現象相適應的;各省獨立,有時彼此之間用條約聯結在一起,每一省有自己的各不相同的利益、法規、管理機構和稅則。資產階級用自己的集中化的政治秩序來代替這種中世紀的政治秩序:它把各個單獨的、各自為政的省份聯合為具有統一的政府、共同的法律、共同的民族的階級利益、統一的關稅政策的統一的民族。

凡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大生產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權的地方,資產階級到處破壞一切舊的宗法關係、人與人之間的一切舊關係,消滅一切過時的觀念、觀點、感情並用自己的東西來代替它們。

在中世紀,封建政權的神權觀念在自己的領地里,小資產者或行會師傅的神權觀念在家庭和作坊里,都占有統治地位。因此,在中世紀,為了神和聖者而保護弱者、特別是婦女的虔誠的幻想、俠義的熱忱十分盛行,對婦女的美的崇拜(人們把美當作神意的體現)也十分盛行。從獨立的師傅中出身的小資產者都浸透了感傷情緒,像封建騎士一樣具有相當的個人尊嚴。這樣,封建主對農奴群眾的剝削、行會師傅對幫工和徒工的剝削,就都為宗教和政治的幻想所掩蓋。

在中世紀,人們認為醫師、法學家、牧師、詩人、學者都是有天賦才能的人、超人,因而極其崇敬他們。人們認為婚姻是一件神秘的事情,而家庭關係中流行着一種特有的感傷情緒。中世紀的教育、教義、科學都只是研究和解釋各種各樣宗教教條(法規)和問題,進行枯燥的煩瑣哲學的爭論。中世紀的這一思想狀況完全符合中世紀的商品生產方式。各方面的局限性和停滯現象都同中世紀經濟基礎的局限性相適應。

資產階級把這一中世紀的大廈毀壞殆盡。它用理性或人的“天然權利”的權威來代替神權威或者“神的權利”;它用赤裸裸的現

金来代替虔诚的幻想、侠义的热情和行会的(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绪;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为几毛小钱,它用资产阶级所有权、“劳动自由”权、贸易自由权、竞争自由权来代替从封建阶级那里夺取来的各种权利和自由;资产阶级剥除了感伤的行会式的家庭关系所披的中世纪的外衣,并把婚姻作为买卖的对象,因而把这种关系变为金钱关系,这就导致了资产阶级中的共妻现象和卖淫事件。整个来说,资产阶级改造了一切旧关系、旧设施、旧观点、旧概念、旧思想和旧感情。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一定历史时代的经济基础上都建立有相应的上层建筑,政治的、法律的(法权的)、精神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的总和就构成一定时代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的秩序、制度。换言之,社会的秩序或制度、它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或思想生活,都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或经济组织,而经济基础或经济组织又取决于生产方式。

第二。新的经济基础的条件是在旧的社会组织内部、在其核心中发展起来的。例如,美洲和围绕非洲的航道的发现,增加了从美洲运往欧洲的原料数量,增加了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扩大了商业范围。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旧的中世纪社会组织就已经成为工业的阻碍了。在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新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已经不能再向前发展了。因此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政治和法律的关系或财产关系就同发展发生了矛盾。只有解决这一矛盾,社会的继续发展才有可能。于是矛盾就通过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趋于解决。现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也正发生这样的情形。

我们从第一章中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具有自我扩大的特性,一直扩大到大为超过市场需要。它使生产力、生产资料和交通

工具发展到空前的巨大规模。资产阶级席卷整个世界，渗透到世界上最僻远的角落，并且到处散布和强迫人们接受自己的文化，即自己的关系、利益、法律、观点、思想。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制造了妨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矛盾。一方面，超额生产、市场上商品过剩导致工业危机，这不只使生产停顿和使全社会动荡不安、备受痛苦，而且还消灭了现有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已经是集体的、社会化的，资本是因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起作用的。但是资本(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是个别资本家个人的私产，这一社会生产的成果又为并不参加生产的资本家攫为己有，而现在正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大多数人却一贫如洗。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和财产关系(或法律关系)已经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些关系同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同在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完全相矛盾。

只有通过消灭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才能解决这个矛盾。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早在无产阶级刚产生时起，它就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了。起初这一斗争是分散地、孤立地进行的，只反对统治阶级的个别代表人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随着资产阶级的渗透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很快就变为整个阶级的斗争；它从部分的、孤立的、单独的、目的只在于反对个别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转变为目的在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这种统治也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它是由阶级的政治组织所进行的，目前是由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由共产党(十九世纪的名称)、国际、国际社会党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所进行的。

总之，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为用新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来代替自己创造了条件，产生了作为自己的掘墓人和新生产方式即公有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地促使人类社会走向社会革命、走向新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组织。

但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断变化的原因又在哪里呢？是什么力量使得社会的经济组织（它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发生变化呢？

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会补充和更深入地阐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即社会发展观，揭示它的本质及其动因或动力。

第三章 社会经济基础变化的原因

在第一章已经说过，社会的经济基础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变。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是指劳动以及一切足以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东西：劳动工具（操作时用的器具、机器）、材料（劳动的对象）、交通工具等等。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或程度决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当劳动生产率增长到经济基础（劳动生产率就是在它的范围里发展起来的）已经无法容纳而成为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时候，经济基础就解体了，让位给另一种经济基础。

例如，一当劳动生产率增长到开始有剩余产品可以积累的时候，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扩大了。这就发生了剩余产品的交换和确立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当劳动生产率还没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的时候，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继续存在。但是正是在这一基础的范围内它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弓箭的发明、狩猎劳动的提高了的生产率；石制劳动工具（石锤、石镰、石斧）的生

产；編织业(用树皮編织衣服和日用品)和与此相关的陶器艺术的出現；造船(木排)以及因此引起的交通工具的发展；用木头和粘土盖造农舍和住房——所有这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在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范围内发生的。也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继续发展到出現了农业和畜牧业，这两者都是同炼铁的发明相关的。这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就发展到了出現最初的社会分工(生产划分为各部門或各种单独的手工业)的程度。生产分为两大社会部門：农业和畜牧业，与这两个部門相关并且在这两个部門之中(特別在农业中)还有一个部門——手工业、工业——在继续发展着。这种社会分工就造成了剩余产品并出現了剩余产品的交換。另一方面，社会分工更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又使得剩余产品有了进一步的积累和使剩余产品的交換有所增加。这样，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終于解体而为有商品生产的社会所代替。

起初，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給生产力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量。

在古代社会，即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劳动工具的发展和材料加工工艺即手工业起初都达到較高的繁盛程度。交通工具、航海业也有所发展，交換、商业有所扩大。商品生产得到了巩固。但是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土地趋于集中和小农破产，另一方面又使城市中已经发展起来并脱离了农业的手工业相当地集中起来，并且由于竞争而使得力量薄弱的手工业者破产。古代社会的商品生产者的破产导致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組織生产。

虽說在古代社会，即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生产就已经集中在把生产力集合在一起的大经济和手工业作坊里，但是它的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生产組織却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引起了希腊、然后是罗马的复灭，使得社会的经济基础起了变化。

在罗马(它征服了希腊)，地主阶级占統治地位。它用連年不

断的战争把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极大的程度。但是连年战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不可能发展，手工业者破产而沦为无产者，而这些无产者又找不到卖力气的地方，因此就转变为流氓无产者。由于同一个原因，城市中的奴隶得到了解放，因而也扩大了无产者的队伍。古代意大利(罗马)土地集中在大的领地——大地产中。然而正因为这个缘故，大地产所赖以为基础的奴隶劳动对大地主来说已经完全无利可图，它不能提供为地主们的放荡的生活所必需的收入。因此一部分地主把大地产变为喂牲口的牧场和草地，于是许许多多奴隶就成为多余的了；还有一些地主则把大地产分成小块，租给已经解放的奴隶和自己的奴隶。这样，还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农业中的奴隶制就沒落了。

起初得到解放的奴隶(在农业中)是自由民和半自由民——佃农。但是到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他们被迫依附于土地；他们必须为地主无偿地耕种土地，不经地主的许可不得离开土地。可見到古代社会衰落的时候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正在趋于解体而为农奴制的经济基础所代替。中世纪社会产生了。

在中世纪，手工业的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手工业是建立在商品生产者自由劳动基础之上并在城市里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劳动工具完善了，产生了按手工业种类的不同而划分的技术分工，出现了新的手工业和新的手工艺。但是手工业生产是小商品生产。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交换、商业都扩大了。同时，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加剧了，某些商品生产者因竞争而兴起，另一些商品生产者则因而破产。因此，手工业者阶级为了缩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在生产中建立了行会组织。爱斯纳夫^①(或行会)会议和条规确定每一个师傅可以生产什么样

^① Эснаф, 奥斯曼帝国的作坊和手工业工人的名称。——译者注

的商品，生产多少，他可以根据什么价格出售，应当付给帮工和徒工多少工资，一个师傅能够雇多少个帮工和徒工，等等。手工业生产这种行会制度起初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以后它就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就好像农民群众的农奴依附地位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一样。

但是无论小手工业生产怎样保卫自己，它也不能使生产力的发展停止下来。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道的发现提供了新的市场，扩大了交通，给生产提供了新的原料，增加了贸易；所有这一切在中世纪农奴一行会制的经济基础范围里是无法再向前发展的。这一经济基础就遭到了破坏并为大工场手工业生产所代替。实行了新的社会分工，大生产从手工业中划分出去，它把大量劳动力联合在一起，把劳动工具集中在一个地方，于是大生产就能够发展了。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消灭了行会组织和农奴制。大生产越是取得进展，它就越破坏行会组织和农民的农奴状况。于是就产生了自由的工人即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他们的劳动力也像劳动工具一样被集中在工厂即大生产之中。

小生产中的劳动力和工具分散现象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协作和合作。这有力地重新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手工工场内部，在工厂里，都实行了技术分工（一个工人加工商品的一个部件），这也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劳动生产率这样增长的情况下，小手工业生产显然不可能顶住大生产的竞争而告消灭。它的行会组织也同告灭亡，而小商品生产则随着中世纪社会经济基础的被破坏而告消亡。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基础取而代之。

不过，旧的经济基础是在这时才被彻底排斥掉的，生产中使用了蒸汽和机器——由于大商品生产和与其相联系的商业、航海业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生产力。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让位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现在所达到的巨大的发展程度，比人类在所有各个时代所达到的加在一起还要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遍及全世界的交通联络工具(铁路、电报、电话、报刊之类)，新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生产中运用了新的自然力：电力、蒸汽发动机和电动机。冶金业使巨大的蒸汽机器和电动机、大桥有可能建立起来。技术和化学用到生产中来了。商业成为世界性的，因而商品生产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总之，社会的生产力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规模，以致已非社会所能容纳，无法再向前发展，因此就日益频繁地起来反对经济基础。

日益频繁地发生的工商业危机正是要想越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范围的生产力的反抗表现。用新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为它创造了条件）即社会主义基础来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时候来临了。现代社会中的这个革命将如何完成和由谁来完成，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看到了。

总之，从在这一章的所有论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的经济基础改变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它们在旧的经济制度范围内已经不能再向前进展，它们就创造出新的经济制度。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或程度决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假如生产力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就改变，继之上层建筑——政治的、法权的(或财产的)、宗教的、教育的或意识形态的、哲学的、思想的等等——也会跟着改变。但是从这三章的论述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这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组织，或者换个说法，经济结构，是指人在生产过程中不依自己的意志而产生的联系或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也称为生产关系。人从脱离野蛮状态的初级阶段起，就始终生活在同类人的社会之中，就是说始终处在为生产生活

資料所必需的一定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它們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不因人的意志而是由于必要才产生的——人意识不到这种发展的意义及其后果。例如，人們在原始社会中为了共同防卫和寻找生活資料而結合在一起。这促使人們作出种种发现和发明，給社会生活带来許多出乎意外的和并未預計到的变化，后来这就造成了这样的結果，产生了生产資料私有制，原始社会的经济結構瓦解了，同时整个共产主义大厦也都毀灭了，而为階級社会所代替，这个社会具有自己的階級关系、主奴关系以及剝削者与被剝削者的关系。这种情况我們在古代社会、中世紀社会及现代社会里都能見到。

但是，既然生产关系(它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結構)的建立是不通过意志、人的意识的，那末人的意识或思維也就无疑是决定于生产关系或其总和，或者說是社会的经济結構及其上层建筑的了。然而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說到。我們在这里只指出下面这一点。在这三章里叙述的一切东西加在一起，就称之为对于进步，或者社会发展，或者簡而言之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釋或唯物主义的理解。这也就是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于进步或者历史的理解。剩下来要考察的是这个学說的方法。这将在下一章中进行，按照书目的第二部分，我們將从这一章起开始研究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第四章 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认识論和辯证方法

(关于书目的第二部分)

除了自然界和人，世上就絕无所有。然而自然界、因而也包括人，都不外是物质。人是仅仅由几种物质(骨骼、肌肉、神经)組成的，不过是高度組織的物质。由于这原因，人不只能够从外界感受印象，而且还能意识、思想。

人的概念或者人的思想无非是外界事物或現象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它們是反映在人腦里的物体的思想的形象。如果一个人的头脑里沒有某一物体的痕迹、印象，他就不可能具有关于这一物体的概念或思想。由此可見，人不能意识到和想到未曾通过他的头脑、未曾反映在他的脑子里的东西。因而，思維决定于人从其中得到印象的外部世界。关于运动、运动的規律、运动在其中进行的时间和空間的概念或思想都是客观现实中事物的运动（它是在时间和空間中发生的）在人腦中的簡單反映。因此，运动的規律初看起来好像是人的理智所加于外部世界和自然界的，实际上却是反映在人的头脑里的外部世界的运动規律。

外部世界又称存在。因此，自然界和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的人，都是存在。所以也可以把上面所說的道理說成是，存在决定意识。

但是外部世界不仅是指自然界，而且还指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可以說是在自然界的继续。人刚一脱离动物状态、脱离野蛮状态，就始終生活在社会里，即处在各种联系、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之中。因此簡單說来，自然界、构成自然界的种种物体和現象，都是通过人类社会而出現在人的头脑里的。因此，我們說到存在的时候，主要是指社会存在。而我們在前面几章中已经知道，社会存在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結構，或者換句話說，决定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可見，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結構都有这个社会的成員的相应的意识、相应的思維与之相适合。換言之，社会存在（或簡称存在）决定意识。

这里的意识是指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人的头脑中作为存在的思想形象的概念、观点、思想和感觉的总和。在社会的一定时期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和一般哲学观点以及思想的总和，构成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基础

上产生的感觉、願望、意向、情緒构成社会的心理状态或社会心理。总之，存在决定意识、决定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我們且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的特点是生产力不够发达，因而生产关系也不稳定，社会关系或联系很薄弱。各个氏族既很容易結合为部落和联盟，也很容易分裂和解体。

此外，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够发达还意味着对自然力、各种事物及其特性的认识不够，以及人的活动还不怎么能駕馭这些力量和事物。因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們的概念、观点、思想和感情是十分有限的。它們超不过人們每天直接接触到的事物和自然力的范围——动物界和植物界，而主要是动物界。这种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联系是由于掌握了畜牧业和农业这些部門（从狩猎直到繁殖动物和人工种植五谷和果实）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原始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都局限在同狩猎、畜牧和农业有关的事物的范围之内。

尽管原始共产主义中的人对自然界的事物和力量的认识极其有限，但是这些自然界的事物和力量毕竟还是反映在他們的意识里。人們对自然界及其力量的认识越是少，他們那时所得到的印象就越是强烈。人們的这些印象在梦中再度出現，而由于他們不能解释这种重現現象即梦，就把它解释为人身上存在着灵魂，灵魂在梦中和死后离开人体而漫游在空中或者轉入其他事物。由此可见，对原始时期的人說来，一切事物都是有灵魂的，他們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灵魂或者精灵。这是对自己本身和自然界的初步认识，是共产主义社会原始的意识形态，是宗教的萌芽。这种意识形态同生产力发展最初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正好相适应。在較高的发展阶段，这种原始的意识形态就起了变化，而出現了“最高精灵”的思想，它是万物的本原，人們規定了种种典仪和供献祭品

来崇敬它。

生产力越是发展,存在就越是多种多样,思维的内容就越加扩大或者意识形态的方面就越多。就在狩猎和农业方面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也产生了较为多样的意识形态。所有神话、故事、寓言都同动物界有关。氏族和部落都以同自己相类似、同自己的起源有关的鸟类和动物为名。原始社会最重要的艺术是舞蹈。但是这只不过是生产过程——采集根瘤和果实、播种和收割谷物、动物的斗争等等——的再现。

原始社会的歌唱是工作时身体的动作的再现,这些动作伴随着与动作相适应的声音。

上举事实证明原始社会的存在决定它的意识。但是等到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了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程度,旧的存在就起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崭新的社会存在,因而也产生了新的意识。例如,在这之前人还没有关于私有制和个别人对事物的个人私有权的概念;现在他们不只有了这种概念,而且还有了其他许多概念,因为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也产生了一些完全新的社会联系、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除了氏族联系和以劳动工具和共同劳动产品公有为基础的联系以外,人与人之间没有其他的联系。私有制出现之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复灭之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各种社会关系都通过商品、通过商品关系或者通过商品生产关系表现出来。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没有奴隶制,而现在奴隶制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母权制在共产主义社会被排除之后,无拘束的婚姻关系以及母权制的统治就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不自由的婚姻关系以及父权制即宗法制的统治地位。在父权制之下,家长——财产和家族的主人具有无限威权。那种认为自然界及其万物都有灵魂的宗教为信奉同家长相似的半神或神的宗教所代替。共产主义社会

的氏族組織为階級的政治組織(国家及其专有的机关、設施、法律、政权)所代替。总之,在共产主义社会为階級社会取代之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复灭之后,所有的概念、观点、思想、道德、宗教、感情都决定于代替旧的社会存在的新的社会存在。

在古代社会,存在是决定于階級斗争和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这一存在决定了古代社会的整个意识。古希腊最伟大的学者也不能想像沒有奴隶制的人类社会。古代社会的政治、法权、宗教、哲学等都完全决定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階級斗争。

中世紀社会的思想状况、社会心理是个什么样子,我們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这时的思想状况完全符合中世紀的存在、中世紀社会的经济結構。但是我們还看到,资产階級的经济結構以及它所創造的资产階級破坏了整个中世紀意识形态,并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去代替它。

但是,現在资本主义已经使生产力增长到资产階級社会所不能容納的程度,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階級的階級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决定現代社会的意识的社会存在現在已经建立起来了。現在无产階級的意识正在与资产階級的意识——资产階級的政治、法权、道德、哲学等等相抗衡。

总之,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不是意识决定存在。

这显然不是說意识对存在沒有什么作用。有时一定的意识出現之后会对存在发生作用。这里的哲学問題在于思維的发生、起源和发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因而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因它的方法而获得高度的科学价值。

这一方法就是辩证方法。

辩证方法同在资产阶级思维和资产阶级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方法相对立。形而上学方法孤立地和脱节地考察事物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即概念),把它们当作是始终如此、固定不变的。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一定时间和一定状态中的个别事物及其特性。但是这种研究绝对不能提供对事物和概念的充分的认识。

反之,辩证方法把事物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事物的精神形象或者概念在其相互联系、在普遍的相互作用、在运动、在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即在其发展中加以考察,认为它们是普遍发展的结果。根据辩证方法,任何自然现象或者社会事件都是长期的发展过程的结果。例如,现在的整个有机界,即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在内)都是延续了好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结果。现在的土地也是这样产生的。现代的社会状况、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也是延续了好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而只有把宇宙和人类社会看作发展过程,看作物体、现象及其思想形象的产生和消亡之间的普遍的相互作用,我们才可能构成关于它们、关于它们的发展、关于物体以及关于物体的思想形象、关于物体在人脑中的反映的确实概念。

我们且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我们如果脱离以前的发展过程而孤立地、不考虑同过去的联系地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地来考察古代社会,就不能理解古代社会及其奴隶制的组织是从哪里出现的,是怎样出现的。这时我们只能知道古代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在古代社会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而我们根本不能知道为什么这一社会的发展要这样开始,什么东西促进了这一发展等等。涉及中世纪社会和现代社会时情况亦复如此。孤立地分析这些社会,我们就不能准确地认识它们,因为我们在考察它们

的时候沒有顾及同过去的时期的相互联系、发展过程、它們的产生和消亡。如果不把历史現象看作发展过程的结果，那就也許只能用特殊的超自然和超人的原因、用神意和偶然性来解释历史現象。但是对現象的这种解释是不能提供对它們的确实认识的。

再举一个同我們較为接近的例子。我們如果离开俄国的政策和其他同俄国相竞争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来考察保加利亚的解放，也就是說形而上学地来考察保加利亚的解放，就必然会把解放的原因归諸于俄国沙皇的心地善良。但是这样来解释这一事件是完全錯誤的。反之，我們要是把保加利亚的解放同一心要想攫取察雷格勒^①和成为黑海海峡的霸主的俄国沙皇政策的政策联系起来，同反对俄国这一掠夺政策的其他欧洲列强的政策联系起来，就能够懂得保加利亚的解放无非是俄国同欧洲的互相矛盾的政策的结果。这就是說我們是辩证地解释这一历史事件的。

我們如果是辩证地来考察宇宙和人类社会，就会得出結論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是自然界的继续)具有自己的发展史，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变化、发展、发生同时也在消亡。例如，在原始社会内部产生出古代社会，在古代社会的范围里产生出中世紀社会，在中世紀社会里产生出资产階級社会，在资产階級社会内部产生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原始社会的成长中同时包含着它的瓦解，这就是說在它的深处产生了出現古代社会的条件。在古代社会里也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中世紀社会和资产階級社会亦复如此。中世紀社会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大生产，这是中世紀社会归于复灭和代之以资产階級社会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往往互易地位，原因成为结果或者相反。此外，在发展的过程中是没有什么自由意志的；在辩证发展中占統治地位

^① 察雷格勒是古代斯拉夫人对康士坦丁堡波里(伊斯坦布尔)的称呼。——俄文版編者注

的是必然性。^① 在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社会既是必然的，而社会主义社会之代替它也是必然的。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基础的辩证方法，其实质就是如此。因此这种唯物主义也就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可见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关于进步、关于认识的学说的哲学基础。

辩证方法是人们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史所积累的材料时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研究了这类材料，才发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发展过程，发现了辩证发展。因此，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现今唯一最科学的观点，是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的最可靠手段。

第二部分

第一章 通过实际运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关于书目的第三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在前几章中我们只是极其一般地考察了这一原理。现在我们想通过实际运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首先，我们想在概念、思想，总起来说即在意识形态（它看来好像离社会的物质生活最远）方面来这样做。显然，我们在这里将只谈社会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

在第四章里已经说过，概念或者思想是外界事物和现象的思

^① 布拉戈耶夫这里所依据的是机械决定论、宿命论的理论。意志自由是有的：它是客观必然性在主观上的反映，或是因深知事物而善作决断的能力。——俄文版编者注

想形象，在一定时期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思想或意识形态决定于社会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存在也在起变化。当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只有极其有限的概念或思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根本没有什么法权、政治、哲学和道德思想，而这些思想却是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的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没有法权思想，是因为没有正义思想，而所以没有正义思想，是因为没有它的反题——非正义，即指侵犯某种个人的物质权利。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手段。因此法权的思想不可能产生。这一思想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权思想只有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才有可能，即原始社会中的个别人对生产资料和产品进行私人占有。换句话说，法权思想是在出现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时候发生的。私有物的享有权就是所有者对私有物的支配权，而对私有物的侵犯就是违法，也就是非正义，即正义的对立面。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私有制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因而，法权思想（同时也包括正义思想）是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社会存在也起了变化的时候才出现的。

同法权思想相联系也产生了一系列其他思想，这些思想是人类社会从私有制一出现起直到现在为止的道德基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知盗窃为何物。共产主义社会的每个成员取用他感到需要和他能找到的东西，而不必征得谁的同意。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没有经过所有主的同意而动用其所有物的任何一部分都被认为是侵犯别人的权利，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其名称就叫盗窃，对盗窃的惩罚甚至比对杀人的惩罚更严厉。

共产主义社会同样也没有家庭法。当时盛行多偶制：妇女要

找多少个丈夫就能找多少个，男人也是要找多少个妻子就能找多少个。这种两性关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因而也是合乎道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使两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生产资料的主人只能由男子来充任。妇女失掉了过去的独立地位和平等权利。她们只是私有财产的继承者的生产工具，并且完全从属于生产资料的主人（一般说即男子）。由此可见，随着私有制关系的出现，亦即随着生产关系或社会存在的改变，两性关系也起了变化，出现了男子是一家之主的法权思想。

总之，决定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法权、以至政治和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在人的头脑中作为新的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产生的。这一新的社会存在代替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其原因在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之归私人占有。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别的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思想。我们不妨举奴隶制的思想为例。这个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时候，社会成员的生活资料是很有限的。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发展阶段，当部落之间互相发生冲突的时候（并且也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俘虏就被得胜的一方所杀害和吃掉。但是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较高发展阶段，当时已经出现了作为一切事物的创造主的“最高精灵”的思想，俘虏就被用来作为对这一精灵的祭品。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显然还很不发达，以致它不可能得到足够的供自己需用的生活资料。它显然更不可能去养活俘虏。因此人们就把俘虏杀掉和吃掉或者当作祭品。

但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驯服和家养动物以及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大量的和可靠的生活资料的来源。繁殖牲畜，伐除森林和使它变为牧场和田地，总之是生产力的增长——所有这些都需大量劳动，大量劳动力。正是在这一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同有史可查的社会划分开来的社会发展阶段，人吃人和把俘虏当作祭品的现象消失了，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把人杀掉，而用来作为替胜利者服役的生产资料。换言之，就是产生了奴隶制的思想。

起初，在共产主义社会乃至在有史可查的社会的初期，奴隶制的形式还比较温和。那时人们还把奴隶当作氏族或家庭中的一员，像对待有用的生产力那样对待他们，而氏族中的其他成员也都是有用的生产力。但是交换和商品生产日渐发展，因而所有制关系也就得到了加强，于是就使主奴之间的关系起了根本变化。在从前，奴隶劳动还是氏族或家庭的其他成员的劳动的补充，而在初期商品社会即古代社会里，奴隶劳动成为了这个社会生存和存在的基础。在这里，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比共产主义社会来得复杂的生产关系。为了调整和维持这种生产关系，就产生了一系列机构、一系列公职人员。换言之，出现了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新的社会秩序（主要是在政治上的秩序，即国家）的必要性。原先管理共产主义社会的是酋长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产主义会议，现在变成了元老院会议，它进行管理、采取决定、建立法律。虽然交换和商品生产在这个社会内外造成日益增多的矛盾和冲突，新的管理机构的职能还是在不断扩大。领导这种管理机构的，显然是所有主、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一阶级。这种情况使得这些人有可能把工作越来越推给奴隶去承担，并且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把全部生产整个儿的都靠奴隶劳动来进行组织。奴隶制思想在古代社会达到了充分的发展，它已经根深蒂固到这种地步，以致古代社会的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不能设想没有奴隶的人类社会。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奴隶制思想也是由于社会存在的变化而产生的，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存在的进一步改变，出现了新的思想。例如，古代社会有一种深刻信念，

认为沒有奴隶制社会就无法存在，到古代社会末期，与此相反，却产生了奴隶解放的思想和农奴制思想。

这种新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奴隶劳动起初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后来它却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能力越来越薄弱，而交换却在不断增长。生产的集中过程开始了，尤其是在农业方面，这表现在大的土地占有或大地产的形成上。这种集中过程也表明，奴隶劳动不仅沒有有什么生产能力，而且甚至是多余的。但是当奴隶劳动就这样对所有主显得无利可图的时候，換句話說，就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变化之后，就产生了解放奴隶的思想。那时奴隶主就开始把生产资料交給得到解放的奴隶以及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已经无产者化的公民使用，然而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供給奴隶主一切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大地产和工厂，就分化为各个小农经济和单个的手工业作坊，它們对主人們說来是半自由的，或者說同主人仅仅因为还負有相当的义务而发生联系。在羅馬帝国沒落后和在中世紀初期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了农奴制思想。

羅馬帝国被日耳曼人的野蛮部落所侵占，当时羅馬帝国的疆域中包括了那时几乎所有历史上的民族。日耳曼人处在共产主义社会与建立在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的新社会之間的阶段。羅馬帝国被他們侵占以后被分割为許多部分，分布在各部落諸侯及其氏族之間。在羅馬帝国的疆土上形成了許多单独的公国，这些公国由公爵为領袖，以下是通过种种义务和权利而与这些公爵有关系的軍事长官，再以下就是氏族卫队的首領。

日耳曼部落在被侵占的羅馬土地上发现了一定的現成的和在他們看来是新的财产关系。他們遇到的是半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人都依附于土地的新主人。这样，在被征服的羅馬帝国中

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在征服者之間以及在征服者和被征服的居民之間規定互相的联系、义务和权利的新秩序，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封建秩序。这里也就产生了农奴制思想。

羅馬帝国之被日耳曼部落所征服，引起了所有野蛮部落的大迁移。越来越多的新部落都奔向被侵占的羅馬的土地。但是在征服者本身之間，在封建主之間也开始了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对于城乡从事生产的和半独立的居民來說，尤其是对于乡村中的这类居民來說，这种情况給他們造成长年不断的离乱状态和产生許多危險。正因为如此，居民就不得不独自寻找封建主的保护。但是与享有这种保护的同时，居民便被淪为农奴，长期依附于封建主的政权之下，并且有义务供应封建主一切生活必需品。这样，农民就等于和被认为是封建主的财产的土地綁在一起，連結在一起，再也不能离开封建主，而且必須养活主人。手工业者同样必須供給封建主所需要的物品。在封建主这方面來說，他有义务保护他們和一般地保证他們的安全。作为在被侵占的羅馬帝国的土地上既定关系的反映，也产生了封建主的权利思想——不仅是土地权、而且是支配被征服的从事生产的居民的命运的权利。換句話說，既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产生了把生产者淪为农奴的思想。

农奴制思想，即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新的奴隶制的思想——它主要表述了中世紀史的特性——也是由中世紀初既定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在此之后的一种新思想，即“自由劳动”和“自由貿易”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从上面的論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結論：农奴制在起初曾經促使生产力向前发展，尽管速度是十分緩慢的。但是到了后来，农奴制就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大障碍。封建主和整个統治階級日益醉心于掠夺农民階級和城市階級。对劳动的剝削和压迫采取了越

来越严厉的形式。而在那些剝削提供不出奢侈生活所需的足够資財的地方，封建主就互相攻打，掠取財物。所有这些都使农民破产，并且妨碍城市貿易的发展。

中世紀形成的这一情况，一方面成为了許許多多农民反封建主起义的原因（这些起义被用非常严厉的手段鎮压下去了），并且使淪为农奴的农村居民的处境更加艰难。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农民不断流入城市的原因，于是城市居民就增多了，同时也产生了增加交換的必要，而交換的增加又使得手工业大为兴盛起来。城市变得更强大了，并且开始力求摆脱封建主的权力，其办法有时是向他們贖买各种权利，有时是通过武器。

城市用这样的办法取得了权利和独立之后，就成了中世紀时期发展生产力和整个生活的中心。小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方式在这里达到最高度的发展。但是城市中生产力的这种比較高度的发展以及市場的局限性在各个单独的手工业者之間引起了强大的竞争。为了限制这种竞争，就出现了爱斯納夫思想，或者所謂生产的行会組織的思想，这种組織的目的在于用种种阻止生产扩大的障碍来限制竞争。当商业还在城区和在城郊的范围里进行的时候，行会組織所造成的对生产的拘束作用还不那么强烈地为人所感觉到。但是，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道发现以后，就使商业扩大起来了。行会秩序不仅不能滿足新的市場的需要，而且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行会和古老的城市之外产生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手工工場方式，这种方式按其性质說是資本主义的。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必要发展条件是必須有解除了任何束縛的工人。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地位以及手工业工人之为行会秩序所束縛，这两方面都使新生产方式需要的自由的工人不可能出现。爱斯納夫或行会秩序設立重重障碍，限制交換和商业，这也妨碍了手工工場生产的产品交換，因而也就阻遏了手工工場生产的发展。必須使劳动和交

換擺脫農奴制。“勞動自由”和“貿易自由”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不僅產生在意識中，而且成為資產階級的革命口號。資產階級在這一思想中加入廣泛的內容。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①，人人自由，取消任何阻礙，打倒奴隸制，自由、平等和博愛萬歲！——資產階級在“勞動自由”、“貿易自由”的思想中加進去的就是這樣廣泛的革命內容。

上面的論述說明，就是“勞動自由”、“貿易自由”這樣的新思想也是由新的社會存在——代替中世紀的存在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所產生的。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一種在目前對整個社會生活發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的思想，這就是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怎樣產生的呢？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新的和迅速的發展。現在生產力達到了這樣巨大的規模，以致已經不能容納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里。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資本主義把生產資料都集中在一個階級即人數越來越少的資本家階級手中，因而就使人民群眾都無產階級化，使他們失卻了生產資料。資本家把已經無產階級化的群眾吸收到生產中來，迫使他們為了微不足道的工資生產巨額財富。這樣從這些人中間就產生出了工人，即無產階級。沒有這個階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可能存在，因而資本家階級也就不可能存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國家也都不可能存在。資本家用剝削的辦法，用掠奪工人階級的辦法，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大量財富，他們占有這些財富，吞食、浪費這些財富。而被剝削、被掠奪的群眾即無產階級——大量財富和現代生產資料的生產者——的處境却日益艱難，他們

^①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法文)，——經營自由，貿易自由（不受國家的約束）。——俄文版編者注

生活在痛苦和奴役之中，忍受着重重灾难、貧困和屈辱。換句話說，資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特殊的社会存在。

工人階級始終用抗議、斗争来对付这些社会关系的后果。早在这些社会关系刚产生的时候，工人階級就开始起来反对他們的处境。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工人階級的斗争就越是尖銳。但是这种斗争长时期来是分散的，并且在进行斗争时沒有认识到剝削和压迫的真正原因，这一点是主要的。但是資本主义社会关系越是向前发展，在这些关系下产生和存在的各階級的斗争就越是尖銳化，人們就越是能够意识到：工人階級的困苦处境的真实原因在于社会关系本身，工人階級应当努力消灭資本主义关系，并且代之以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沒有主人和被压迫者的新关系，即建立在生产資料的社会占有基础上的关系。換言之，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就产生了。

所以，我們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由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而这种社会存在是由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产階級社会内部創造出来的。

总之，从以上的論述中可以得出一条結論：某一时代占統治地位的和对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发生影响的思想，是由社会存在、这个时代的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但是，我們已经看到，生产关系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階級关系、階級斗争的关系。無論是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階級关系的发展过程，还是生产关系之在人的意识中产生相应的思想的过程，显然都是辯证地发生的統一过程。社会关系和思想不断地产生同时又不断地消失，为新的关系和思想所取代。

我們仅仅論述了在社会历史生活中起过作用和現在还在起作用的几种思想。但是所有这些論述也都适用于一切別的起着同样作用的思想生活領域。現在我們再来討論几种思想，这几种思想

的发生看起来好像仅仅依赖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依赖于社会存在。

我们姑以宗教思想为例。宗教思想的基础是认为万物都有灵魂这种信仰，后来它又改变为“最高精灵”的思想，把“最高精灵”看成是万物的创造主。这种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认为事物有灵魂的信仰以及“最高精灵”的思想首先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盛行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社会的初级发展阶段生产力是发展得非常慢的，这说明人们对自然力量以及自然现象和事物的特性的认识还十分差。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这种状态下，任何自然现象、事物的任何具体特性对人发生了强烈的印象，以致这些现象和特性又会在人们的梦中重新出现，而对梦的原因，当时也只能解释为在人的本身和在一切事物和现象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本质——灵魂。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逐渐向前发展。于是人就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现象和事物的特性，并且看到在这些现象和特性中并没有什么灵魂和精神的本原。必须注意这一个情况，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消费是共有共享的。正因为这缘故，在共产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成员的平等和博爱的精神。因而就产生了“最高精灵”的思想，这是这一社会状态在思想上的表现。它是万物的创造主。它为全体人类创造万物。谁也没有权利利用它所创造的东西来谋一己的私利。换句话说，“最高精灵”就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存在的平等和博爱精神。

人类社会的最初的宗教思想便是这样的。它显然由原始人类的社会存在所产生，为这种存在所决定，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一存在在人的意识中的思想形象或观念上的反映。^①

^① 这说法不确切。现代历史科学证明，一神教的思想产生在比较晚的社会发展阶段，即产生在奴隶制的时候。——俄文版编者注

但是后来在人类社会又产生了拟人的多神教。这种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共产主义社会为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父权制或宗法制的

基础上的社会所代替。

一个民族的领袖或一家之长就是财产的主人，他有权支配财产。对氏族和家庭的成员来说，他是主人。他是家长。他是“最高精灵”。因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还不够发达的时候，每一个氏族或者家庭都有自己的与家长十分相像的“最高精灵”。这就是在古代社会中盛行的拟人的多神教，但是与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起来的同时，这种宗教就改变了形状。

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结果就是建立了新的社会组织。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当时出现了事务纷繁、职能和机构很多的管理机关。换言之即出现了国家。与出现国家的同时，多神教就受到了限制，出现了人人都信奉的整个国家的神，以此来代替氏族和家庭的神。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下面这个结论：新的宗教思想是由代替了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新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社会存在的改变导致新的宗教思想。

在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的没落时期，对旧有的神的信仰彻底消失了，也就是说多神教为无信仰或新的宗教思想所代替，即为超自然力、神力或按照自己意志统治世界的神的思想所代替。这种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用若干个同人相似的神和半神来限制拟人的多神教，这些神和半神都是整个国家所共同信仰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更加限制了多神教。商品生产的发展和更不平等现象的加深使得社会更加明显地划分为各个具有对立的利益的阶级：富人和穷人，主人和被奴役者，

奴隶和奴隶主。由于这些社会关系的确定和巩固，就出现了神权，即駕临于这些关系之上的最高权威。国家就是这种最高权力、这种权威。而且，这种最高权力即国家必定是富人、統治階級的最高权力。这整个发展过程，从一方面看，是与人无关的，即它不受人的意识所支配，因而人們在当时不能解释这种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看，商品生产和交換又服从于一定的規律性、一定的共同規律，而这些規律又不能不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但是当时还不能对这些規律作出正确的解释。就好像这些关系的确定和巩固产生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思想一样，这整个发展过程也产生了最高权力、最高实体的思想，这一最高实体創造世界上的万物，統治世界上的万物，因而它也統治社会关系。所以凡是在我們看到有这种发展的地方，我們就能看到这样一种意图：限制多神，并且在最后确立一神教，即确立一种信奉一个具有与当时占統治地位的那些階級一样的特性的統一的神的宗教思想。这个神是无拘无束的統治者，是对不服从他的意志的人的残忍的报复者；他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尘世和天国的奴隶的奴隶主。換言之，他是尘世的統治者、尘世的主人和奴隶主、所有主和主人階級的形象和翻版，就是說他是不平等的神。

总之，我們在古代社会中遇到的那种統一的神的思想，是由商品生产和交換的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这一所謂旧約中的統一的神的思想当然也就进一步发生变化。新約中的神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就是大家知道的基督教。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这一变化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新的神的思想——基督教是怎样出現的。

在古代社会沒落的时候，我們已经明确地知道，生产資料都集中在为数极少的自由公民手中。其余絕大多数公民淪为无产階級。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大量集中使得奴隶制变为无利可图的多余的事情。奴隶制就垮台了，因而在古代社会的没落时期，在罗马帝国的没落时期，大量公民都处于平等的、同样的生活条件之中，处于无产阶级和彻底破产的生产者的普遍平等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之下，毫无疑问，无论在一小撮生产资料所有者之中，还是在无产阶级化的人民群众之中，对原有的神的信仰都已消失了。旧约中的神的思想既不适合前者又不适合后者的情况。但是主要的还在于它不适合后者的情况。旧约中的神是不平等的思想形象，是统治阶级、奴隶主的神。而在罗马帝国没落时期，人民都处在平等状态，甚至是博爱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是因这个共和国的被征服而形成的。

人民的这种状态只有在新的神的思想中才能表现出来，这种思想符合已经形成的平等和博爱关系，并且本身已包含这些因素。这种思想实际上也就出现了。这就是新约中的神的思想；这就是基督教的神的思想。这个神同旧约中的神根本不同。他是仁慈的，人人在他面前一律平等，不论属于哪一族。尤其是穷人、无产阶级对这种神更为接近，“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而富人要进天国却像骆驼穿过针孔那么难。

由此可见，新的宗教思想，即新约中的神的思想，也是在古代社会没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在思想上的反映；它的产生决定于社会存在。

但是后来中世纪的社会存在代替了古代社会的存在，这使得基督教的神被关于这种神的一种完全新的思想所代替。他已经不是统一的神，而表现为三个彼此密切联系和依赖的神的形象。^①一整群其余的神或者精灵都从属于他们并受他们控制。这样，神的

^① 这说法不确切。神三位一体的思想早在埃及、巴比伦等古代宗教中就有发现。——俄文版编者注

天国的思想就从无产阶级的王国转变为此岸的、尘世的王国，它的名称就是教会，这个王国中居首的是圣父，其次是圣子，然后是圣灵。天使和大天使、六翼天使和司智天使都受他们的控制并为他们服务，被谪落的、对教会的权力不满的天使——魔鬼则在最下层。这一宗教的神道观念，同罗马帝国末期的那种平等和博爱的神的观念无疑是根本不同的。中世纪的这种新的宗教思想的产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

显然，它是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的人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的典型的思想上的反映。实际上，中世纪的社会存在的特征就是封建主义和农奴制的社会关系。中世纪的社会存在是由一些最大的封建主所领导的组织，这些封建主就是公爵和教皇，各种诸侯和诸侯的家臣同他们有密切关系，各种男爵和伯爵受他们控制并为他们服务，而在最下层的则是受所有这些阶层控制并且养活他们全体的在农奴制下的受奴役的人们。中世纪时期盛行的宗教思想显然同当时的社会存在本身是一样的东西。换言之，这种宗教思想是为这一社会存在所产生的。

但是，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中世纪的社会存在排除掉了，而用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来代替它。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无疑也必然会消失而代之以与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相适应的新的宗教思想。由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新的宗教思想就是五花八门的新教。

总之，从上面关于宗教思想的全部论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宗教思想都是由每一个一定时代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并且是社会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的思想上或观念上的形象。而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自然是一个漫长的发生和消失的历史过程，是社会存在以及它所产生的思想的不断更替的历史过程——辩证地进行的过程。

我們再來討論一種思想，它的產生看起來好像同社會存在更無依賴關係。這就是哲學思想。然而由於古希臘的哲學思想是其後任何一種哲學體系的開山鼻祖，因而也是現代哲學體系的開山鼻祖，所以我們不妨以古希臘的哲學思想為例，來看看它是如何產生的。

古希臘最初的哲學思想是伊奧尼亞哲學家的哲學思想，就是小亞細亞希臘殖民地伊奧尼亞地方的哲學家包括泰利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這一派以及畢德戈拉等另一派的哲學思想。

伊奧尼亞哲學的哲學思想歸結起來就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偶然性的結果，世界是偶然地從水或火中產生的，或者是從別的什麼東西中產生的；沒有任何超自然力、任何神參與世界的創造。例如，畢德戈拉的哲學思想就把一切歸結為數。數是自然界和物體的基礎。這是自然界和物體所固有的量度和和諧的思想，而超出它的範圍的東西都是同自然規律不相符合的，同它相矛盾的。

這種哲學思想的根源何在呢？

為了說清這些思想的起源，就得先看看希臘的伊奧尼亞殖民地的情況。正是在這些殖民地上，交換、商業和商品生產首先繁榮起來。在這些殖民地上積累起大量財富，這些財富造成了富有階級，同時也造成了貧窮階級即淪為無產者的群眾。這樣，在伊奧尼亞殖民地，社會關係中的矛盾早就已經尖銳起來，這些矛盾是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而同人類社會的社會發展同時加劇起來的。大量財富的積累使占有這些財富的階級滋長起不可遏制的享樂願望，好像世界末日已經來到。希臘殖民地的這些社會關係就在古希臘的第一批哲學家的哲學思想中得到了自己的思想上或觀念上的反映。

泰利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的哲學思想實際上就是

要证明富人阶级的存在是正确的。既然现存的万物都是偶然性的结果，连世界也是偶然地产生的，那末在一些公民手中所积累的财富也是机遇和偶然性的产物。从另一方面看，既然世界是偶然地产生的，那末在生活中除了享乐、除了充分利用能造成财主的机遇以外，便一无意义。

毕德戈拉的哲学思想与此相反，它是对富有阶级一心一意要积累财富和贪图享乐的发疯似的欲望的抗议。这种欲望给社会带来不和谐、不协调、斗争、震荡。数是一切现存事物的量度和和谐的思想，因而也是划分穷富的办法，富人的奢侈生活同和谐有矛盾，而和谐是自然界和万物的基础，人就是万物的一部分。^①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一条结论：古希腊的初期的哲学思想是在希腊殖民地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思想或观念上的反映；它们是由这些殖民地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我们再来看看一度曾在希腊本土盛行的一些早期哲学思想——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的思想。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归结起来就是：矛盾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一切都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对立面的斗争是存在的本质，它决定发展。色诺芬的哲学思想与此相反，认为在自然界和物体中都是统一。

为了了解这些对立的哲学思想的起源和意义，必须研究这两位哲学家在世时古希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

当伊奥尼亚殖民地的商品生产和商业繁荣的时候，在希腊本

① 布拉戈耶夫在这里常常对古希腊哲学斗争的实质作出不正确的、庸俗社会学的解释。他忽视了哲学家之划分为两个阵营——唯心主义阵营和唯物主义阵营，这妨害他对毕德戈拉、柏拉图和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反动学说以及泰利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和其他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进步学说作出科学评价。尤其是，布拉戈耶夫对对立面斗争这一辩证思想的革命意义是估计不足的。——俄文版编者注

土也发生了货币生产、商品生产代替原有的自然经济的急剧过程。这引起了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迅速集中。农民群众日益破产。另一方面，新的阶级——商业—手工业阶级正在形成，他们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新的社会关系引起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其中充满震荡变动和血腥冲突。在希腊内部的历史发展初期形成的这些社会关系不能不反映在希腊公民的思想中。于是它们就以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反映出来。

其实，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无非就是社会本身的矛盾、不平等、在当时展开的阶级斗争在思想上或观念上的反映。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甚至证明社会不平等和作为存在的永恒本质的矛盾的斗争是正确的。总之，这是富人统治阶级的哲学。色诺芬的哲学与此相反，它是平等、博爱的哲学，因为它断言在物体的本性中没有什么不平等。总之，这是当时希腊社会中破产和无权的公民的哲学。它反映这些公民的意愿。

所以，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的哲学思想也是在希腊史初期在希腊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换言之，它们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时代希腊的社会存在的思想上的或观念上的形象。这一论断无疑也适用于较晚期的各种哲学思想。

我们再以希腊极盛时代的哲学思想为例来进行考察。这就是阿那克萨戈拉、德谟克利特和诡辩派的哲学思想。

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思想的实质是，理性在世上占统治地位和支配地位。按照德谟克利特的哲学，物质世界是由无数微粒——原子所组成，原子的运动、结合和分离构成自然界和物体的本质。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思想以原子论这一名称著称。诡辩学派（芝诺及其弟子）的哲学思想归结起来就是：既不存在天上的权威也不存在尘世的权威——什么权威都不存在；一个人除了对自己的责任之外绝对不存在任何其他责任。

要了解这些哲学思想的起源和意义，只有联系到上举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才可以办到。

在波斯战争之后，也就是在波斯和希腊之间进行的战争（结果希腊得胜）之后，雅典成为整个古希腊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中心，生产发展的中心，同时也是整个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最为发达。在这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阶级对世袭贵族、贵族阶级展开了阶级斗争，并且取得完全的胜利。

于是，旧的社会关系就为新的、便于建立像伯里克利这样的罗马皇帝的个人权力的社会关系所代替。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思想就是这种社会存在在观念上的反映，他的思想就是：世界的理性符合伯里克利的理性；就好像伯里克利的理性统治在他治下的繁荣的雅典国家一样，普遍理性则统治着全世界。

但是工商业的繁荣和资产阶级民主^①的胜利破坏了一切旧的社会联系。生产的货币性质和商品性质把以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地说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代表的个性、个人提到取代一切的首要地位。这一新的社会存在的思想上或观念上的反映就是德谟克利特和诡辩论派的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在古希腊的这一发展时期所盛行的哲学思想也是决定于社会存在的，也是社会存在在这一时代的哲学家的意识中的思想上或观念上的形象。

上面这些关于希腊哲学思想的论述，显然也适用于其后出现的各种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都是代替了先前的存在的社会存在在思想上的表现。

雅典国家的繁荣时期从波斯战争一直延续到伯罗奔尼撒战

^① 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并不符合于奴隶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实质，这种说法把这些社会关系现代化了。——俄文版编者注

爭，即延續到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雅典國家很快就趨於衰落。一場更加殘酷的階級鬥爭又如火如荼地展開起來，鬥爭的結果是希臘為馬其頓的菲力所征服，後來又為羅馬所征服。這樣，經過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在希臘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整個來說國家的威望以及個別階級的威望都喪失了自己的社會意義，出現了有一些人超然絕俗的現象，他們或者是懷疑一切，在懷疑論中尋找自己的幸福，或者是奉自己的一些妄念奇想為偶像，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這些妄念奇想的滿足上。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社會存在的觀念表現就是懷疑論者、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的哲學。這種哲學的對象並非所有人的幸福、社會的幸福或階級的幸福，而是個人的幸福。但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後希臘迅速衰落，以致無論個體還是個人都失去了任何意義。

在雅典的繁榮將逝、衰落即至的中間時期里，出現了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哲學的簡單定義可以用認識自身這一原理來說明，它是從繁榮走向衰落的過渡時期的觀念表現；是在這一時期里盛行的個人主義的觀念表現，是希望把個人主義同整體、同社會的幸福加以調和的企圖的觀念表現。但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爆發的階級鬥爭妨礙了這種哲學思想的确立，蘇格拉底也成了這一鬥爭的犧牲品。

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階級鬥爭的觀念表現便是昔勒尼學派的哲學思想和昔尼克學派的哲學思想這兩個方面。前者是富有階級的存在觀念表現；這是一種尋歡作樂的哲學。昔尼克學派的哲學思想則恰巧相反，是貧窮的、已經無產者化的公民階級的軟弱無力的存在觀念表現；這是一種充滿對生活、貧困的節制和淡漠心情的哲學。

但是，在希臘衰落時期和它的末期，希臘的存在的最典型的觀念表現，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柏拉圖的哲學提出

一种思想：人不应当在尘世寻找幸福，而应该在天国寻求幸福。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共和国》这一著作中宣布了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是贵族，社会的基础是奴隶制。反之，亚里士多德却仅仅诉诸于他当时的希腊的现实关系。他在《政治学》这一著作中从哲学上论证了奴隶制，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天然的不平等，是神所确立的不平等。他的哲学宣称“自然的東西”和“神的東西”为生活的最高目的，人应当努力追求这些东西，世上万物都应隶属于这些东西。

毫无疑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是个人、个体的已经丧失的力量、国家的已经丧失的权威、他们当时的希腊所处的没有出路的处境在思想上或观念上的表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用神的力量、以自己的意志统治世界的神的思想来代替个体的已经丧失的力量和国家的已经丧失的权威。换句话说，在这里，哲学思想也是社会存在在这些生活在希腊的衰落时期和末期的哲学家意识中的思想上和观念上的表现。它们是由这一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总之，从上面对哲学思想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一条结论：这些哲学思想是每一个一定时代的社会存在在哲学家的意识中的思想上、观念上的形象，它们是由这一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这个结论不但适用于古希腊哲学，而且也适用于较晚时期以及现代的哲学思想。

从本章的论述中能得出什么普遍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凡是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思想都是由每一个一定的时代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都是这一存在在人的意识中的思想上、观念上的形象。我们对本章中所考察的各种思想作出的一切论断，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这里未曾涉及而我们的读者可以在书目(第三部分)中碰到的别的思想。从以上所有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过运用

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人的意识中产生的思想，来解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定时代里占統治地位的或者正在产生的一般意识形态，这些原理和方法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

第二章 通过运用馬克思主义理論分析 历史过程来解释这一理論 (关于书目的第四部分)

馬克思主义理論断言：人类社会的历史，除了原始社会之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而，阶级斗争是历史运动的推动力。我們现在就通过运用馬克思主义理論分析历史來說明这一理論。为了这个目的，我們仅仅拿几个历史事件来作例子。

十五世紀末期和十六世紀初期以所謂意大利战争而著称。这场战争是法国为了侵占意大利而进行的，哈布斯堡王朝(現在的奥地利和德国)則妨碍法国侵意，因此这两个强国之間就开始了战争，后来英国也卷入战争。在这以前全欧洲的战争还不曾有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之前还没有统一的民族和作为民族统一的表現的国家。在十五世紀之前，無論哪里都还是封建制度占統治地位，各族人民都是分散零落的。如果在那时发生战争，这战争或者是在封建主之間进行，或者是在封建主和最大的封建主——国王之間进行。

在美洲和围绕非洲的航道发现之后，生产力越来越增长，商业逐渐发展，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普遍。这一新的生产方式造就出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它力图使生产力的发展摆脱封建制度所造成的重重障碍，并且改变社会上其他阶级的处境。由于新生产方式或者是在旧城市或者是在新兴资产阶级重建的城市里普及开来，所以在城市 and 封建主之間就开始展开斗争。但是，资产阶级要是只靠本身力量来同封建秩序較量，显

得力量还太弱。因此，国王就利用了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以便摧毁封建主而使之服从自己的统治。这样，封建主就给打败了，国王的权力加强了，而从一部分封建阶级中成长起一个新的阶级——宫廷贵族，这是君主政权的工具。城市已从封建政权下解放出来，资产阶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种种权利。但是，君主政权得到宫廷贵族的帮助和支持，日益企图使其余的一切阶级屈从自己的利益，这就使阶级斗争又一次尖锐起来，以致于发生了反对君主政权和贵族的革命。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里自然是在不同的时候发生的。在法国和英国，到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封建主阶级被战败了，各民族在君主国家的专制权力之下统一了起来，君主国家成为民族的化身。

在君主政权取得胜利并巩固起来的地方，君主政权就是支持封建秩序的封建政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按照自己生存的利益并且服从于这些利益的要求，保护工商业，力图扩大和保持市场。君主政权在自己巩固之后，就在两个方面进行活动：扩大自己的封建政权的范围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民族利益。

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用来解释所谓意大利战争的成因。

在法国统一为一个民族之后，君主政权就为上述两种意愿所推动，着手征服意大利。意大利当时分散为一些单独的王国、公国和共和国，这些国度彼此经常打仗，并且由于残酷的内部阶级斗争而四分五裂。造成意大利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它的各个地区生产力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因而阶级关系也各不相同。凡是生产力比较发达和已经出现资产阶级的地方，国王总是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企图使封建阶级臣服于自己，并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别的地区去。凡是生产力不大发展的地方，封建阶级就还占统治地位，它在同国王的斗争中建立起共和国。只要在哪里出现了资产阶

級，那里的階級斗争就尖銳起来，一直发展到歼灭性的国内战争的程度。

正是意大利的这种情况使它成为邻国强盛的君主政权的牺牲品。法国首先打算霸占意大利。这可以使君主政权和作为法国专制君主的支持的貴族階級的領地扩大，并且会使君主政权更加强。尤其是因为，法国霸占了意大利之后，就可以成为地中海的霸主，同时地中海又是欧洲最重要的一个海。最后，君主政权力图使宗教权力归自己掌握，它力图取得支配国内的教会和宗教界的权力，因而也就能使臣民完全屈从于自己在宗教上的权力。君主政权的这一意图是同新兴階級，即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的意图相一致的。資產階級需要排除宗教界的权力，因为宗教界始終支持統治階級和君主政权。貴族的利益却根本不同。在教会和宗教权力臣服于君主国家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教会和寺院的产业的所謂世俗化，即被君主政权和貴族所掠夺和被沒收。但是法国专制君主的这些意图却是同最大的僧侶封建主——教皇的利益相抵触的，而教皇的权力被认为高于国王的权力。教皇是所有封建国家的統治者。因此教皇就同各封建王国和共和国联合起来反对法兰西，这是极其自然的事。

十六世紀初发生的意大利战争是君主政权强大的結果，是君主政权战胜封建階級的結果。但是，要取得这一胜利，只有出現下面这种情况的地方和时候才有可能：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中出現了爭取从封建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資產階級。君主政权参与了这场反封建主的斗争，于是它靠牺牲两个互相斗争的階級并由于形成新的宫廷貴族或貴族階級而得到加强。換句話說，階級斗争是十六世紀的各种历史事件的隱藏的动力。

后来法兰西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間发生了战争，这场战争同意大利战争有联系，并且是它的继续。这场战争以“法兰西和哈布斯

堡之間的角逐”这一名称著称于世。在十六世紀初，哈布斯堡的国王查理第五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西班牙和尼德兰（比利时和荷兰），甚至扩展到意大利。因为这个緣故，法国被夹在阻碍它的陆上交通和地中海交通的邻国之間。法国商业岌岌可危。英国也同样遭遇到这种危险，尤其是从尼德兰方面来的危险。

查理第五自封为“日耳曼皇帝”，力图取得对整个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帝王权力。但是封建階級（僧侶封建主是它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各方面对他进行限制，于是他迫不得已同封建階級分享政权。因此，国王就成了天主教的保卫者，而实际上是教皇的封建权力和一般的僧侶封建主的权力的保卫者。上面已经說过，法国和英国的情况恰巧相反，君主政权力图限制教皇的权力，并且力图使自己的君主国内部的宗教权力服从自己。正因为如此，法国和哈布斯堡之間的战争（英国参与了其中某几次）就变得連年不断，从一五二五年一直延续到一五五九年（中間有些間断）。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十六世紀生产力的发展所重新激发起来的階級斗争已经越出了民族的界线，而变成为君主政权反对封建的公爵、国王和教皇权力，爭取扩大国家疆域，爭取掠取新的土地和开辟陆上和海上的貿易通道的歼灭性战争了。

現在我們再来談談十七世紀中一場最大的战争。

十七世紀初期以所謂三十年战争著称。起初这是各个公爵之間的內訌性质的战争，以及在他們和德国皇帝之間的战争，然而后来战争发展成全欧战争。从外表来看，这场战争是宗教性的，即是天主教与新教間的斗争。但是在宗教的外衣下实际上隐藏着階級斗争。

十七世紀的德国是由許多独立的公国和王国組成的。公爵和国王都受制于邦議会的决定，即受制于等級人民會議的决定，邦議會中主要是封建主占統治地位。但是，在十七世紀初发生了农奴

制的农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在北德意志諸城市和捷克等地工商业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在这些地方兴起，他们开始进行反对封建性的限制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公爵和国王利用了这些阶级冲突来加强自己的权力，消灭或者限制邦议会。

但是，只有在工商业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地方，因而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相当影响的地方，国王的权力才能够战胜封建主。而在那些资产阶级特别强盛并对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影响的地方，如在所谓帝国城市中，已经建立了完全不依赖公爵和国王的管理机构。在这些城市以及在国王权力得胜的公国中，宗教改革，即主张脱离天主教会和建立新教教会的行动就占上风。反之，在生产力还不发达、因而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阶级斗争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公国，封建阶级仍然很强大，天主教也仍旧保存着。这样，德国（或哈布斯堡王朝）就分裂为两个相互交战的部分：信新教的部分和信天主教的部分。

在长达十五年时间里，战争主要是在信新教的公国和信天主教的公国之间进行。战争终于使德国削弱了。当时其他欧洲强国（英国、丹麦、尼德兰，尤其是法国和瑞典）也来插手战争。实际上，进行这场斗争的目的已经是：首先，争夺波罗的海的统治权；其次，争取掠夺和吞并德国的土地；第三，争取把丹麦和尼德兰从哈布斯堡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把德国弄得民穷财尽，一败涂地。三十年战争到一六四八年以締結所谓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规定瓜分德国，牺牲德国加强别国、尤其是法国和瑞典，和约承认丹麦和尼德兰的独立，确定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成为法国大革命以前一切国际条约的基础。

上面对十六世纪两大战争的论述，也适用于这一世纪以及十七世纪的其他战争。毫无疑问，在这些战争中君主政权的王朝利

益和野心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君主还是不得不对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利益作越来越多的让步,或者更正确些說,是对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一阶级就是这种方式的体现者)的要求作越来越多的让步。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王朝利益,君主政权感到越来越需要金錢,因为这个緣故,它就越来越依附于已经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則关心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要求扩大市場,扩大出海的通道并霸占这些通道。因此十六世紀的战争,尤其是十七世紀的战争,都是为了新的生产方式而进行的。就这个意义來說,这一时期的战争都是从内部阶级斗争向民族界线以外的阶级斗争的过渡,更进一步說,以后各世紀的战争自然也可这么看。这說明阶级斗争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历史事件的隐藏的推动力。当我们来考察一下那些人們称之为革命的伟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

例如,我們现在就考察一下十七世紀的英国革命(一六四二到一六四九年)。

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十六世紀大为发达。资本主义工場生产兴起,新的工业化城市和郡区产生了。在农业方面,这一发展、尤其是紡织工业的发展,把地产都改造成为放羊的牧场。地主用暴力把农民从他們的土地上赶走,并把他們的土地同自己的領地联并成一片。大量已经淪为无产阶级的人民无家可归。另一方面,城市中的手工业阶级也都破产和淪为无产阶级。換句話說,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阶级。

首先,从原有的封建主—地主阶级中分离出一个新的贵族—地主阶级,它同封建主—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原有的地主阶级主要是由僧侶封建主所組成的,这些僧侶封建主起先在国会中占統治地位,后来又同国王的权力联合在一起,削弱国会。僧侶封建主和世俗貴族之間的斗争早在十五世紀就已经开始。英国地主阶级

中的中下阶层以及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也都同世俗贵族联合在一起加入斗争。在十五世纪的国会中世俗贵族占少数，而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几乎根本不能进入国会。在十五世纪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之间的斗争，完全削弱了国会而加强了国王的权力。从那时候起，国王要就是根本不召集国会，要就是只在需要得到帮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才召集国会。在国王需要摆脱教皇的宗教权力和领导教会的时候，他才召集国会。在这种场合下，国王就实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而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则与这种改革是对立的。除此之外，国王除非是在需要大量金钱并且这些金钱又不能用别的办法弄到手的时候，才来召集国会。

国王的这种政策自然引起了所有阶级的不满，尤其是失去了旧有的贵族特权的世俗贵族以及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不满。但是，在整个十六世纪里他们的不满情绪给国王的强大的权力所压制住了。资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把其他的被压迫阶级、尤其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产阶级吸引过来进行坚决斗争的程度。在英国阶级关系的这个发展程度上，斗争是在宗教的基础上进行的；争取改革教会，消灭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已成为国王权力的主要支柱。被压迫阶级相信加尔文教，而保皇党为了同民间的宗教改革相对立，主张由君主实行宗教改革，这种宗教改革称为安立甘改革，它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执中的东西。在整个十六世纪和在十七世纪初，英国的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一宗教的基础上进行的。

到十七世纪初，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新的阶级、尤其是世俗贵族和资产阶级获得了很大的势力。但是国王依靠宫廷贵族和天主教及新教的高级僧侣，也更加蛮横地滥用权力；它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随心所欲地征赋课税，极为无礼地对待国会，当他需要的时候就召集国会，国会不同意他的要求时则极其粗暴地加

以解散。总之君主政权的横行霸道已经达到了极点。但是各个阶级(除了国王御前的那帮人外)的愤怒也都已经无以复加。革命一触即发。

苏格兰起义成了触发革命的导火线。国王没有出来镇压这一起义。另一方面,军队也根本不可靠:一大部分军队都是有革命情绪分子。因此,国王不得不召集国会。一六四〇年四月十三日国会开会了,但是它拒绝拨出必要的款额。国会被解散了。但是这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情绪。国王害怕了,不得不在一六四〇年秋天召集新的国会。在这届国会中反对派占大多数,他们向国王宣称:国王不能不经议员同意就解散国会。这个国会在英国历史上以“长期国会”的名称著称,实际上这个国会已经变成同“制宪会议”相仿的立宪议会了。

起初,在“长期国会”中各个政党都能同心同德。大家一致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并把斯特拉福和洛德处以死刑,因为这两人曾经充任国王的主要工具。但是这种一致为时并不很久。很快在国会内部也发生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在议会中仅仅支持限制国王的权力的提案,虽然他们也曾判处斯特拉福以死刑。反之,资产阶级议员要求扩大国会的特权,规定各部大臣对议员的责任心和以清教徒的精神改组教会。大多数议员是资产阶级,他们同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越出了国会的范围而到了街上并且终于蔓延到全国。

国王企图利用这些阶级冲突来为反革命谋好处。一六四二年二月十四日国王带了军队出现在国会,来逮捕国会中多数派的主要领袖。但是这个企图在国会中和在伦敦激起了强烈的愤懑情绪。在公民和军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国王同贵族一起逃到约克。反革命和革命之间的斗争开始了。开头看来,好像胜利属于反革命。然而很快人民群众起来领导革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精力

充沛的代表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把这些农场主、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为一支统一的革命大军。在克伦威尔的带领下，这支大军粉碎了国王的反革命军队，国王逃亡苏格兰，苏格兰把国王解交克伦威尔。

在革命军队战胜了国王的军队之后，国会里的阶级斗争又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了。现在资产阶级在国会中占统治地位，但是在国会以外则是革命军队主宰一切，在革命军队面前就是克伦威尔本人也感到无能为力。国会同被俘的国王进行谈判，向他作了让步，条件是承认长老会是英国的国家教会。但是军队反对这些让步，并要求信仰完全自由和每一个宗教团体的完全独立。资产阶级企图孤立军队，希望把它派往爱尔兰，那里反革命仍然在胡作非为。此外，资产阶级在伦敦和在南方各郡中挑起了反对军队和保卫国会的运动。但是军队镇压了这一运动，并把一些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议员逐出国会。于是国会的多数就站在军队这一边。这时国会就把国王以“叛变和煽起内乱”为理由送交特别法庭，特别法庭判处国王以死刑。一六四九年英国宣布为共和国。

克伦威尔实际上领导着共和国，他是独立派和革命军队的头子，而革命军队是保护宗教完全自由和宗教团体的独立的。当东山再起的国王政权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进攻英格兰时，克伦威尔把这些反革命活动粉碎了。克伦威尔同法国联合在一起打击了当时反动派的主要骨干西班牙。他为了反对另一个反动派的巢穴——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而筹组了新教同盟。克伦威尔拒绝接受“国家元首”的封号，并且实行了给共和国带来辉煌胜利的对外政策。但是克伦威尔的坚强的对外政策在革命军队里拥护他的人中间引起了不满情绪和对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的怀疑。其中的一些人就组织了一个新政党，名为平均派，它具有共产主义倾向。它的成员主要是无产阶级、农场主和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这个党企图

夺取政权并在英国实现公民的完全平等。但是克伦威尔把这个党粉碎了。

此外，下层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共和国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以致把其他一切阶级都吓坏了。因此它们都反对共和国而要求回到君主立宪国家。在战胜了平均派之后，克伦威尔本人一心一意要想独裁。一六五三年他解散了革命的国会，召集了由自己的忠实信徒组成的新国会，修改宪法，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而由自己负责执行权。他取得了护国主的封号。后来他把这个国会也给解散了，开始依靠军队独自治理国家。这甚至在他自己的军队之中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于是克伦威尔不得不召集国会，国会决定恢复君主立宪制，把王位交给护国主。克伦威尔不接受王位，仅仅在他去世以后，在一六五八年，当时军队中开始有惊慌失措的情绪，国会才把斯图亚特家族召回，并在一六六〇年决定英国仍按旧章由国王、上议院(贵族)和下议院(人民会议)进行统治。

但是复辟的、卷土重来的斯图亚特家族很快就背叛了自己向国会和英国人民所作的诺言。他们重又开始努力在英国建立专制政体和恢复天主教。起初，受到世俗贵族和僧侣贵族支持的斯图亚特家族还不能对抗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对派。但是后来斯图亚特家族的最后一代詹姆士二世竟然践踏所谓宣誓条例，并且任用天主教徒担任军事、民政和国家的职务，这时候，反对派辉格党人的全面起义就爆发起来，连原先支持国王的托利党人也拥护这个反对派。他们宣称要推翻詹姆士二世，并且要求奥兰治的威廉执政，后者立即带领荷兰军队在英国登陆，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连国王的军队也拥护他。詹姆士二世逃到法国(一六八八年)。威廉召集了国会，签订了权利法案和权利宣言，随着这两个文件之生效，人民和国会的权利和自由就最终地确立了。而国会也就宣布他为英国国王。这样，在十七世纪末(一六八九年)，英国的国王专

制政体终于被打败了，确立了国会的统治地位。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一条结论，英国的十七世纪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与革命有关和与革命同时发生的一切历史事件的动力，是英国社会各阶级争取政权，争取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要求和愿望的斗争。这样一些内容，在英国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历史上有过的一切以后的革命，如所谓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法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革命，也莫不具有的。但是这些革命在列入书目第四部分的马克思和考茨基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出色的叙述。在这些著作中，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分析上述各个历史上的大事件——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极其精彩的解释。

一九一一年首次出版单行本

译自保加利亚文，据《第米特尔·布拉戈耶夫选集》（两卷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索非亚版，第347—422页

俄译者沃洛比约夫

中译者魏城

专政还是民主³⁰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俄国革命不仅遭到俄国反革命分子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而且还遭到了以卡尔·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一些极著名的理论家和领导人的敌视。反革命的俄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什么要敌视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不难理解的：资本家的最重要的利益受到了触犯，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的特权完全被侵夺，全世界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遭受到威胁。俄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反革命势力一致起来反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是很自然的事。掌握了政权和消灭了资产阶级制度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范例是有传染性的，因为由于全欧帝国主义战争所形成的种种条件已经为此创造了基础。它已经在德国和匈牙利得到响应，并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浪潮大有席卷全世界之势。而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的特权的末日、它们对绝大多数人民的统治和压迫的末日、共产主义的胜利。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少数人现在和将来都要千方百计地同共产主义革命使它们面临的危险作斗争。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像考茨基等人那样的第二国际著名理论家和领导人反对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且直到现在还对这一革命和德国、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抱敌对态度，这个事实又如何解释呢？

为了说明这个事实，必须回忆一下一方面在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其后是考茨基和潘涅库克)之间、另一方面在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之间就“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实际工作问题、无产阶级革

命問題展开的有名的論爭，这个論爭是在战争前夕进行的，后来为战争所打断。此外，还必须回忆一下这些无产阶级的理論家和领导人在历次国际性大会上的所作所为，回忆一下他們在大会上怎样向被称为机会主义者、“寬广派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作越来越大的让步。回忆了所有这些情况，就能够得出結論說：第二国际的理論家和领导人之所以对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抱敌視态度，主要是因为对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任务的理論的革命涵义理解得不够深刻。

实际上正是这样。俄国无产阶级手执武器也就是說通过暴力掌握了政权和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和消灭反革命势力。因此第二国际的理論家和领导人就反对暴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贊成民主。考茨基在《民主还是专政》一文（登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Sozialistische Auslandspolitik Korrespondenz》〔《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通訊》〕杂志上）中写道：“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我們看来，也同那些一心想要扰乱我們的研究的同志的看法一样，是神圣的。所有被压迫被剝削者的解放是我們的最高目的，而我們是把这个目的同民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这几句话之前，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保卫者同路德維希十四的专制主义相提并論。路德維希十四說过“朕即国家”。照考茨基的說法，革命者所作的也是一样，他們宣称：“我就是革命；誰批評我，就是犯了反对革命的罪”。

上面引述的几行文字，特別是我加了重点的几行，說明考茨基（与他伙同一气的还有所有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叛卖分子，所有社会爱国主义者或者“寬广派社会主义者”，以及一般地說所有反革命分子），第一，是把民主放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他在实质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他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这个专政使人想起路德維希十四的专制主义，它沒有提供自由，即批評

革命的自由。这里考茨基主要是指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他硬說这一革命不是所有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全体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于是，照他的看法，俄国的专政不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全体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仅仅是一个政党和一部分无产阶级的专政。他在这篇文章中說道：“反之，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暴动。它消灭了民主，剥夺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乃至无产阶级的大部分阶层的权利。”为了尽量把布尔什维克革命抹黑，考茨基把它同創立巴黎公社的革命加以比較，說巴黎公社革命是“所有巴黎无产阶级甚至絕大多数巴黎居民的事情”，他还补充說：“依靠普选权的最广泛的民主是这一革命的基础；一切社会主义派別在革命中都有代表，它們并且还都齐心协力地工作。”

在下面我們將可以看到，考茨基对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态度是完全錯誤的，而在評價巴黎公社时他完全忽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这个問題的言論。但是为了充分說明考茨基的思想起見，不妨再从他的文章中摘引一段話。在刊載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那个杂志里，还曾經发表过几篇保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文章，而在《Leipziger Volkszeitung》〔《萊比錫人民报》〕上也发表过几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的文章。因此考茨基认为，論爭已经越出了俄国社会主义問題的范围，而涉及到德国的社会主义問題。以后他继续說：“直到現在，民主作为一种管理的形式，在我們这里占着无可爭辯的主要地位，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这种管理形式的范围里实行的。我們力求爭得这种形式，来建立对社会进行经济变革的政治基础。而且直到現在为止，我們的綱領中还没有一个字眼、我們的宣传品中还没有一句話可以使人能够作这样的揣測，即以为我們之所以要获得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直接的选举权，就是为了在我們胜利的那一天取消这种权利。”

从这段引文里可以看出，考茨基給“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个字

加了引号。而这表明了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不是他不承认任何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他认为专政是次要的，民主是主要的。显然，考茨基把“民主”理解为一种“管理形式”，它建立在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直接的选举权的基础上，“无产阶级专政”是在它的范围内实行的。换句话说，考茨基以为基本任务在于首先是争得“对社会进行经济变革的政治基础”，也就是争得“民主”，争得一种可以借以完成社会主义变革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管理形式”。换个说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应当通过广泛的民主、通过争取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直接的选举权来掌握政权，而不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考茨基所描绘的情形是实际上从来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他把事情说成这样：无产阶级起初争取“民主”，即争取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直接的选举权，它靠这种选举权把自己的多数派进国会和其他代议机关。这个多数将掌握政权，并且“对社会进行经济变革”，显然，照考茨基的想法，这里用不到暴力，用不到预先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用不到国内战争等等。还在战前，当考茨基在同潘涅库克和罗莎·卢森堡就政治性总罢工和革命问题进行论争的时候，他就反对革命行动，而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用在国会里创造无产阶级的多数的办法而争取“民主”上面。

但是请问：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一种伟大的社会变革是照考茨基的公式不用暴力、不用专政而完成的呢？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统治阶级曾经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权？历史上并没有这一类先例。社会主义者的多数之被选入国会和议会，并不表示政权已经转归无产阶级。统治阶级可以不召集这样的议会，或者可以在它还没有召集时就把它解散，这种情形例如在德国的资产阶级国会中就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也许可能召集了议会，但是一有合适的时机就把它给解散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议会在革

命前夕就时常发生这种情形。統治階級对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議會是不大讲客气的。但是考茨基却显然认为統治階級不敢解散这样的議會，因为这样一来革命将会爆发。但是問題是在这里：革命的发不发生要取决很多条件，而首先取决于統治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地位。但是我們不妨假定这样的情形发生了，革命爆发了。这时，它就意味着国内战争、暴力、专政，无产階級只有依靠这些东西才可能掌握政权或完成“社会的经济变革”。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情况。那末，考茨基所提出的无产階級通过“民主”夺取政权的方法就只能够延迟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使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日期。正因为这个緣故，各国所有社会爱国主义者、每一个“宽广派社会主义者”都觉得这方法对他们合用，也因为这緣故，所有资产階級的思想家和佣僕們都很高兴重复这个濫調。

我們看到，考茨基认为：俄国无产階級革命、布尔什維克革命不是俄国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事情，而只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即布尔什維克党为了反对其他一切政党而进行的事情；这个革命取消了“民主”，并且剥夺了其他社会主义者“乃至无产階級中的大多数阶层”的权利。考茨基的这些論断簡直是一派胡言，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俄国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人和以策烈铁里、斯科別列夫等人为首的孟什維克，从俄国革命一开始直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都同资产階級政党合作，参加资产階級的政府并且想方设法压制无产階級和农民群众中增长不已的对政府政策的不滿情緒。无产階級期待“其他社会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而他們却对无产階級胡謔什么“民主”；无地的农民階級期待他們馬上剥夺大地主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轉归农民，而“其他社会主义者”却用通过立宪會議来解决“土地問題”的說法迷惑他們；无产階級和农民群众要求立即召开立宪會議，而他們却同自己的资产階級同盟者一起老是把召开立宪會議这件事擱置起来；无产階級和

农民，整个說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全都期望“其他社会主义者”立即实现和平，而他們却重新开战，发动了后果惨重的进攻。在革命初期，工农兵苏維埃完全处在“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之下，而布尔什維克在其中只占无足轻重的少数。但是，“其他社会主义者”越是屈从于资产阶级政党而因此背叛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士兵的愿望，他們就越是在这些群众之中丧失了自己的影响，而布尔什維克的影响則越来越大。到一九一七年中，俄国的各个苏維埃已有二千万人，而布尔什維主义很快就已经在其中占了上风。那时在苏維埃中提出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維埃！”而“其他社会主义者”和他們所参加的政府做了些什么事呢？——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們匆匆忙忙地挑起内战，想消灭布尔什維主义。但是他們不但沒有消灭得了布尔什維主义，反而更加加强了布尔什維主义，因而在过了四个月以后苏維埃就掌握了俄国的全部政权。事实真相就是这样！

考茨基責怪布尔什維克，說他們起义的矛头針对着“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目的在于剥夺他們的权利和“消灭”民主。但是这样做可以說是正确的，理由无非在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即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在为资产阶级政党服务并且拒絕合作，他們甚至阻挠苏維埃掌握政权。“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确实已经叛变了社会主义，并且同考茨基一起把他們对社会党国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所作的誓言——利用战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³¹——置之脑后。誰也沒有强迫他們这样叛变。当苏維埃取得全部政权的时候，绝对沒有一个人去迫使这些人起来加以反对，沒有一个人拒絕他們的协助。不过“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維克(国际主义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同苏維埃合作的。而只有他們中間的小部分人不仅不同苏維埃共和国合作，而且还同反革命分子一起继续反对它，策划反对苏維埃共和国特派員的阴谋并把他們杀害。这些“社会主

义者”同反革命分子結成一伙，一心要想把无产阶级手中花了偌大牺牲才掌握到手的政权夺取过来，要苏维埃共和国怎样对待他们，是纵容、鼓励他们吗？并且不要自卫吗？因为“剥夺了”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权利”而为这些人痛哭流涕，这意味着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一鼻孔出气。一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每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有责任为它的巩固而奋斗。反对这个政权的人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就是从来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另一方面，考茨基之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因为据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消灭了“民主”。为了诽谤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举巴黎公社为例，说是巴黎公社不只没有消灭“民主”，而且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选举权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第一，俄国的苏维埃选举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投票进行的。当然，苏维埃共和国剥夺了资产阶级（即资本家）、地主、组织阴谋和公然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人的这种权利。这方面的“民主”在俄国确然已经受到损害了。第二，巴黎公社只能够在被围困的巴黎市里进行选举。选举是通过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投票进行的。全体起义的巴黎人民参加了这一选举。虽然巴黎公社没有宣布取消反革命分子的投票权，但是显然公社并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三月十八日革命爆发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绝大多数巴黎人民——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挺身起来保卫革命的事业。马克思在给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报告（后来用《法兰西内战》的名称发表）里顺便说道：

“当梯也尔已用夜袭蒙马特尔街区开始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进行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尚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攻，以便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院的阴谋。但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这样

做，竟使秩序党能在三月二十六日的公社选举中再度试验自己的力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市区大作号召调解的演说，同时为自己立下——自然是暗地里——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对过分宽大的胜利者施行流血的报复。”^①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认为允许“秩序党”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参加选举是巴黎公社的一个错误。但是考茨基竟然不允许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利用巴黎公社的经验而避免公社在对待反革命分子（虽然他们挂着“社会主义者”的招牌）方面的错误。何况巴黎公社还不是处在国内战争的情况之中。只是在公社选举（三月二十六日）以后，公社才不得不起来对付反革命资产阶级所不断挑起的国内战争。如果公社能够掌握住政权并且把它扩展到全国，那末公社决计不会保留这种考茨基为之号泣而所有社会爱国主义者、“宽广派社会主义者”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各种一般的佣僕同考茨基一起为之猫哭老鼠假慈悲的“民主”的。而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它对我们有巨大的实际意义，但是考茨基却从来不去研究它，即使在自己的像《社会革命》和《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样的最近的著作中。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对待国家的问题。考茨基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早在一八九〇年他在答复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时写道：“我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留到将来去解决。”显然，考茨基从来也没有相信过社会主义会在最近胜利，因而他就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留到将来去解决。但是这个“将来”居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来到，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得到了实际的解决。但是对考茨基说来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可理解的。其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早在一八七一年已经由巴黎的无产阶级解决了（尽管不是全部解决）。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法兰西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493页。——译者注

战》一书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里用下面这几句话作结尾：

“近来，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諸君，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而現在在俄国、匈牙利、德国发生的事情就是較之巴黎一地的无产阶级专政范围更大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虽說这样，現在考茨基却不理解这种专政。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民主”、批評自由、言論自由、一般自由的消灭。这样，考茨基就同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对待現代国家（不管它是君主立宪国还是民主共和国）的学說完全相抵触了。

实际上，馬克思在引用巴黎公社总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宣言（其中通告說，巴黎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时說过，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巴黎公社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公社在夺取了政权以后馬上就着手解决这一任务。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也就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摧毁現代国家，并且用在法国当时称作公社制（当它成功的时候）、而現在称作苏維埃管理制度或者苏維埃共和国的那种制度来代替它。显然，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什么“民主”，不能让那些享有这种“民主”、自己的阶级利益同建立消灭阶级統治的制度相违背的人参加到这个制度里去。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写給倍倍尔的信里說道：“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其为国家了。”^③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写了下面这些话：

“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464頁。——譯者注

② 同上书，第496頁。——譯者注

③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25頁。——譯者注

人謀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絕大多数人为絕大多数人謀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現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

就在这一頁上，再下面一点，他們又接着写道：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們探討了現存社会内部多少隱蔽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个战争轉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統治的过程。”^①

从这两段引文中我加了重点的几行文字中可以得出一个結論，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实现共产主义，要摧毁現代国家連同“民主”（因为它是存在在現代国家之中的）和“批評自由”之类东西，而代之以符合劳动阶级利益的管理制度，即苏維埃制度，建立在一切为之奋斗和加以保卫的人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投票基础之上的苏維埃共和国。

但是考茨基却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論证过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就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抵触了。可見，考茨基以及所有現在在保卫“民主”的幌子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社会主义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帮助反革命分子，力求阻挡正在爭取自己以及一切被压迫被奴役阶级和人民从資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前进。

原載《新时代》杂志，一九一九年
第一册

譯自保加利亚文，据《第米特尔·布拉戈耶夫选集》（两卷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索非亚版，第423—433頁。

俄譯者沃洛比約夫

中譯者魏城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477、478頁。（着重点是在布拉戈耶夫加的）——譯者注

注 释

- 1 第·布拉戈耶夫的《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一文刊载于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理論机关报《新时代》杂志一九〇一年第十——十一册上。——第1頁
- 2 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这本书是于一八八九年問世的。保加利亚文譯本是在一九〇一年出版的。——第1頁
- 3 閔采斯和派斯馬尼克（德波罗夫和維列諾夫）是俄国民粹派侨民，他們曾就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保加利亚的发展問題同第·布拉戈耶夫进行过論战。——第1頁
- 4 《Работнически вестник》（《工人通报》）（一八九七——一九二四）——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第2頁
- 5 泰納，伊波利特（一八二八——一八九三）——法国資產階級文学和艺术理論家，实证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第·布拉戈耶夫提到的泰納对艺术現象作历史解释的尝试带有抽象的性质；他沒有估計到“统一的民族”内部的階級斗争。——第6頁
- 6 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以楊·薩克佐夫为首的机会主义者提出“出版自由”、“广泛的”議會活动等要求。虽然一八九八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在雅姆波尔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禁止以党的名义作私人宣传，可是楊·薩克佐夫及其拥护者在一九〇〇年九月开始出版《共同事业》杂志，在該杂志上号召重新审查馬克思和恩格斯“已过时的”理論、号召对这个理論作“宽广的”解释。楊·薩克佐夫等人否认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学說，硬說在保加利亚沒有階級斗争的基础，而只有农民、手工业者、无产者和資本家的“共同事业”，他們为了消灭反动的君主制度和政府、实施民主改革必須联合起来。他們誣蔑布拉戈耶夫及其拥护者、

党内大多数人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紧密派”和“宽广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一九〇一年在普列温城举行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第·布拉戈耶夫、格·基尔科夫、格·格奥尔吉耶夫等的谴责“宽广派”的决议。代表大会表示要使党清除小资产阶级分子。一九〇二年七月至八月在特尔诺夫举行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瓦·柯拉罗夫提出的谴责“宽广派”的决议。一九〇三年七月召开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把扬·萨克佐夫、格·达贝夫等人及机会主义组织开除出党，因为他们进行机会主义活动及不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共同事业》（«общо дело»）——是自一九〇一年起出版的“宽广派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第19页

- 7 彼·热·——是“宽广派社会主义者”首脑之一彼得·热德洛夫姓名的简写。1944年9月9日后热德洛夫作为德国法西斯在保加利亚的积极宣传者而判罪。——第20页
- 8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二——二十八日在普列温城举行。在根据中央报告所作出的决议中，“共同事业”的策略被谴责为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策略。——第20页
- 9 第·布拉戈耶夫的《机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发表在《新时代》（«Ново време»）一九〇二年第十二册。——第23页
- 10 格·格奥尔吉耶夫（一八七〇——一九一七）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的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曾积极参加反对民粹派和“宽广派”社会主义者的斗争。——第24页
- 11 格·基尔科夫（一八六七——一九一九）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的著名活动家，文学家。曾积极参加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第24页
- 12 Senex即老人，第·布拉戈耶夫在党内的化名。——第25页
- 13 格·伊·巴卡洛夫（一八七三——一九三九）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在九十年代他曾积极参加对保加利亚民粹派的斗争。——第25页

- 14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三——十七日在雅姆波尔城举行，这次大会讨论了党的革命活动的性质问题，党对资产阶级政党在原则上的政治独立性问题。——第26页
- 15 这是指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加布洛沃，一八八九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利温，一九〇〇年）和第八次代表大会（普列温，一九〇一年），这几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都强调指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第26页
- 16 这是指下面这一情况。一八九二年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分裂为两个集团：“建党派”和“反建党派”。“建党派”（第·布拉戈耶夫、格·格奥尔吉耶夫等）认为，建立独立的、合法的、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时机已经来临。在普洛符迪夫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一八九二年八月）上宣布成立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并且很快就出版了党的铅印的机关报——《工人报》。机会主义的“反建党派”集团（拉科夫斯基、杨·萨克佐夫、达夫夫、波兹维里耶夫等）在一八九三年组成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同盟，并且开始出版《同志报》（《Другар》），在报上宣传工人阶级仅仅在经济上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以及组织政党为时尚早的主张。一八九四年，尽管布拉戈耶夫不同意，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同盟联合为一个党，杨·萨克佐夫等人在党内仍旧进行自己的机会主义活动。——第29页
- 17 瓦·彼·柯拉罗夫（一八七七——一九五〇）是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共产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和人民民主保加利亚的国务活动家；曾积极参加对民粹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第37页
- 18 第·布拉戈耶夫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有基础？》一书于一八九一年在特尔诺夫城出版（用德·布拉丹诺夫的笔名），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第一册。民粹派人普罗柯比耶夫（俄国民粹派人捷巴加里耶·弗拉基米洛维奇·马克里也维奇〔一八四八——一九二六〕的笔名，他是从一八八五年迁居到保加利亚来的）曾反对布拉戈耶夫在书中宣布的思想，他要证明保加利亚是一个小所有者的国家，其中既没有资本主义的基础，也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布拉戈耶夫在同普罗柯比耶夫的争论中从理论上粉碎了保加利亚的民粹派。

以后，第·布拉戈耶夫在一九〇六年发表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史导论》一书中指出，在这本书中可以发现“拉萨尔思想对作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的痕迹……”。——第48頁

- 19 这是指查哈利·斯托揚諾夫在《自由报》上发表的一些論文。查哈利·斯托揚諾夫在发表在該报（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一一到一一三期）的题为《社会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三篇論文中，同第米特尔·布拉戈耶夫进行論战，他想“证明”在保加利亚甚至考虑一下建立社会主义問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者、虛无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所有在俄国、法国、比利时說来完全合法的要求，在保加利亚已经实现了。

《自由报》（一八八六——一八九八）——在一八九四年以前是政府的官方报纸。《自由报》在其篇幅中支持显然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反俄罗斯人的政策。——第48頁

- 20 这是指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流派“сироманомилство”（“爱贫民会”），它是由斯比洛·古拉布切夫所领导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期）。詳細情况請参閱第·布拉戈耶夫《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史导论》一书中《爱贫民会》一章，第123—126頁，一九四九年党出版社保文版。——第48頁

- 21 农业信贷所，早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起就已经存在，当时是农民的一种互助组织，一八六二年由多瑙省（北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总督米特哈德—帕夏改組为信贷机构。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羈軛下得到解放之后，在九十年代，改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农业信贷机构。从一九〇三年起又改为“保加利亚农民銀行”。——第49頁

- 22 薩姆薩尔(Самсар)——中間人，經紀人。——第58頁

- 23 巡迴农业教师学院是在一八八九年成立的。起初在全国只指定了五个人做这工作，其中一人受过高等农业教育，四人在保加利亚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受过中等农业教育。一八九二年教师人数增至十八人，一八九七年增至三十二人，一九〇七年增至四十四人，一九一二年增至六十五人。这个学院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教师必須在农民中間替农业机器做广告，并且教他們使用机器，农业机器进口商集团很注意这个工作。——第58頁

- 24 在里昂的絲厂和絲业作坊中作工的织工約有三万人。在一八三〇年七

- 月革命之后，原料停止进口，于是里昂的工厂主就把工资从四法郎压低到零点九法郎。国民卫队反对工人們的抗議示威。经过两天的厮杀，工人占领了城市，一共占据了十天功夫。政府調遣一整团军队来镇压起义工人，军队侵略了城市，并且残酷迫害起义者。里昂起义在欧洲各国工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第89頁
- 25 这是指宪章运动。一八四二年宪章主义者拟就一份包括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的請願书，有三百万人签名。政府拒不接受請願书。宪章主义者宣布罢工以为报复，但是这次罢工組織得很不好。罢工和宪章运动的领导者被逮捕并被交法庭判罪。——第89頁
- 26 一八九一年在斯坦姆波洛夫的拥护者的报纸上出現了好些討論实行选举资格的必要性的文章。但是关于限制选举权的法令未被人民會議所通过。——第114頁
- 27 遗产法是一八九一年通过的，至一九四八年仍然有效。——第115頁
- 28 “分散国家权力并把国家改变为生产公社的联邦同盟”这一論点，在一八九一年布茲路日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綱領中就已提出（参見《历史評論》杂志第四年第二册所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綱領和第一个章程》）。这个旧綱領是按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样式拟訂的，在特尔諾夫大会上，旧綱領被取消了，通过了一个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制訂出来的新綱領。在新綱領中，关于分散国家权力的論点被刪去了，认为它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則。——第120頁
- 29 第·布拉戈耶夫《学习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学說学习指南》（《Към марксизма； Упътване за изучване на марксовото учение》）一书在一九一一年出版过单行本。——第125頁
- 30 第·布拉戈耶夫的《专政还是民主》一文第一次发表在《新时代》（《Ново време》）杂志一九一九年第一册上。这篇文章表明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化的开始的过程。第·布拉戈耶夫在这篇文章中发展和保卫了无产阶級专政思想，反对卡·考茨基的叛卖性的机会主义的攻訐。——第186頁
- 31 第二国际的国际大会是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时期在巴塞尔（瑞士）召开的。——第191頁